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89.12

民陣和民聯和親？



胡平：前面會有急轉彎？
大陸留學生法案在旋渦中

79

十月二十八日，民聯聯委會召開四屆二次會議，民陣領導人吾爾開布、萬潤南等應邀參加了會議，輿論界在問：



民聯和民陣在熱戀中？



2



1



4



3



7



6



5



10



9

8

5.民陣北美負責人金岩石 6.民陣理事廖大文 7.黃奔：民陣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芒在背 8.錢達：我是民聯借調民陣 9.吾爾開布：防人之心不必有 10.民聯四屆二次聯委會會場。

1.萬潤南：同床異夢不如異床同夢。 2.胡平：有些事民聯和民陣可以一塊兒做。 3.劉燕是民聯最新的盟員，她在會上當場入盟。 4.錢達把劉燕入盟比作兩個組織和親，會場大笑。



糾正兩種偏見

路 邊

有人說：民聯是革命派，民陣是改良派。我看這不符合實際，說這話的人肯定沒有認真讀過兩個組織的講話和文章，只是在那裡「想當然」。事實上，民聯與民陣的綱領、組織架構等都相當接近。之所以搞成兩個組織，主要是歷史的原因和地理的原因。而不是觀點、路線有何重大不同。要說激進、溫和之分，那麼在兩個組織內部都有。

有些民陣人士原先在共產黨內、在政府內有一定地位。曾經一度，主張有才能的人進入黨內、權力機關內去搞改革更現實，更有效的論調盛行。我從來就不贊成這種觀點。極權統治的特點就是國家（政府）壓倒社會，在這種統治下爭民主，說到底，就是要建立起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因此，我一向提倡有才能的人要獨立，要獨立於權力機構之外。這並不是「吃不着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不止一次，有好心人拉我入黨，也有過「大人物」要我去「入幕」，我都謝絕了。我決不否認入黨作官可以幹好事，而且還可能更立竿見影。我很尊重黨內改革派的貢獻。但是我認為，另辟途徑更重要，建立一個有自主性的民間力量更重要。

六四事件並不意味着在黨內搞改革不再有用處。今後我們仍需要與黨內改革派合作。搞政治就是尋找同盟者。民間力量需要與黨內開明力量結盟。但是，找同盟者的前提是你自己必須是獨立的力量，否則就成了找靠山。民間力量不與黨內改革派結盟是一個策略錯誤，然而，瞧不起民間力量，以為入黨作官才最有利於民主改革則是一個原則錯誤。

有兩種偏見應該糾正。其一是懷疑某些民陣人士的獨立性和民間性，仍把他們視為「黨內改革派」。這已經與事實不符。當然，這些人士在思考和處理問題時，要注意「轉換座標系」的問題。其二在民主運動中，不是重視一個人在民主運動中的影響力和知名度，而是重視籠而統之的所謂影響力和知名度，有的人過去並沒有在民主運動中出過力，但今天一旦加入民主運動，立即被視為要緊人物（只因為他們原來的社會地位較高），反倒把一些老民運人士排擠到一邊。團結工會就不是這樣，瓦文薩原來只是一個被開除的普通工人，庫龍·米奇尼克（團結工會最重要的知識份子顧問），原先在官方那裡也沒有任何響亮的頭銜。當然，我也反對老民運份子擺資格。關鍵是要看你的實際貢獻和能力。這兩種偏見分屬兩個極端，但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都是只認外在的標籤，不去考察具體的人和事。所以我主張民運隊伍中不同背景的人要彼此多尊重、多溝通，互補長短，各自多努力。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1982年11月17日創刊

China Spring

1989年12月號79期

11月15日出版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觀察家

本期專輯

參考消息

政情分析

民主牆

思辨集

人物

特別報導

58	55	50	48	44	43	41	38	35	32	29	27	25	22	16	14	13	11	8	6	3	
大陸留學生滯留法案在旋渦中	劉剛與北大民主沙龍	什麼是「非暴力」？	改革開放政策和大陸民運	論中國的聯邦制	論平行結構及改革	痛苦的民主——民陣巴黎會議反思	我們需要失敗的革命	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天使	前面會有急轉彎？ ——陳一咨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演節錄	毛澤東思想重放光芒	中國政局內鬆外緊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黨中央不安 北京人不服	陳一咨論海外民主力量大聯合	害人之心沒有，防人之心不必有	同床異夢不如異床同夢	民聯和民陣：熱戀？和親？	糾正兩種偏見	中國之春七周年晚會速寫		
馬怡陽	黃村	吳牟人	楊力宇	靜光	崔三元	安琪	安琪	柯崗	丁楚	黎民錄音整理	張路光	靳軍	黎吾	江河海	徐邦泰	吾爾開希	馮潤南	馮磊	馳遼	路邊	



賀中國之春七周年



傅國琴 張保羅 倪正順 廣軍明 高學勤 陸亞妃 夏志清 何國忠
 叢致 劉崇財 朱明春 李才文 信包 林言 趙衡 青鋒 潘慧小 談天行
 阿財 郭范 楊威 李東 楊棉 悅忠 張欣 石磊 岑慧燕 司馬路 孟玄
 鄧銓 曹韻的 徐山 翁生 馬宏唐 子新 金若石 劉英莉 余剛 江河
 劉燕 翁瑞 史文斌 文里中 王輝 吳長文 黃瑞南 羅希新 蕭以怡 李勇
 康立 趙達 吳毓斌 吳利人 李斌 張小峰 水雲和 徐樹林 梅而

大陸浮沉

「六四」系列專訪

它山石

讀史偶拾

讀作篇

	86	88	10	34	34	82	79	77	72	70	68	65	62
	佳節不忘獄中的英雄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天安門挽歌四首	我揭發，袁木走私 他顯然不是記者	天塌地陷時代的鬭爭	東德——堅冰已經打破		讓我們用筆來自衛 ——記「六四」藝術家畫展	路漫漫其修遠兮 ——「六四」環球自行車隊側記	為歷史保存一份檔案 ——訪「六四」計劃辦公室虛偉力	辦一件事真難 ——訪「六四」之聲電台李三元	廣州商業城：股份公司的悲劇 唔！錢啊錢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主編：丁楚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編採主任：楊漫克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責任編輯：劉義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執行編輯：李遠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美術編輯：蘇洋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發行：薛偉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攝影記者：吳方城
	張明則等	薛偉整理	許偉雲	林蔭年	王凡	陳雪	楊漫克	本刊記者	本刊記者	本刊記者	本刊記者	楊天樹	袁雪峰

中國之春七周年晚會速寫

馳遼



丁楚：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國之春在紐約華埠孔子大廈舉辦晚會，慶祝中國之春創刊七週年。各路民運人士、僑界領袖、作者、讀者、新聞界朋友一百五十多人聚集一堂，同慶「中國之春」創刊七週年。

孔子大廈交誼廳裡，放着鮮花、彩旗，最引人注目的是，橫列在講壇兩旁的七十八本中國之春，那裡面記載着，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的腳步，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偉大事業：有洪流也有波折，有歷史經驗也有寶貴的民運史訓。

中國之春現任主編丁楚首先介紹了「中國之春」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定位。他說：

「七年前，一九八二年，也是在紐約，四個大陸留學生創辦了這本中國之春雜誌，他們是王炳章、宦國蒼、梁衡和李林。當時中國之春提出一句口號：再造梁山。」

「今天，這四位創始人都離開了中國之春，走上各自的道路，但無論如何我們要感謝他們，因為他們的勇敢，我們今天才有這個中國民主運動的根據地，有了一塊中國不同政見者的水泊梁山。」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之春仍不能回到大陸去，中國的春天被拒之海外七年之久。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海外團體，我們的雜誌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海外刊物，我們的根還是在大陸，中國之春的根，是北京之春。我們今天的事業，是民主牆的繼續。

「十一年前，我們也曾有過一塊根據地，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曾有過水泊梁山，那就是民主牆。可是不幸的是：民主牆在三年之後陷落了。這個教訓，值得我們所有人的深思。」

「曾經有很多持不同政見者，甚至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瞧不起民主牆，瞧不起梁山草寇。他們更願意把自己的思想發表在官方的陣地，通過正式的途徑傳播，以便得到更大的影響。不錯，他們曾經也得到過成功，但是他們自食其果了。民主牆因為得不到更廣泛的支持而垮掉了。民主運動的梁山陷落了。兩年之後，當反精神污染的運動肆虐中國的時候，當那些持不同政見者被趕出人民日報和官方刊物時，他們才想起民主牆的好處，可是這時他們却連一塊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了。」

「在「六四」大屠殺後的今天，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根據地都喪失殆盡了。但是所幸的是，我們還有海外的根據地，中國之春就是海外的民主牆，希望大家能夠珍惜這塊殘存的園地。」

「當沸騰的中國之夏來臨的時候，人們感覺不到中國之春的存在，而只有當漫漫嚴冬降臨中國之時，人們才會感覺到中國之春的存在。在這塊根據地上，聚集了這樣一批人：他們敢於幹別人不敢幹的事情。他們的信念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出席當日晚會的中國之春人士代代都有。

「中國之春是一面不倒的旗幟，七年來它在海外為民主事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國內時，每當聽到中國之春的名字，心情就非常激動。」這是天安門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在春週年晚會上的一番心裡話。

中國之春的創始人王炳章和宦國蒼，是最老的一輩，而在當天下午才加入「中國民聯」的天安門學潮活躍份子劉燕，則是它的最年輕的成員。新老「反革命」歡聚一堂，充滿必勝的信心。

創始人王炳章在應邀致詞中回顧了中國之春七年來的一些艱辛往事。他感慨地說，中國之春是七九年北京之春的繼續，今天，又看到吾爾開希、劉燕這一代民運青年來到這裡，可見民主運動後繼有人，前途光明。今天我們不得不在紐約，在別人的國土上慶祝中國之春創刊七週年，但一定會有一天，我們會在北京，慶祝我們的週年。也許再等七年，還不行，但絕不會等得更久了。

當日下午剛剛應邀參加了中國民聯聯委會的民陣副主席吾爾開希和「總理」萬潤南，分別在晚會上致詞。萬潤南表示，中國之春運動是七九年北京之春的繼續，而「民主中國陣綫」，是八九民運的繼續。我們共同繼續的是一個事業——中國的自由和民主。

中國之春的長年支持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世界作家筆會成員叢甦，分別在晚會上致詞，他們勉勵中國之春諸人士繼續發揮七年來的角色，完成中國民主未竟的事業。

當然，在一個民主刊物的晚會上，不可能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多年來經常給中國之春提出忠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謝文，在演講中表示，中國之春雜誌在成長，在進步，只要它不斷完善自身，學習民主，它將會獲得廣大留學生更多的支持。

紐約大學藝術系學生、紐約民運幹將之一張保羅，在大會上猛烈地開了兩響砲。他首先指出，中國民聯雖然七年有成，但八九年初發生了一場內部的鬭爭，使它未能在八九民運中

發揮出它能夠發揮的力量。他也向出席晚會的民陣人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指出他們搞民運太濶氣，鋪張浪費，對不起為民運捐款的廣大華僑。

晚會進行期間，由中國之春編輯部向「民主中國陣綫」贈送了全套七十八本中國之春，



王炳章獲演說二等獎。

互相勉勵，共舉民運大業。

由「中國之春」編採主任楊漫克、美術編輯蘇洋主持的文藝表演，使整個晚會達到了最高潮。這是一次純粹的「大陸風格」的遊藝活動。節目由點將方式展開，每個被點到的演出者有權利點另一人出來表演。

晚會由中國之春編輯部創作的節目，抽象音樂「理想交響曲」拉開序幕。一只色彩斑斕

的美洲大蝴蝶從鮮花叢中飛出，翩翩起舞，象徵着民運人士們對自由的暢想。民聯監委委員童菁用一把史坦威高級小提琴，為蘇洋伴奏獨唱。節目一潮高過一潮。吾爾開希唱了天安門學生最愛唱的一支歌「北方的狼」，把人們重新帶回天安門廣場那激動人心的氣氛中。

演出中，藝術水準最高的，是前中央樂團二十年的首席小提琴家洪維廉的小提琴獨奏。洪先生十八歲獲得國際小提琴比賽大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雙手被造反派用皮鞋踩傷。他演奏的帕格尼尼的作品，獲得大家的喝彩。

中央美術學院教師劉新華，是中國民聯著名的男中音，他所表演的兩首俄國民歌「三套車」「伏爾加船夫曲」雄渾有力，繞梁三日。演唱中，你可以聽到中國最早的「革命歌曲」——「少年先鋒隊」之歌（童菁演奏），文革時由黃宗英創作的牛棚進行曲（楊懷安演奏），毛主席語錄歌「東風吹，戰鼓擂」（郭城演唱），台灣語歌曲（劉添財演唱），應有盡有。最後，由民聯監委主任薛偉講評，他根據每個人所唱的歌曲，猜出了演唱者的年齡和生活背景，令人叫絕。

文藝節目結束後，經群眾評議，劉燕勝過了男友吾爾開希，獲得最佳演說，王炳章獲二等獎、楊懷安獲三等獎、劉新華獲得歌唱一等獎、吾爾開希獲二等獎、「民陣」監委主任錢達獲三等獎。

「中國之春」七週年晚會在「中國之春進行曲」（齊興創作）聲中結束。總有一天，我們會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國之春」的生日。朋友，北京再見！讓我們一道為這一天的到來而努力。

民聯和民陣：熱戀？和親？

馮磊

巴黎會議上的初戀

民聯和民陣是目前海外最大的兩個「反革命組織」，兩者之間的關係頗引人矚目。據說，中共國安部在海外工作的一個突破點，就是要挑起這兩大組織的矛盾，以便這兩支海外民主力量的主力在內耗中消亡。

民陣巴黎大會，為兩個組織的關係奠定了一個良好基礎。在這次會議之前的幾乎所有海外群眾組織大會，無論是學自聯還是政治學會、經濟學會，都有不同程度的排斥民聯現象，競選理事和主席的候選人常常會受到這樣的無理質問：「你是不是民聯成員？」，甚至在第一次民陣巴黎籌備會上，竟然出現投票決定是否讓民聯主席胡平入場的場面。

可是在這次巴黎會議上，民聯成員第一次受到平等待遇，他們參加了主席、理席和監事的競選，但沒有人對他們的「中春色彩表示異議，中國民聯公開的成員，第三屆監委委員錢達選當選為民陣的監事會主席。

在巴黎會議上，民聯並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活動，許多民聯成員從各國自費赴巴黎，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陣容。他們的活躍和能量給與會者一個深刻的印象，以致一些人給與會者劃分派別時，劃出了一個「中國之春派」。甚至還有人評論，中國之春派是巴黎各派中最強的一派。所有參加巴黎會議的民聯成員，除主席胡

平和聯委會主任徐邦泰外，均加入了民陣。當時吾爾開希也曾誠懇地邀請胡平、徐邦泰加入民陣，甚至還以他和譚家其加入民聯為交換條件。胡、徐二人解釋說：其他盟員加入民陣是個人選擇，他們不干涉。但他們兩人在民聯內地位特殊，是否加入，需回去和盟內的人商量一下。

就兩個組織的關係來說，巴黎會議是個良好的開始。一個好的開頭比什麼都重要。

民聯與民陣的同與異

「六四」之後，海外各類團體蜂湧而起。一些人自然要把各種組織歸類。於是，民聯被歸入了革命派，民陣被歸入了改良派。其實，這一分法並不中肯，它並沒有點出民聯與民陣的真正區別。

可以說，就基本目標來講，民聯和民陣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都是要結束一黨專制，都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所不同的是，民陣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共產黨高層的政局變化上，把為「六四」平反作為一個近期目標；而民聯則把更多的希望放在加強外部的壓力上，把社會結構上的變化，如結社、出版自由作為近期目標。作一個形象的比喻，民陣更像一個短跑運動員，而民聯則扮演了長跑運動員的角色。而兩者跑的方向是一致的。

從組織結構上，民聯與民陣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民陣在巴黎所建立的兩權半分立的領導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參照了民聯四大前的結構。但給人的一般印象是民陣比較注重吸引明星人物，而民聯比較注重基層一般的群眾和普通留學生。這個特點，造成了民聯腳重頭輕，民陣頭重腳輕。民聯的很多支部非常活躍，可以獨立作戰，甚至總部常常被下面的支部和分屬機構推着走。而民陣剛好相反，總部聲威赫赫，可以呼風喚雨，可是下面的分部還未建起來，沒有幾個人調得動。丁楚在和萬潤南座談時舉了個例子，他說：「民聯總部若有難，各地諸侯可以進京勤王，三千五千里向總部匯款，可是民陣總部要有難，各地支部怕就要散伙了。」萬潤南深有感慨地說：「是啊，我們建一個分部，就多一個辦公室，多養一批人，就多一個預算要錢。」

在海外民運的地位，一般的評價是：民陣佔天時，民聯佔地利，致於「人」還是個未定數，但目前來看，輿論在向有利於民聯不利於民陣的方向偏移。因為人們對民陣的期望過高，遠遠高於它的實力所能及的地步，所以造成人們普遍失望，民陣股票在跌價；而民聯處境剛好相反，不久前民聯的內部糾紛已使人們對民聯的期望值跌到最低點，遠遠低於其實力，因此造成目前民聯的股票反彈上升。

錢達有一句話很形象地點出了當前民聯與

民陣這兩個組織的優劣之勢：民陣有信用（CRIDET）而現款（CASH）不足，而民聯則是有現款，但信譽不足。民陣有勢，民聯有力。所以兩者應當取長補短，相互配合。「勢」加上「力」就是「勢力」。

來自兩方面的擔心

巴黎會議剛結束，爲了回報民陣善待民聯之舉，民聯監委會立即向全盟發了一份文件。文件號召全體盟員要在各方面支持民陣的活動，甚至在生活上幫助剛從大陸逃亡，立足未穩的民陣成員。此舉贏得盟內外一致喝彩。

正如愛情總免不了波折。民陣與民聯的關係也並非一片晴朗。由於巴黎會議準備不妥，人員複雜，造成了民陣內部各種派別之間矛盾重重。民聯成員加入民陣後，很難免會捲入其中。民聯是一個帶有強烈革命黨色彩的團體，擁有很多秘密成員，具有很強的滲透性，海外的各團體，各類活動幾乎無孔不入。同時，民聯中進取性比較強的人也曾提出：「打入民陣，控制民陣」的戰略，這曾在民聯內引起激烈爭論。自然，民聯在巴黎會議上那種咄咄逼人的勢態必然會引起民陣內部某些人的憂慮，一些人在擔心：民聯會不會最終吃掉民陣？

還有一種擔心來自相反的方面。紐約美東時報撰文驚呼：隨着民聯成員大批加入民陣，民聯將全軍覆沒。

其實，真正的危險還不在於此。一旦民聯捲入了民陣的內部矛盾，同時又一旦因爲民聯的這種捲入引起兩個組織之間的矛盾，那麼雙方都會在磨擦和內哄中同歸於盡。這是共產黨最願意看到的場面，這才是真正的危險之所在。

爲了防範於未然，民聯的第四屆二次聯委

會決定將「民聯與民陣的關係」列爲重要議題，同時邀請民陣主要領導人列席會議。當着對方的面討論這個問題一方面可以取信於對方，以示並無害人之心，同時也可以從積極的方面討論一下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具體形式。

會議的前一晚，丁楚向萬潤南直言陳述了此次會議的意圖。他說：「我希望我們的聯委會能作出一個決定，民聯不捲入民陣的內部矛盾。這不但是保護你們，也是保護我們自己的措施。我希望通過這次會議，雙方能建立信任，爲今後的合作打下基礎。」

民聯和民陣在熱戀中？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民聯聯委會在中國之春編輯部召開，監委委員和總部主要幹部列席會議。開始大家討論了民聯成員加入民陣的問題，多數人認爲應尊重個人意願，組織不做任何限制或鼓勵規定，包括對胡平和徐邦泰兩人也不作任何限制。盟員可以跨籍。但與會者對胡、徐兩人個人表示，不希望他們加入民陣，以保持民聯形象上的獨立性。

這個決定產生了以下一個矛盾：民聯「四大」會規定民聯成員和民主黨黨員不能跨籍，現又允許民陣成員跨籍，是否雙重標準？這一點引起辯論。最後大多數與會者認爲：一個組織有權利規定它自己的雙重標準，而且這一雙重標準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整合」並不具有最高價值，「整合」的目的是爲了壯大民主力量，後者才是最高價值。可是事實證明民主黨和民聯的相互滲透已經削弱了民主力量，而和民陣的相互滲透則不一定，所以對後者沒有理由限制。

當民陣的朋友來到會場時，響起一片掌聲

。胡平、徐邦泰、丁楚、薛偉等迎出屋門和客人握手，表示歡迎。來賓有民陣副主席吾爾開希、秘書長萬潤南、理事廖大文、北美地區負責人金岩石、紐約辦事處負責人徐曉峰和吾爾開希的女友劉燕。民陣監事會主任錢達自稱是「民聯借調民陣」的幹部，以主人身份在場恭候。萬潤南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來取經的。」



從左至右：錢達、汪岷、張偉、萬潤南、吳方城、黃奔、張卓之、楊漫克、金岩石。

民聯聯委主任徐邦泰首先向客人介紹了剛才討論的議題和結果，當他說到民聯不捲入民陣內部矛盾時，吾爾開希插話：「歡迎捲入」，全場大笑，氣氛立即變得輕鬆愉快。之後，萬潤南講話，他認爲民聯和民陣最終會走向聯合，但不宜操之過急，雙方先經過一段聯合行

動時期可能是必要的，異床同夢強於同床異夢。

吾爾開希的發言更是坦率真誠得令人愉快。他首先聲明雙方都無害人之心，所以防人之心不必有。會議的最高潮是一直默不語的劉燕突然宣佈要加入民聯，於是全場響起雷鳴般掌聲，打斷了吾爾開希的發言，他妒嫉地說：「劉燕一講話就有戲劇效果，她一句頂我一萬句。」錢達更是妙語聯珠，戲言道：「我由民聯借到民陣，劉燕由民陣嫁到民聯，現在是民聯和民陣和親。」全場大笑。

萬潤南從一進門就聲明大家都是家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和親」這幕之後，整個會場氣氛更像一家人了。雙方完全解除了防備，建立了信任，並開始從積極的方面討論兩個組織合作的具體形式，最後雙方達成三點協議：一是在理論研究和對外公共關係方面雙方要相互配合；二是促成召開聯席會議，作為協調兩個組織之間，甚至海外其他各組織之間的常設機構；三是民聯和民陣互設顧問制度。

民聯聯委會當場提名聘請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陳一諮為民聯顧問，還未等聯委會委員投票通過，萬潤南和吾爾開希就答應應聘。

所有在場的人都承認，這次會議非常成功。吾爾開希幽默地說：「如果我是一個中共特務，在我看來，這個會議糟透了！」所有的人聽罷都會心大笑。

會議使民聯和民陣雙方加深了理解。萬潤南和吾爾開希的誠懇、幽默、謙虛、大度為民聯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得到高度評價。而萬潤南在會議結束的歸途中感嘆到：民聯真是人才濟濟，開起會來有章有法！

輿論界在問：民聯和民陣在熱戀中？

天安門輓歌四首

許倬雲

十五歲的王力

王力，只有十五歲，
一個十五歲的少年，
在十五歲時，却已留下了必死的遺書

十五歲，生命還沒有開始
十五歲！却已準備着死。
因為：
屈辱的活着，比死亡更難。

王力死了：王力的希望復活了
因為：
十五歲的生命中止了，却轉化成
十億人的希望。

天安門

來這裡的遊客們
請你轉告世人：
爲了中國的民主與人權
爲了故人的尊嚴與自由，
我們在這裡倒下了。
你要爲我們作證
兇手是一小撮掌權的人。

六四紀念碑

殘陽如血
白衣勝雪
百萬中國人吶喊

人潮如濤

爲捲盡人間不平事
縱然戰車碾過軀體
也不退，不怯。

囑咐後死者：

努力未盡事業

他日來此地告祭：

天地經過鮮血蕩滌

集權政體已消滅

人民終於有自由

民族也不再分裂。

十丈豐碑立心底，

祭國殤，悼英烈。

招魂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盼歸還」
出發時，送行者爲你扎上的勒額
噙着淚，祝福不易實現的願望
而六月四日那一天，
你就永遠不再回來

他們很年輕（柴玲哽咽的訴說）
年輕的他們竟永遠永遠不再回來。
隔海的招魂，再也叫不回年輕的生命
魂兮歸來！魂兮歸來！
回來罷！回來罷！
回來了！回來了！中國魂回來了！
回來了，回來了，人的尊嚴和希望回來了

你去了，其實你從未離開。

同床異夢不如異床同夢

——在民聯聯委會上的發言

萬潤南



我今天來只講自己人家裡的話，客套話就免了。民陣與民聯的關係一直是各方關注的關係。剛從國內出來的人，由於共產黨的宣傳，對民聯總有些偏見。對胡平，我在國內就瞭解其人，但對王炳章就只能聽到一些道聽塗說了。

前些日子，國內民主運動高潮，聽說民聯內部也有一個小高潮（笑聲）。傳說也很多，後來我看了丁楚寫的「罷王風波始末」，感慨也很深。現在看來對從前的很多看法要重新修正。「八九」民運不就是從一九八九年才開始的，自從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要求民主的運動從來就沒停止過，起源恐怕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七年，現在我們提出的很多口號實際還沒有

超出當時的要求，所以我們有必要把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重新整理一下。從北京之春到中國之春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當然，八九民運是一個最高潮。所以從一個更高的角度出發，我們其實是一回事，你們是先掉進井裡，我們是後掉進井裡。（笑聲）

先掉進去的已經有山頭了，後掉進去的有些還沒有。國內老傢伙說：「要消滅山頭首先要照顧山頭。」這話還是有點道理。所以「民陣」在成立時也有一個定位的問題。一開始就搞一個大聯合的組織可不可以呢？理論上可以，但做起來很困難。但有了民陣這樣的組織以後，反過來又為今後的聯合製造了條件。剛才大家說，促進各團體聯合是當今民運當務之急，但我覺得不要操之過急，不要勉強，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胡平在「新聞自由導報」上有贊成聯合一篇文章，我同意他的觀點。但真正的聯合要等大家都有這個需要時才能成。

「合」總是將來的趨勢，但合不要搞「對撞式」要搞「路軌式」。就像兩車並行，逐漸靠攏，最後自然併入一個軌道，對撞式容易冒火花。那麼「合」的時機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是當國內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當反對派可以合法存在的時候，也就是當共產黨開黨禁時。比如共產黨有五十票，它是一派；而我們有

一百票，如果我們分為一百派，一派一票，還是共產黨勝，如果大家合為一派，就有優勢。到那時，沒有必要分民聯還是民陣，海內外各種力量都需要聯合。從大氣候來看，那一天是必然到來的，東歐、蘇聯都在朝着這個方向走，鄧小平也擋不住，我們要為那一天作準備。我們不能到機會出現的時候才來談這個事情。舉例來說，這次民主運動中，由於民聯內部的事務，沒有準備好，所以失去了一個發揮更大作用的機會。

所以現在的「分」是歷史形成的，我們要正視這一情況，但是「合」又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和潮流。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兩件事：一是互通信息，我看了你們發的關於和民陣關係的文件，很感動。昨天丁楚告訴我他希望這次聯委會通過一個決定，不介入民陣的內鬪。我覺得這是否消極一點？「吾爾開希插話：歡迎介入。衆笑」我覺得是否能積極一點，我們民陣、民聯，再加上全美學聯可以聯合開個會。當然，在此之前相互瞭解是很重要的，這次我來首先是取經來的，你們的文件，通過的條例能不能給我一份，我們回去研究一下。（笑聲）你們幹了七年了，不容易，你們有些條例也許每一條都是好多教訓得出來的，是很寶貴的經驗。

第二件事，我們各個組織可以成立一個協

調小組，在很多重大重大聯合上協調行動，隨着兩條軌道不斷接近，如果哪一天需要時就可以立即並軌，合到一起。中國形勢不可能很快發生變化，所以我們還有時間使兩個軌道更加接近。我覺得做事不要太急，太急了也做不好。我們合作是在兩個層次上，一是輿論上，共同倡議一些活動，倡議聯合；二是在工作班子一級上，有一個協調機構。後者是個實質性的合作，涉及到人員的交叉問題。我一開始就希望胡平、徐邦泰等能夠參加民陣，現在仍舊希望這一點。不過我覺得形式上的東西不是最主要的，如果大家不是一條心，加入了又怎麼樣？異床同夢比同床異夢好。（笑聲）

合的問題要從長計議，如我們準備得不好，當機會出現的時候是分裂，如果準備得好，當機會出現的時候是整合。例如波蘭工會就缺乏準備，當機會來的時候其內部發生一次分裂。所以我們有東歐的經驗、有大陸四十年民運的經驗、有你們七年的經驗，我相信我們的事會辦得更好。

你們開聯委會請我來參加，我很感動，雖然我們是兩個組織，但我們完全可以像一家人一樣相處。我們的理事監事會就有你們的成員嘛，監事會主席也是民聯成員。你們很多盟員也在我們中間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們是否可以把牆拆掉，幹事方便一些。

昨天我會晤一些你們紐約的精英們，（徐邦泰插話：紐約大俠。衆笑）他們爲我分析了一些內圍的可能性，不過我覺得我們兩個組織反而更不容易有矛盾，因爲有個角色分工的問題。丁楚在和我分析兩個組織時說，民聯是一些比較相同的人組成的，容易合，而民陣是由一些不同的人由一個強大的外力壓到一起來的，一旦外力消失，組織就會裂開，不過我的意

見有些不同，我覺得不同的人反而容易整合，因爲有一個角色分工的問題，誰也不可替代。我承認我們民陣內部也有不少矛盾，而這些矛盾恰恰發生在同種的人之間。

我分了一下，現在在民陣中有五種角色，海外的僑界學生可以算作一種，另外國內逃出來的有四種人，一種是知識份子，像嚴家其、蘇曉康、遠志明等；第二種是學生，如吾爾開希、李祿、辛苦等；第三種是原黨政幹部，如陳一諮等；第四種是原企業界的，像我和四通公司的人，做具體事的。其實這四種人之間的合作很容易，誰也代替不了誰，大家互補，同一種人之間反而有矛盾，這個角色的代表爲什麼是你不是我？

在海外，各組織、民陣、民聯、學聯等，可以各有各的旗號，但具體工作上可以互補，聯合幹一些具體事。用一付面孔做事反而不方便，我們可以發揮角色分工的優勢。

我覺得我們在海外活動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少犯錯誤，共產黨肯定會犯錯誤。政治上成功的一個關鍵之處在於看誰錯誤犯得少。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一支隊伍，團結更多的人，保持壓力，蓄勢待發。孫子兵法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爲上。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有意義。其實我們在海外也做不了多少事情，這一點我們要有所認識。

我下面可以介紹一下我們民陣在今後一年中所要做的事情，當然我們的工作計劃還需要由理事會批准。第一件事是發展組織，把所有基層組織建立起來。所以我剛才看了你們的關於基層組織建立的文件，非常值得借鑒，我看我們兩個組織在基層是否可以搞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有些地方本來也沒多少人，你去搞兩套人馬，一定會出現問題。我看我們上面也不要做

什麼規定，讓下面去幹就是了。兩家婆婆別干預。上面要考慮歷史因素，角色分工問題，可是對於下面，特別是新地區，可以先合起來。我們可以從基層開始整合。另外，有一些具體事情，如公共關係、理論討論等，能合則合，不能合，也要有個聯絡方式。

我的計劃是一季度做一件事，到今年年底，發展組織的事情、開基金會的事情、辦刊物的事情要做好，把架構搭起來。明年三月我們想開一個佈達佩斯會議，這是民陣主席嚴家其和西德訪問時提出的，把蘇聯、波蘭、匈牙利、東德的人都請來，專門討論在一黨專政下怎樣結束一黨專政。它的道路、方法、前景。目的不僅僅是開會，還要做大量資料收集、分析、研究工作。

六月份，「八九」民運一週年紀念，我們準備搞一個中國民主運動的討論會。這個討論不僅要追溯到北京之春、天安門事件，還要一直追溯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如果我們把整個歷史精彩的東西拿出來看的話，就會發現，很多東西是一脈相承的。我們要着重總結教訓，人不能總犯同樣的錯誤。這次「八九」民運的參加者就不知道北京之春是怎麼回事，如果我們知道了共產黨的一貫作法，我們「八九」民運的很多做法就會聰明一點。

然後，九月份就要開民陣第二次代表大會。實際我們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一年中能做好這四件事就相當不錯了。如果認識不到這種局限性，而非要去硬做什麼，反而會把事情搞壞。

我知道你們開會發言是限時的，我佔了好幾個人的時間，對不起。



害人之心沒有 防人之心不必有

——在民聯聯委會上的發言

吾爾開希



吾爾開希：假如我是中共間諜。

們害人之心沒有，現在好些人在想一定要搞好民聯和民陣的關係，一方面要合作，一方面不要被它吃掉。我們民陣好些人也這樣想。其實我們雙方考慮怕被對方吃掉的時候，就沒有想過要去吃掉對方。害人之心根本沒有，防人之心就不必有。我的意思就是這個。

民陣和民聯應該是一脈相承。我不是給大家戴高帽子，在海外這麼多年，這民運堅強的堡壘，不就是一個民聯嗎？我們在國內聽到中國之春，都激動得不得了。（黃奔插話：現在還激不激動？）現在國內聽到民陣，也會激動得不得了，你們當初對我們造成這麼大的影響，這就功不可沒。當然，出來面對面的看，到底是不是英俊男子，就看的比較清楚。從怕被對方取代，到現在民陣民聯聯合是一個進步，我們可以團結大多數的人，我們在一夜之間長大了好多，我們合作要看角色分工，要把對方看作自己人。我在下面說，這次學運出來個吾爾開希，下次學運出來個六爾開希，比我更出名，然後我就沒戲了。再下次出個七爾開希，六爾開希又沒戲了，但七爾開希，八爾開希必須不斷進步才對。

萬潤南秘書長把我想講的很多話都講了，我剛才坐在這裡聽，我有一個設想，如果我今天不是民陣副主席，而是共產黨派出來的間諜，我會認為這個會糟透了，對我十分不利，為什麼呢？因為共產黨怕什麼？希望什麼？八九民運出來一個「民陣」，北京之春出來一個「中國之春」，今後還可能出來一個「民協」什麼的，共產黨就最希望這些組織都打起來。古人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句話是我們古典文化的結晶，我現在想說：咱

我很欣賞「鄧小平同志」一句話，說我們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有位西方科學家前兩天在哈佛與我討論過，中國在海外有個奇特的現象，唐人街現象，很少有一個民族，在

國外能夠吃掉一塊地盤把它變成自己的。我說不對，不是說把它變成自己的，而是自己根本不肯改變，有些唐人街的朋友在國外呆了幾十年不會說英語，不能咱們拍拍肩膀，多賺美國人的錢。民陣和民聯不能成為非常好的，親密的朋友和兄弟的關係。在巴黎大會時，我會經非常急迫地希望胡平和徐邦泰兩位老革命加入我們民陣（劉燕插話：今天我是來加入民聯的）。（劉燕的話引起大家熱烈鼓掌）她的一句話比我講這麼多還精彩。（徐邦泰插話說：一言九鼎，一句頂一萬句。錢達說：這是民陣與民聯「和親」全場大笑）。其實我們硬把這兩位主席往民陣拉，這是不對的。大家是好朋友，參加不參加都一樣。國內流傳一首歌，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確實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民陣一個月來存在一些問題，民陣的思想統一是否做的很好，這裡有三位理事，一位監事主席，如果出個考題：大家對共產黨態度怎麼樣？大家回答就可能不一樣。在組織建設上，剛才看到你們很多條例，我們就缺少這些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弱勢，比不上民聯，民聯畢竟有七年的歷史經驗。可我們也有我們的優勢，是由時代造成的，這種優勢如何給民聯的長處聯合在一起，我們才能更好的發揮力量。（掌聲）

陳一咨論海外民主派大聯合

徐邦泰 錄音整理



陳：民聯聯委會開會，邀請我，按道理是應該參加的，兄弟組織嘛。只是我這次旅行的日程早已排定，不能失信於人。我對小馮（馮勝平）講過，非常抱歉，但我預祝大會成功。

徐：我想，有一個補救的辦法，我請你先談談看法，屆時，我可以放錄音或代為介紹你的意見。就談談民主大聯合吧。

陳：好。我覺得，只有我們海外的民主力量結成最廣泛的聯合，才可能有效地使得大陸上的獨裁者分化瓦解，亦才可能使我們在政治上立於不敗之地。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要建立一個自由的、繁榮的、富強的新的民主的中國。實際上，我從六月五日逃離北京以後，七月上旬離開大陸，我一路上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時間：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
地點：舊金山。
陳一諮：民陣理事，原體改所所長。
徐邦泰：民聯聯委會主委，留學生。
徐：陳先生，巴黎民陣成立大會上，你專門就民主派大聯合的問題發表過演講，華盛頓理論討論會上你又講了一次。本月廿八、廿九日，民聯在紐約舉行聯盟委員會第三次全會，我非常希望你光臨，一起共商大計。

中外罕見的。這激起了全球華人的無比憤慨和義憤，大家都在思索，有着如此悠久歷史傳統文明的國家，竟然逃不出歷史的輪迴，如何才能適應現代化的激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這種空前的一致是十分可喜的。第三，各國的人民、政府、社會團體，通過「六四」屠殺，既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和平善良和他們對於人權民主自由追求的一致，又看到了這樣一個政權的腐朽、獨裁違反人的天性，對中國人民充滿了同情。同時，對這樣一個政權進行不斷的譴責和制裁。這三個大變化，是我們實現大聯合的根本性的前提。

大聯合有沒有條件呢？第一，我們的基礎條件比任何時候都好。無論是當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還是當年國民黨共產黨成立，都沒有這麼廣泛的群眾基礎，這麼多的骨幹，同時世界的環境，亦從來不如現在這麼好。六十年代前是冷戰環境，六十年代後是經濟增長環境，八十年代初期以來是民主化加快的環境，包括像菲律賓、巴基斯坦、土耳其、西班牙，甚至智利這樣的國家，都用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權。大環境的第二方面，列寧主義型的黨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國家都紛紛在進行變革。波蘭、匈牙利的變化令人鼓舞，連最頑固的東德亦在變化，蘇聯正在變化中，這些變化對中國都會有影響。第三方面是亞洲的環境，落後的東南亞國家都在發生變化。十年左右，甚至印度、越南這些國家發展順利的話都會遠遠超過中國。十年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看清了外部世界，尤其是知識份子，看到了世界的民主潮流和趨勢，看到了中國的落後，不再會被封閉的專制的政治禁錮，對人權民主自由的追求更為急切。從另一個角度講，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勇鬥

爭，始終沒有越過門檻，幾個基本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但在發生上述變化的情況下，我認為，十年二十年將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上一個最輝煌的時期，「六四」慘案固然是場悲劇，但它從反面動員和教育了我們整個中國人。同時，這血的代價，使幾代人一起覺醒，再從更廣的歷史角度來談，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這一二十年中可能面臨的危機和挑戰。本世紀末，大陸上將有十三億人口，在資源短缺、制度腐敗的情況下，中華民族面臨着一個生存的危機。我們這樣一個民族應當在世界之林擁有我們自己的地位，作出貢獻。我們如果錯失良機，中華民族將淪落為三等民族。一切有理想，有良知，有眼光的中國人都應當團結起來，這是基礎條件。

第二，我們有許多共識。比如說，在反對「六四」屠殺，保障基本人權上，大家是一致的。比如說，在進行制度變革，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上，大家是一致的。比如說，在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動原則上，亦是共同意識到的。今後要用民主的方式建設民主中國，建立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反對成則王，敗則寇，以暴易暴的方式。以暴易暴往往給民族帶來更大的災難。我和嚴家其曾經討論，他們說我們是反革命，我們就是要反對革命，倡導民主。之所以如此，幾乎每一次革命都帶來很大的破壞。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破壞。上述四點共識綜合起來，可看出我們面臨一個興衰存亡的關鍵時刻。

如果我們不通過一種聯合來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建立一個繁榮富強的民主的中國，那我們既對不起我們的時代，歷史前輩，也對不起我們的後代。

徐：你能不能具體一點，談談眼下幾個民

運團體的合作與聯合？

陳：現在，我就來談談我們的聯合走到了什麼程度？我覺得八九民運，實際上是以前學生為先鋒的各階層廣泛參加的一次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經過「六四」屠殺之後，這樣一個運動式的鬪爭已經轉變為中華民族反暴政爭民主的鬪爭。這場鬪爭有明確的綱領，正確的策略和一個穩定的領導集團，而不能再採取運動式的，口號和目標不明確，領導人不斷變換的，組織化程度很低，鬪爭的原則和策略很不清楚，隊伍不穩定的做法。民陣的成立標誌第一個宣傳鼓動階段過去了。民陣大會是一個聯合的大會，打破了國民黨共產黨的界綫，打破了左中右的界綫；同時又是一個民主的大會，尊重了與會者基本意向，同時又是一個團結的大會。總起來，是一個成功的大會。各方面雖有評議，但不奇怪。因為任何一個成熟的政治運動，它的發展總有一個過程。民陣內部，如何建立一套民主的制度，這需要一個過程。民陣骨幹隊伍的形成，一批領袖的形成，都要個過程，民陣的對內對外政策，亦要有個過程。

民陣的出現亦是適應大聯合的要求。不是民陣可以代替其他組織，我不這麼認為。我的朋友講民陣應當理所當然地擔起這個大樑，我認為民陣應當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民陣不能起到這個作用，取決於綱領、政策、方略是否正確。不能一開始就把自己變成老大、盟主。否則，會盲目自大。既然民陣宣佈自己既不是嚴密的政黨型組織，又不是無形的鬆散組織。那麼，我們就要最廣泛地團結人。綱領、方略和政策最大地有利於團結海外華人，最大限度地有利於取得各國人民和政府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有利於獲得大陸民衆的同情和支持。如

果我們無法作用於大陸，成功僅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我們已邁出第一步，現在要邁出第二步。

徐：對民陣邁出的第一步，有一種意見認為不太成功。理由是，你們五人在巴黎倡議成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時，曾聲明歡迎組織和個人參加。芝加哥會議後改變為個人參加。這樣就產生與會代表的合法性，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而在實際上，錯過了一次整合的機會。這種優勢是十年二十年難逢的。當然，在操作上也許會有難處，不知你意如何？

陳：確有困難。如果歡迎團體參加，像對民聯有兩種意見，鬧不好會分裂。為此，我們還是歡迎個人參加。

徐：這大概就得邁出第二步了。你對第二步有何設想？

陳：近期召開各大民運團體的聯席會議。從道理上講，一切為了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的組織都有權利參加這種聯合，但在實際上，一個三個人和一百萬人的組織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所以最先的發起單位應該比較大的。一個組織派二三個人以個人身份參加，發起召開聯席會議。如果民陣、民聯、全美學自聯、台灣的國民黨方面、民進黨方面、港支聯方面、達賴喇嘛方面，等等，都有代表出席，一年召開兩次，發個公報，對大陸的獨裁者都起分化瓦解作用。第一次會就可討論如何在項目、人員、資金上合作。這樣，可做到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徐：陳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這次民聯聯委會的召開，之所以邀請民陣方面的負責人參加，正是想相互交流，達成共識。我個人非常欣賞你的建議。後天會上，我將向各位介紹。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上)

江河海

編者按：本刊記者最近採訪了三名剛從大陸來的中國留美學人，他們是中共六·四大屠殺下的幸存者及活的見證人。他們提供了許多極寶貴的第一手材料。為了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及他們的家人的人身安全，我們全部抹會化名「江·河·海」以代之。本刊記者則用「問」代之，如果一些內容有可能暴露他們身份的話，我們只好忍痛割愛。在成稿後，本文經他們審閱、修改、校正。現在發表，以饜讀者。

海外影集害了國內人

問：今天請大家來，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知道你們都在國內積極參加了民運。而現在又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逃出了中國。不知大家離開中國後的最深感受是什麼？

江：我現在的心情十分複雜，就和基督山伯爵一樣，一方面是我感恩；一方面是復仇。我感謝那些保護過、幫助過我的善良的人們。沒有他們，我是決不會來到美國的。但我也要復仇，向那些告密者，那些劊子手，那些用同胞的鮮血染紅了頭上頂帶花翎的敗類們復仇。當飛機離開虹橋機場，衝向藍天時，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可算逃出來了」。上海機場裡公安人員非常多，戒備森嚴，和往日大不相同。

同。他們嚴格地檢查我們的證件，而且在過道中來回走動。我當時心情緊張極了。說實話，在北京這幾個月，我見到公安人員心裡就有些打哆嗦，生怕他們逮捕我。幸好在我出境時一切還順利，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

河：我剛下飛機後，時差還沒調過來，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我的朋友將他們在這裡電視台錄製的六·四那天的情景放給我看。我看了幾小時，一點兒也沒感到疲乏。我的朋友總問我：「怎麼樣，是這麼回事嗎？」我常常沒有回答。因為我的心又飛到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從四月十五到六月四日，我天天去天安門廣場。我能說出鏡頭中是哪一天的天安門廣場。我感到六·四那天的鏡頭還是太少了。我現在非常思念家人，感到自己是異鄉人，十分不習慣，但又不敢回去，內心十分痛苦。

海：我來後，看了不少報刊。如世界日報、爭鳴、九十年代、中國之春。當然，也有人日報海外版。我還看了一些海外出版的一些有關天安門廣場的圖片、文集。除了人民日報是造謠外，其他報刊的報導大部份是真實的。基本上和我看到、聽到的情況一致。當然，有一些細節和局部上也有失實的地方。不過有一點我必須指出來，很多文集，尤其是圖片，暴露了很多人。海外出版這些照片，不管主觀上



是想推進民主運動也好，還是爭浪潮趕時髦也好，實際上害了不少人。

問：請問海先生，能將這段話解釋得更清楚些嗎？

海：請看這張相片（指某文件中的一張），每個人的面孔服裝都十分清楚。後面單位的名稱也十分清晰。中共很可能沒有這張相片，那麼好了，這張相片就幫了他們大忙，他們很容易搞到本文集，那麼相片上這些人就倒霉了。

還有十九萬人漏網

問：我想出版單位是考慮到這一點了，你看相片上的主要人物的眼睛全是被遮攔住了嘛！

海：那有什麼用。人的眼睛雖看不見了，但根據臉型、髮式、衣着，仍可一清二楚地識別出是誰。你們在海外大概不知道現在國內整肅的厲害程度。本應在九月三十日結束的第一階段整肅並沒有達到目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過「從電視錄像及相片上看，在六月三日及四日大約有二十多萬暴徒參加了攔、燒軍車、攻打解放軍，可我們只抓了一萬多人（編者按：注意，只抓了一萬多人，還嫌少！），還有十九萬多人沒有找出來。所以，第二階段整肅工作從十月一日起又要掀起新的高潮。將相片及錄像帶分解是他們在第二階段中的主要做法。這就是說，只要在相片上，錄像帶上看到某單位的名字，就要將有關部份複製下來，發給這個單位的清查小組。一定要將相片上錄像帶上每一個人都找出來，然後和他們分別談話，採取誘供、威逼的攻心政策。比如第一階段中，串供是大家一致的做法，那麼在第二階

段，有這些證據的話，串供這種做法就不一定靈了。你說你沒去過廣場，但現在相片就擺在你面前。即使蒙上了眼睛，也一看就知道是你。那麼好了，剛才你說你沒去過就是撒謊，你在欺騙組織，態度不誠實。你已被清查小組攻破了第一道防綫。下一步，他們將迫使你交代：你旁邊這個女同志是誰，誰是組織人。若拒絕合作，那麼對不起，你就是組織人。不少人當然不敢承擔組織人這一罪名，因為這有被抓起來坐牢的可能。可是他們只好將組織人供出來，那麼清查小組再和這個被供出來的人談話。比如問他：「你是不是組織人？」如果他否認，那麼清查小組就會說：「早有人供出你來了，請看口供。」當他看到和他一起串供的人將他供出來後，也許會怒火沖天，也許會感到一切全完了，還是爭取坦白從寬吧。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一會兒大伙兒就都被找出來了。

問：這真是太糟糕了，我們確實沒有想到他們手段的卑鄙、殘忍。可現在很多文集已出版，無法收回，只能提醒人們以後注意。請問首都的民衆是如何對待這次整肅的呢？

江：在這種白色恐怖下，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在各基層單位採取的做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經常出現領導保群眾，群眾保領導的現象。

集體串供 個人否認

問：這真是十分有意思，難道群眾選保領導嗎？

江：是的。因為這次運動捲入的人太多，連許多單位領導也參加了遊行，這批領導有良心，群眾需要這批領導來保護他們，他們也要

保護這些領導。那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第一個做法就是串供。比如某單位（名字略去）在戒嚴令下達後選遊了三次行。因為戒嚴令前遊行和戒嚴令後遊行在處理起來是大不一樣的。那麼參加過遊行的人就要商量對策，主要是要保護所謂的策劃者、組織者。在這一點上大家的說法要一致。比如說我的一個同事發明了「光緒—慈禧」這條標語（編者：為保護這位同事，標語的全文略去）。這條標語針對鄧小平抓權不放、大搞垂簾聽政的封建統治，是一針見血。但真到追查時，則說是從街上抄來的，別人也予以證實，於是大事化小。有些人會自己去過廣場，清查時則一口否認，於是小事化了。概括說，反清查的方針是：凡集體活動，大家串供；個人活動，則堅決否認。

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清查是非常殘酷的，萬一查出來，後果十分嚴重。我到海外後，看到中文報刊上也登出了關於國內清查的情況。但由於你們身不在其中，決想不到其殘酷性。其特點首先是所有參加者都要先講清楚，後挨整。北京市委確定出十九種人，前十種屬清查，後九種為清理，其餘皆為考察。

清查是敵我矛盾。如吾爾開希、嚴家其這些所謂和海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民運組織者及幕後策劃者等，以及燒軍車、毆打解放軍者等十種人。這批人是要被抓甚至被殺的。

清理是屬於犯嚴重錯誤的「人民內部矛盾」。但其標準十分含糊，範圍大的很，實質上是中共一貫鼓吹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的翻版。例如「與動亂組織者有聯繫者」這一條，就頗有株連九族的意味。盡管被清理者屬「人民內部矛盾」，但對黨員及幹部來說，處理是十分嚴厲的。一般來說，黨員在戒嚴令下達後參加遊行的，要被開除黨籍；參加攔、堵軍車

的，也要開除黨籍，幹部往往還被開除公職。雖然清查對象是指民運的組織者、策劃者；清理對象是指民運的積極參加者，但在實際處理中，兩者界綫很難分清。

至於其他所有老考查對象都要講清楚自戒嚴令發佈以來的每一天的活動情況。要有除家人以外的兩個人以上的證明。因為北京市區的人幾乎人人都上過街、遊過行，所以若碰上有人揭發，考查對象也要變成清理對象。事實上，北京現在大搞人人過關，一片白色恐怖。

但總的說來，學校比黨政機關的日子好過多了。海外的中文報刊常常報導學生和老師如何挨整，其實學校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密雲不雨」。每天教師、學生都有政治學習，但並沒有像機關那樣認真追查。北大的學生、教師幾乎都參加了遊行，要是在黨政機關，相當一部份人都會成為清查或清理對象。但在學校，這批人就相對平安的多。我想主要是因為學校和國際上進行學術交流較多，在國內外輿論上比較敏感。雖然很多黨政機關幹部也是知識份子，但學校的教師、學生們似乎更「名正言順」一些。因此中央在目前還沒有在學校採取大的行動。今後也許會大動手，但是歷史的經驗證明，時機一過，大動手就不容易了。

重點是黨政機關不是學校

河：江談的很好，我想就我知道的事實進行一點兒補充。這次中央打擊最狠的是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尤其在戒嚴令發表後，部、司局級幹部還公開支持學運的，一律都要整下去，以至於開除黨籍、公職。就是在戒嚴令發佈以前所謂十分同情學運者，也要倒霉。比如闡明復本人對此就早有預感。一次他去某單位和幾

個幹部談話時就說：我是以平中百姓的身份來的。談話中流露出要改行、搞搞專業。言外之意是他要下台了。最近他已不再出面。再比如故宮博物院院長五十五歲的張宗培教授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張教授是搞考古的，開除了公職，能幹什麼？誰敢僱用他呢？換句話說，中共斷了他的生路。雙開除的理由何在呢？一是他簽名要求取消戒嚴令，他在長沙開會電告故宮博物院捐款三萬元給廣場上的學生，這當然是支持動亂了；第二個罪名是反對戒嚴部隊，羅列的事實是令人可氣又可笑的。他堅決反對戒嚴部隊進駐故宮，因為故宮裡有大量國寶，一旦被破壞，損失是無法挽回的。但他的反對沒有用，部隊還是照樣進駐。這些進駐的部隊什麼也不管，在故宮午門前的空場升火做飯，張教授堅決反對，認為可能會引起火災。所以戒嚴部隊告了他一狀，他就被雙開除，斷了生路。還有大家所熟悉的著名的演員姜昆、陳佩斯也都被捕了。陳佩斯的罪名是六月三日晚在西單瀾軍車，聽說陳已被釋放。姜昆自己有一部小汽車，借給學生用於聯絡，當然這是支持動亂，現在不知是否已被釋放。被開除公職的司局級幹部很慘，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本領，無法謀生。目前，凡是曾公開表態支持過學運的領導，全部受到整肅。

但對學生、教師的態度，就是客氣一些。比如海外報刊都說北大新校長吳樹青是李鵬的人。他在北大的講話都沒有那麼起勁地批評北大的學生，而是將學運的責任全推到前兩屆總書記身上。那麼北大的教師、學生的責任就不大了。

北京人感到很自豪

問：那麼在這麼殘酷的整肅下，北京的一

般幹部、市民表現如何，大家怕不怕呢？

海：怕還是有些怕的。但北京人全知道真相，非常有正義感，世界日報上有篇文章講，北京人覺得在全國人民面前抬不起頭來，我真不知此文從何而來，正相反，北京人感到很驕傲。北京的工人起碼沒有像上海有些工賊那樣，天天晚上去拆路障。反對學運的人是有的，但在各單位確實是一小撮，他們決不敢在公開的場合下反對學運，只能在暗地裡打舉報電話、寫黑信。一旦他們被發現，就會被全單位人所痛恨，他們往往也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知道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認識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工作多年，提升很慢。原以為要提升為主任，不料單位的頭兒選了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幹部當主任。馬列主義老太太懷恨在心。對主任及提拔主任的書記恨之入骨。學運開始後，主任支持學運，參加了遊行，尤其是在戒嚴令發佈後，主任還遊行。老太太雖沒親眼見之，但也風聞一二。於是，她將舉報信向公安局、國務院、北京市委到處寄，弄得這些頭兒們如坐針氈。因為一旦查實，單位的頭兒就要因提拔了手下的主任而倒霉，主任則黨籍、公職都難保。幸好單位的頭兒有權，居然從公安部門搞到了舉報信的復印件。雖然是匿名信，但從信件的口氣和人們的日常表現已判斷出是誰了，於是他們以攻為守，這幾年來在搞開發，辦公司中，老太太並不那麼清白，加上在這次運動中，她上串下跳，很多人都恨她。於是單位開始整她搞官倒、搞貪污。現在這個老太太也不蹦了，終日愁眉苦臉。當然這種告密的小人在各單位是極少數，一般是二三個人。但他們破壞力很大。領導也怕這種人給本單位找事，使領導的官位不穩，因此這種小人在單位根本不得勢。像我說的這個老太太，她被定為

有經濟問題，因此她的舉報信都成了誣告信，領導們安然過關，群眾也聞之稱快。

用李鵬語錄反李鵬

河：至於廣大群眾，都有正義感，不少人根本就不怕。比如說一名高級幹部的兒子不久前在我們單位的政治學習會上痛哭流涕地講了二個多小時。他說：「我就是想不通，我至今還是支持學生運動。」還有一位國內外十分著名的學者、大師就公開提出了四不：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不問國事。以示對這場大屠殺的抗議。（編者：請原諒我們不公佈他們二人的名字）許多人在政治學習中以十分巧妙的方式支持學生運動，諷刺鄧、李、楊的反動統治。

比如說李鵬十分無能，他說過的許多話都前後矛盾，漏洞百出。那麼他的蠢話就成為大家的擋箭牌。某位工程師在單位政治學習會上發表了如下的發言：「我是共產黨員，我今天應該表態。但我今天不表態，我以後會表態的其實我已經表態了。」會場哄堂大笑。因為這一段矛盾百出的話恰恰是李鵬和學生對話時的一段話，他用李鵬語錄來回答，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另外就是檢查自己時輕描淡寫，一切責任推給上邊。比如一位參加過遊行的幹部檢查時說：「我是參加過遊行，但我個人沒有什麼責任，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響應了黨中央的號召。趙紫陽當時是總書記，他說學生是愛國的；李鵬總理親自去醫院看望絕食學生，萬里委員長說要保護學生的偉大愛國熱情。我一看，這麼多中央領導都支持學生，我要是不去遊行，就是沒有緊跟黨中央的戰略佈署嘛！

當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不都支持學生嗎？誰知道趙紫陽是壞人？我做為一個普通老百姓怎麼會知道中央的內幕？我又怎麼敢懷疑黨中央的報紙與電視廣播呢？讓我今天檢查什麼呢？李鵬、萬里也沒有檢查嘛！我當時就是支持反腐敗、反官倒，現在證明也是對的。因為中央新班子還提出了廉政的七條措施。」然後這位老兄大罵了一頓官倒、腐敗。主持會議的書記也毫無辦法。

電影宣傳效果相反

江：這個政府很笨，他們總是強迫人們做事，結果適得其反。比如他們安排每天下午政治學習，就是念鄧小平的講話，念報紙，但人們越學越反感。前幾天我去國務院禮堂看「巍巍崑崑」這部電影。裡面有一九四七年學運的鏡頭。當銀幕上出現壯大、清華的遊行隊伍時，全場掌聲雷動。要知道觀眾全是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關的幹部，人心的向背就可見一斑了。

政府的宣傳起不到什麼作用，相反還有反作用。比如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片「血與火的考驗」我看就不錯，在第一集一個多小時中有一大半是天安門廣場及遊行的鏡頭，很少加以剪裁，場面十分壯觀，不少人沒有看過這些鏡頭，因此大家看得十分高興。這片電視片好就好在按時間順序，以胡耀邦去世至六月四日，人們可清晰地看出戒嚴在前，攔軍車在後；軍隊殺人在前，燒軍車在後。北京市委編的小冊子「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也很值得一看，很多東西反著一看，就真相大白了。當然不少人看到這種造謠新聞，就氣得慌，像我父母以前一直訂人民日報，

現在就不訂了。

對於上述這些造謠較不大膽的宣傳方式，戒嚴部隊也十分不滿。比如，「血與火的考驗」很快就讓演了。戒嚴部隊又搞了一個片子，這次就完全顛倒黑白。經過剪接變成燒軍車在前，戒嚴部隊殺人在後。

戒嚴部隊四面楚歌

問：說起戒嚴部隊，各位能談談戒嚴部隊的情況嗎？比如說他們之間的關係，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與公安人員、警察之間的關係等等。

江：在大屠殺後，軍隊和人民的關係完全是對立的。現在北京人民特別恨當兵的，不論是戒嚴部隊，還是非戒嚴部隊。我看到幾個鐘頭，感到十分有趣。一個鏡頭是在崇文門菜市場，幾個戒嚴部隊的軍人在買豬肉。肉是裝在塑料袋裡的，因為放着冰，冰有些化了，塑料袋裡有不少血水。一個小伙子走過來，大聲喊道：「瞧，這肉好香啊！還是帶血的呢！」他把「帶血的」這幾個字說得十分重，然後揚長而去。在場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戒嚴部隊的乾生氣也沒有辦法。另一個鏡頭是在西單。因為天熱，太陽晒，戒嚴部隊站崗均用日光傘。兩名婦女走過去諷刺地說：「這個大蘑菇還挺花俏的。」戒嚴戰士也只好默默地聽着。不少人故意從戒嚴戰士面前很近的地方經過，擠一下，蹭一下，大熱天弄得他們十分難受。

至於給戒嚴部隊下毒的事，確實發生過，曾有幾十人中毒。開始時，還宣傳慰勞軍隊，後來就不怎麼宣傳了，戒嚴部隊還專門下了條文，不准接受食物，軍內現在有個絕密文件，專談下毒摸哨的情況。這個文件我是在三〇一醫院一個少將那裡看到的。因為食物中毒的現

象時有發生。包括在自來水中下毒。現在是人民軍隊怕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恨。解放軍被「摸哨」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在西便門，一次就有四名解放軍被「摸掉了」。在護城河也發現了解放軍的屍體，戒嚴部隊便不再敢單人站崗，他們或是三人背對背或三角形站崗，或是二人去馬路上，面對面遙相呼應站崗，在長安街上，戒嚴部隊常常出動百輛摩托車荷槍實彈地巡邏，頭戴鋼盔，令人記起了日本鬼子，或德國鬼子，非常恐怖，但也使人們痛恨萬分。

在北京除了血光敢死隊外，據說還有其他九個敢死隊，揚言要進行恐怖活動，他們宣傳要炸火車站、西單商場、王府井，甚至包括公共汽車。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說，要少上街省得出事。這些目標全是民用目標，是反感的，但它反映了一些人一種盲目的復仇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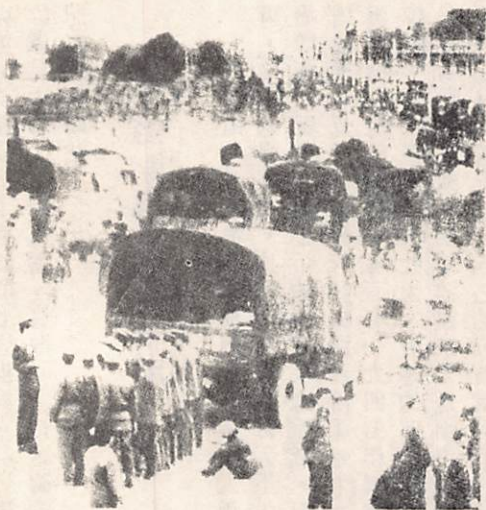
這種復仇心理演這成了一種與災樂禍的心情。聽說西方國家要制裁中國，不少人都說活該；現在北京的外地人少多了，汽車也不那麼擠了，外國遊客少了，大酒店空了。這樣北京的收入少多了，國家旅遊局十分着急，可老百姓都十分高興，恨不得進出口再少些。連體育上也是如此，贏了沒人高興，輸了反而不少人興高彩烈，連聲說活該。一個國家的人民不愛自己的國家，那麼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前途？

公安人員對軍隊不滿

海：我認爲一些警察及公安人員，據他們反映，不少警察及公安人員對戒嚴部隊十分不滿。大約有三千多名警察及公安人員這次捲入了學運，參加了遊行。其中一部份人被捕或被開除公職。我們單位一個同事的妹夫是警察，

因爲參加了遊行被開除了公職，家中生活都成了問題。還有一位副處級的公安人員及其助手因同情學運，在獄中幫助那些被捕的學生及市民傳遞消息、串供，不斷走漏了風聲。他們被開除黨籍、公職並被抓起來。

戒嚴部隊在北京以老大自居，根本不將法放在眼裡。一次他們開車過快，被交通警察攔住汽車。從車上跳下幾個戒嚴戰士，不由分說將那個交通警拉上汽車，開到部隊駐地。說這個警察故意刁難戒嚴部隊，把他狠狠打了一頓。後來給他所在的交通大隊交涉後，戒嚴部隊才放人。當他回來後，他的同事都大罵戒嚴部隊，在心中結下了仇恨的種子。



北京成了戒嚴部隊的天下。

由於戒嚴部隊打人太狠，也引起了公安人員的不滿。人落到戒嚴部隊手中就沒有好下場。一位十五歲的中學生被戒嚴部隊抓起來，關了二十多天，天天挨打。放他出去後，戒嚴部隊還威脅他不許到處講。當別人問他被抓後怎

麼樣時，他只是默默地撩起了衣服，讓人們看他的遍體傷痕。首都賓館的工作人員有四十多人因會衝擊市公安局而被戒嚴部隊抓起來。在電梯裡就劈刀蓋腦地打；抓上汽車後又開打，相對地講，落在公安人員手中還好一些，關在秦城監獄比被戒嚴部隊抓去要好得多。

公安部這次對戒嚴部隊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六四大屠殺時，他們也有人被打死。當時學生領袖是公安人員輪流盯梢，換班接力。可解放軍槍聲一響，市民、學生跑，那些便衣人員也是人，也要跑，結果他們花了很大力氣才盯上的人全跑了，他們當然不滿。

第一監獄天天處死人

問：海外傳說有不少人被秘密處死，你們是不是知道這個情況？

海：秦城監獄似乎不是沒有。比較著名的民運人士全關在那兒，如鮑彤、包遵信，他們表現都十分好，一言不發。如鮑彤連問他叫什麼名字都拒不回答。如果包遵信招供了，我恐怕就要被捕了。

但永定門外的北京第一監獄就有秘密處死的。七、八月間，每天上午九時都有一輛刑車開去，拉走幾個人，就再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人去哪兒了。這個監獄關的都是些無名小卒，即使處死了，也沒有太大的社會影響。這裡我還要說一點，中共這次處死的不少人都是所謂的「二進宮」。這些人過去之所以犯罪，與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的一連串失誤及文化革命的錯誤有直接關係。因此可以說中共把不少「人」變成了鬼，在這次八九民運中，偉大的民主運動教育了這批人，他們真正認識到他們靈魂中作爲「人」的那一面，煥發出無比的熱情

。我認識這次在北京表現最勇敢、最無私、最無畏的並不一定是學生，而恰恰是這些歷史上有過污點的人們。他們在這次民運中要用自己的行為表明他們已經由「鬼」變成了「人」。但中共對他們鎮壓最狠。因為中共知道這批人「有前科」，即使處決了，社會影響很小，於是，便把這批人真正變成了冤鬼。

高幹家屬多冤魂

河：關於戒嚴部隊的殘暴，我還想補充幾個例子。據我所知，連薄一波、劉瀾濤的司機也都被打死了。其實這兩名司機都是支持政府鎮壓學生的。劉瀾濤的司機六月七日那天，在陽台上大曬大叫，向戒嚴部隊表忠心，告訴戒嚴部隊暴徒們往哪個方向跑了，好讓戒嚴部隊快點兒去追。但樓那邊高，戒嚴部隊也聽不清楚，以為這小子在比比劃劃地罵他們呢，這批射手都是偵察兵、神槍手，一槍就把他打死了。薄一波的司機平日仗勢欺人，耀武揚威，開一輛大「奔馳」，以為無人敢阻擋。他在送薄一波家人去醫院的路上行進速度較快，戒嚴部隊要他停車檢查，他沒減速，以為人家不敢將他怎麼樣。結果對方一梭子掃過來，將他打死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院長關山復的女婿也被打死了。他當時就在復興門二十二號樓上。這個樓還有一個保姆被打死。非常有趣的是戒嚴部隊一個副軍長的老婆也被打死了。這個副軍長警告他老婆不要上街，於是他老婆沒上大街，就在家門口乘涼，他家就在公子塚到木樨地之間住，不料戒嚴部隊追殺到小胡同殺人，恰逢他老婆在大門外，被戒嚴部隊一槍打死。聽到的，人無不拍手稱快。這些人全是高級幹部的親屬司機，住的都是高幹住宅區，也沒有逃脫死的

命運，當然他們還可以告一告狀，獲一筆高額賠償費。但對於一般老百姓，就是誤傷，也無處講理。現在許多北京市民在家人被打死後，不承認是誤傷，乾脆就說是參加了動亂。因為人反正是死了，將來案子一旦翻過來，他們就是烈士。而誤傷在任何場合下都是誤傷。不要看江澤民、袁木他們信誓旦旦地說鐵案如山不可翻，人們相信現在的「衛士」，將來連祖墳都會被人剗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人民的信念。

天安門廣場強顏作歡

江：這個政府太虛弱了。比如十·一慶祝活動，參加遊園的人每個人都要填政審表，參加過遊園的人不許去。其實沒人願去遊園，去的人也有不少遊過，只不過沒被揭發出了罷了。至於十·一前在天安門廣場組織跳什麼集體舞，就更可笑了。規定一律不許請假，連病假也不許請。二千六百人在廣場上強顏作歡，在刺刀下載歌載舞，比文革時跳忠字舞還過份，因為當年不少人還是以崇敬的心情去跳。現在則讓人聯想起當年猶太人在德國人的刺刀下在集中營中演奏「藍色的多瑙河」的情景。

政府強迫老百姓買國庫券不說，最近又強迫老百姓買公債。國庫券規定是工資的百分之十二，公債是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你的月工資是一百元的話，要買一百二十元國庫券，一百五十元公債，每項都在三個月內扣清，那麼在六個月內，實際上你只發到五十元到六十元的工資，收入幾乎降低一半。老百姓私下淨是罵大街，非常恨這個政府。

(續文見下期)



我願幫中國人獲得自由

政治庇護

專辦

工作許可 遞解出境 H-1簽證
三年早經辦 經驗豐富 成功率高
收費合理 \$1500 華人助理陳先生
DOROTHY A. HARPER
HARVARD LAW BUILDING
691 S. HARVARD BLVD., SUITE B
LOS ANGELES, CA 90005

美國名律師
中國民聯法律顧問
中國民聯盟員
桃樂絲·哈潑

TEL: (213) 381-0187 381-1011 FAX: (213) 381-1601

詳情請問民聯洛杉磯支部 (213) 343-0896, (818) 458-1020



黨中央不安 北京人不服

黎音

偉人和罪人只有一步之差

現在外間傳說鄧小平身體不佳，實際他的心境要比身體更壞。在今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明顯變得脾氣暴躁和神經過敏，失眠症也更加嚴重。七月他去北戴河休養，由其妻卓琳及女兒鄧榕等家人陪同，其間鄧樸方也曾去過兩次。但這個家庭的聚會，已非如往年那樣洋溢着天倫之樂，而是充滿了天倫之憂。

有一次，鄧樸方就康華公司被清查和被取締一事，向其父訴苦，遭到鄧小平的大聲呵斥。鄧小平說：「歷史的功、過祇有一步之差，偉人和罪人也不過一綫之隔。人言可畏呀，你就是再委屈也要忍了，我是為你們着想嘛。否則搞不好，我去見馬克思之後，你們會進地獄的。」當時，在一旁的卓琳和鄧榕都哭了。

鄧小平右目幾近失明，左目視力微弱，兩耳重聽。今年在北戴河下水游泳時間少於往年，並心情沉重，少言寡語。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上的文件，他必親視批閱。每日由隨侍人員為其讀報，主要是讀國際報刊重要新聞。當讀到外國報刊報導他患重病或逝世的消息時，他會憤憤地說：「他們是盼望我死啊！」

現在鄧小平受到上層保守勢力的壓力也很大，陳雲、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對他這位改革、開放的所謂「總設計師」重用胡耀邦、

趙紫陽所造成的「失誤後果」，都持批評態度；而一些傾向開明的高層幹部與軍中將領，則對他決定出兵鎮壓學生運動心懷疑議，背後常有微詞，鄧心裡十分清楚。因此，當前鄧小平的處境可謂腹背受擊。不過中共上層都深明現在離不開這個權威「家長」，出於專制特權集團利益的需要，他們還要一致捧鄧、擁鄧、樹鄧。所以，如今鄧小平實質是處於一個「內壓外捧」的虛偽地位，鄧對此也胸中瞭然。特別是通過今年的學運、民運高潮，鄧小平發現自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已幾乎喪失殆盡，這既使他吃一大驚，更使他惱羞成怒。當他在楊尚昆、李鵬的縱容下，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孤注一擲之後，又感到了難言的沉重心理壓力和可怕的后顧之憂。接近他的人都明顯地感到，僅僅幾個月時間，他好像一下老了幾年。難怪他的女兒毛毛在電話裡對王震說：「王伯伯，請您勸勸我爸爸退休吧，那樣他還能多活幾年。」

江澤民看李鵬眼色行事

江澤民出任中共總書記是鄧小平親自提名的。因鄧經常去上海，江澤民有條件與鄧接近並當面匯報工作，得到鄧直接面授機宜的機會多；且江澤民極善於阿諛逢迎、察言觀色，緊跟鄧的指示辦事，所以，取得了鄧的歡心和器重。在北京出現所謂「動亂」和「暴亂」期間

，江澤民又堅定地支持鄧、李、楊；萬里出訪美國、加拿大提前返國在上海停留期間，江澤民接受秘密指示，「說服」萬里倒向鄧、李、楊一方，因此也立了功。故而鄧小平決心破格提拔江澤民當總書記。然而，江在中共上層元老派中毫無根基，遠不如李鵬的根子硬、門子廣、腦子活。所以，儘管江澤民在黨內地位比李鵬高，但上任以來却要時時看李鵬的眼色行事。

現在國內民衆紛紛議論：江澤民遠不如胡耀邦和趙紫陽有工作能力，更無胡、趙的魄力和勇氣。在中共常委或政治局會議上，李鵬講話無拘無束，談笑自如；而江澤民講話則十分謹慎，並常常是重復李鵬講過的話，除了說些左腔左調之外，毫無新意。

鑒於趙紫陽在任期間曾培植個人的班底勢力，後來成了一條罪狀，所以現在江澤民不敢再拉個人親信進上層班子，不敢再搞「智囊團」，儘量迴避給人造成培植個人勢力的印象，更怕有人說他搞「上海幫」。因此，他在中央可謂人單勢孤，人們背地稱他是「扶不起的兒書記」。

在七月下旬的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江澤民提到應設法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制裁，避免造成在國際間的長久孤立，但却當即遭到李鵬的嚴厲駁斥。李鵬甚至有些怒氣沖沖地說：「我們不要怕他們搞什麼制裁，不要怕嘛，你總

書記要首先頂住。」當場使江澤民很尷尬，紅着臉半響沒吭聲。

據瞭解江澤民的人反映：江澤民被拉上總書記這把交椅，實在是趕鴨子上架。不但他根基淺、能力差，難負重任；而且前兩任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使他坐在這個位置上心裡忐忑不安，總認為不如在上海當地方官更安全可靠。特別是中央上層的人事關係來歷複雜、難處，搞不好會得罪三親六故一大群。自己單憑鄧小平這根風燭殘年台柱的支持，未免禍福難測、前途未卜。何況身邊總有個皮笑肉不笑的陰陽臉李鵬，還有個擁兵自重、老謀深算的楊尚昆，令江澤民想起來就心裡發毛；至於那些老而不退，退而不休的「老人幫」也讓人頭痛，各個都會以老賣老，常常憑着老資格指手劃腳地亂發議論，使人無所措手足。為此，江澤民到中央上任以來，心情一直不像在上海時那樣輕鬆愉快。為保險起見，無論大小問題他都要開個會、碰頭頭研究研究，再者就是請示鄧小平。所以有人說江總書記比歷屆總書記都喜歡聽取別人的意見。

今年夏天在北戴河，鄧小平曾兩次與江澤民在談話中表示，有意在適當時機，讓江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一職，但都被江婉拒了。不久前，鄧小平對江澤民講：「你一定要大膽工作，要敢於承擔風險。」可越聽到「風險」二字，江的心裡就越有些怕怕。現在，中央在鄧小平的建議下，有意通過新聞媒介的大肆渲染提高江澤民的威信和影響，樹立以江為首的核心領導地位。這又給江澤民增加了一份負擔，因為他恐怕有關他的活動及言論的報導出現差錯，所以凡報導他的重要新聞稿，他必事先調去親自審查，還要在上面改來改去，塗塗點點。

江澤民翻來覆去講些空洞無物的政治陳詞

老調，還要登在頭版頭條，這又引起了李鵬的暗中不滿。李鵬不久前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講過，中央六名常委有分工，希望新聞媒介全面反映、報導，體現集體領導的作用。但他最後補充一句話：「當然是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集體領導。」

江澤民與李鵬就是處在這樣明合暗鬥的矛盾之中。



趙紫陽上書鄧小平訴冤

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職務並接受審查以後，八月中旬曾給鄧小平寫了一封長信，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被指責、批判而據理辯解、鳴冤叫屈。據內部知情者透露：趙紫陽在這封長達十四頁的信中，歷數鄧小平當年調他到

中央，先後動員、支持他出任總書記時的種種許諾。鄧當時對趙曾不止一次講過：「你放開膽量去幹好了，我就是你的後台。」鄧也說過：「怕什麼？天塌下來我和你一同頂着。」趙在信中發問：「在關鍵時刻您為什麼不為我主持公道？莫非您真的相信我會搞分裂？」趙紫陽還在信中列舉大量事實，說明自己在主持工作期間，重大原則問題都是經鄧同意之後才去執行，並且從未脫離集體領導路線，為何就因對待學運的意見分歧，而輕易否定一個人？……

據說鄧小平把趙紫陽的信看了不止一次，而且有些動容，可能他的內心也感到歉疚吧。所以在對待趙的處分上，鄧小平一直表示：「要謹慎」。可是李鵬却顯得有點急不可耐，九月初，他又將一份有關趙紫陽前「智囊團」中逃到海外的人士活動情況報告，送到了鄧的案頭，想以這些人的所謂「叛國」罪行，進一步證實趙紫陽早已有預謀反黨和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制度，企圖將趙送上審判台，其用心不可謂不毒。但是由於鄧小平已有心保趙，而萬里、徐向前等一批黨政軍內有影響的人物也表示對趙的處理「應適可而止」，故李鵬的算盤恐難如意。

李錫銘設計誤導海外輿論

今年五月下旬以後，由於中共加強了對新聞的控制封鎖，因此曾一度造成海外有關大陸方面新聞消息傳播的混亂，此種情況引起中共的相當注視。於是中共便順水推舟，策劃了一個損傷西方（海外）傳播媒介信譽的陰謀方案。

據會執行過這一方案，現已來到海外的某

人士透露：最初提出此一方案設想的是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他在給李瑞環的報告中稱：迎合西方某些資本主義新聞媒介關心中國消息，追求獨家報導，希望造成轟動的職業獵奇心理，我們不妨搞一點易為人接受的（或有點爆炸性的）、但短期即可被揭破的偽品，通過一定渠道有針對性的透給他們。讓他無實無據地一時痛快，我可有實有據地進行闢謠，贏家當然是我們。這樣幾次下來，看還有誰相信資本主義那一套，使他失掉對我們進行攻擊和歪曲的市場。

李錫銘的方案當即被李瑞環所肯定，並轉喬石審閱，喬石也表示同意，隨後很快就責成有關部門具體落實，整個運作是在極絕密的情況下進行。

菜市口大標語「北京人不服」

七、八月份中共公安部曾多次通令各省、市自治區加強收繳散失在民間的武器彈藥和搜捕民運份子，但由於少數民族同胞及邊遠地區民衆對民運多持同情和支持態度，對民運人士進行營救掩護，所以，中共公安部的通令收效甚微。這些攜帶武器、隱藏在民間的民運人士，已成了中共十分憂慮的心腹之患。

現在，國內相繼出現了許多地下反共社團，除了已經見報的「血光敢死團」之外，一些城市和縣城還屢次發現以「民志會」、「振興社」以及「八·九民運推進組」等名義散發的反共傳單，這些神出鬼沒的地下組織，雖無千軍萬馬之勢，但却使中共當局比對付千軍萬馬更傷腦筋。

據北京來人反映：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後，在北京菜市口的一個大樓上，張掛出一幅大

標語，上寫：「北京人不服！」五個大字，每個字長寬足有三尺，非常醒目，街頭駐足觀望者甚衆。當局雖然明了這幅標語的含意是說，北京人對中共鎮壓學生和實行戒嚴表示不服，可是單從文字上又找不出打成反動標語的藉口。這樣的標語使中共專制者尷尬，使人民大眾痛快，可見如今的國內民運志士，已更注重在特殊環境下的鬭爭策略。

中共當局近來一再強調：對民運人士的鎮壓、追捕要「除惡務盡，不留隱患」；袁木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警呼：中國存在出現新的「動亂」的可能。可見中共專制者對已在大陸民間逐漸擴展的民運火種是何等畏懼。至於談到「除惡務盡」，現在老百姓說得好：誰惡誰善，難說難斷，騎驢瞧帳本，還要走着看。

強收「暴亂費」民怨沸騰

繼中共當局對各界民衆進行「動亂」和「暴亂」的人人過關審查之後，又首先在工人中收繳「暴亂費」。所謂「暴亂費」，係指在四一六月民運高潮中，因上街參與遊行、示威或觀望活動而影響上班工作者，以及因罷工、停產而造成損失者；有同情民運言論而起「消極作用」者等等各類工人，需交納的一種變相罰款。金額由二十一四十圓人民幣不等，視情況而定。當然，「違法」者就另當別論了。此法最早由西安行起，現已傳至上海、北京並有在各地鋪開的趨勢。一些工廠規定，凡列入應該交納「暴亂費」者，如不主動交納，便由當月工薪或獎金中扣除，搞得工人怨聲載道，罵不絕口。

收繳「暴亂費」的作法，也開始在個體商販中進行。人們擔心會推廣至機關、學校等事

業單位。有的基層黨支部書記很贊賞此一做法，他們說，這是把「暴亂」造成的損失補回來的好辦法。

大地震之後童謠四起

十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河北、山西和內蒙古交界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以後，國內流言四起，人們議論紛紛，都把這次地震和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前後的國內政治背景及後果，進行比較和推測。在這次地震前，民間就流傳順口溜，有道是「國運敗壞，人心向外，地震一來，改朝換代，地震後，到處又傳開這樣的童謠：「江中多魚鯨，鯤鵬作妖鯨，天崩地裂時，紫氣吹燈滅」中共說這是反動謠言，正在追查。



軍管壓不服北京人。

中國政局 內緊外鬆

靳軍

靳軍自一九八二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共中央所屬的某家大報任編輯和記者。「六·四」事件後，他的許多朋友、校友和接受過他採訪的知識界人士，均遭警察逮捕或傳訊，更有不少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同學被停職審查，寫交待材料，在巨大的精神折磨、壓力和痛苦下忍辱生存。他本人因安全受到威脅，費了一些周折終於逃出中國。下面是我們通過電話與他交談的記錄。

記者：

你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靳軍：

我十月中離開北京，十月底才到美國。

記者：

你出國前國內這一時期的一般社會狀況怎樣？

靳軍：

袁木不久前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承認，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對眼下一級政府的鎮壓、清查運動不滿。但據許多中央一級新聞單位資深記者分析，這個數字應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至少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看法，但憋在心裡不敢公

開講。「反右」及「文革」教育了所有中國人，極少有人願為講一句真話而丟掉飯碗或坐牢。「六四」百日前，傳達了一個北京市政府文件，說九月十二日這天誰也不許戴白花、穿黑衣服，更不許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頭有紀念的表示，否則戒嚴部隊將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十·一」前夕天安門廣場原「民主女神」舊地豎起了工農兵知識份子群像，被過往市民嗤之以鼻。有人評論說：「他們的思維方式就像孩子一樣，水平極低」。北京市要選拔十萬人「十·一」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跳舞，主動報名的很少。一是大家心情沉重，沒有興緻歡樂，不想做政府粉飾太平的工具；二是怕挨炸彈。一個被迫去跳舞的人說：「不用真的炸彈，只要有人喊一聲有炸彈，就可能擠死幾百萬人。現在人人擔驚受怕，知道政府及戒嚴部隊欠下的血債太多，仇人太多了！」總之，誰願當他們的陪葬品呢？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舉辦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宣傳聲勢已展開，宣武區政府在一份街頭散發的材料中說：「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政治大局的穩定和改革開放政策，恢復我國的國際形象，團結更多的朋友，粉碎國際上少數人企圖孤立我國的陰謀」。「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更好地清除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各種影響，對廣大群眾進行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振奮民族精神

，堅定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重振國威」等等。事實上，人們對亞運會熱情喪盡，再也不會像修長城那樣掀起捐款浪潮了，而亞運工程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六四」事件殘酷地打擊了人們的愛國心，不少人反懷着看政府笑話的心態。現在，人們把對國家大事關切的心情，全放在對個人前途，或如何得更多經濟實惠上了。但盡管冰箱、錄像機等高檔消費一再降價，人民的購買力還是不高，許多國營大企業因沒有周轉資金，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

記者：

現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外鬆內緊」。即對外宣稱「開放政策」，對內實行高壓手段。許多清查工作是不是仍在向縱深發展？

靳軍：

不僅如此，而且已達到人人過關的恐怖地步。「十·一」前工作重點在搜捕「暴徒」上。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抓人、審判及槍決均秘密進行。一位警察朋友告訴我，槍決一直沒有停止過，還有大批的人在押待審。一般十五平米房間關六十人，像帶魚樣一個個擠在一起，七月北京炎熱時，許多人的腳都站爛了。國務院所屬某大報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學生見習記者，向坦克扔了一磚頭恰好被攝像機錄下，電視

台一放，馬上被老家的鄉親舉報了，現被判無期徒刑。還有一位工人不過向同事遞了一桶汽油，點火的人跑了，他則被抓住判了死刑。由於他在廠裡表現極好，廠領導不斷出面求情，均未奏效。執行槍決前，僅讓他見了妻子一面，連七歲的兒子都不讓見。這兩個例子是我的朋友看了內部簡報後透露的。「十·一」後清查重點放在知識份子上，當然意味着從意識形態徹底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王震對這些年崛起的知識界精英恨之入骨，說：「如有必要就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一個不留。」江澤民說，四千八百萬黨員「不惜開除八百萬」。現在搞「人人過關」。原將界綫劃在李鵬發「五·二十」戒嚴令後，此前聲援與遊行不為過。現在則提前到「四·廿六」社論後，凡聲援、遊行，甚至捐了幾塊錢的都不行。每個人必須詳細說明那一段時間你幹什麼了，若沒上街，證明人是誰，簡直像接受警察調查一樣。知識界清查重點除社科院、體改委、體改所、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高級黨校外，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人民日報」可能會從部主任級大換班，高迪（音）說：我們黨這麼多年來最大的教訓，就是「人民日報」在這次動亂中起了錯誤的輿論導向作用。他說：「不把那些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全部整掉，我決不走！」

記者：

這麼說，「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又要陷入惡運了？

斬軍：

比這要嚴重得多。可以說這回是知識份子

精英「全軍覆沒」。儘管江澤民對外宣稱「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沒有變」，但對內連與他們所稱的「動亂」毫無關係的人也不放過。現在是「翻老帳」，包括在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中較活躍份子，不向官方低頭的新潮詩人，與方勵之或其他被通緝的人認識並有聯繫的人，參與創辦過一些思想較解放有進取精神雜誌的人，編過介紹西方民主思想叢書的人，主持過政治體制改革或文化發展戰略討論的人——總之，凡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較強思考能力和理論水平，具真知灼見觀點，年紀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均遭不同命運。他們不是被捕就是被傳訊，或逃亡外地，或被停職、調離。更多的人要寫檢查及交待認識材料。總之，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決定了他們今後的命運。這就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不讀國內的研究生了，千方百計自費留學。可以這樣說，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認為留在國內沒有前途，都想離開中國。許多人說，他們現在比「植物人過的還痛苦，因為植物人不能夠思考」。我的一位朋友是部隊軍醫，四十多歲。她對我說：「我十六歲參軍，可以說紅了半輩子，從來都是聽黨的話。但是現在政府竟然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我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救護工作，親眼看到學生一點錯也沒有。像我這麼大年紀還找路子出國，你覺得奇怪嗎？我現在是在考慮往波利維亞移民，也不受共產黨統治了！」隨後她長嘆一口氣說：「真沒想到，我這個老革命竟成了堅定的反共份子……」。現在，北京大學招生減少後，仍不能開學，原

，否則其民主進取思想不是調走幾個優秀教師就能扼殺的。中國人的文化素質本來就不高，十億人裡有幾個頭腦清醒具將帥才能的？中國的未來全靠這些人。所以說「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的災難對中國前途有毀滅性的影響。

記者：

你能就你所知道的情況舉幾個具體例子嗎？我們在海外的留學生都很關心他們的命運。

斬軍：

可以舉例子，但不能說他們的名字，否則會使他們背上與國外敵對勢力有聯繫的罪名，罪加一等。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報的編委，有較高的政治經濟理論水平，每次開這類理論討論會，他除了採訪還常即席發言，觀點驚人。他被捕後，一直堅信自己是正義的，沒做過任何有損於黨和國家的事。所以，有次審訊他竟向對方慷慨陳詞達六小時之久，從法國大革命一直講到當代西方民主，以及當今中國社會與真正文明社會的距離，審訊人員覺得他骨頭太硬。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我他已遭到毒打。還有一位大學青年教師，「六四」後他得知公安局在通緝他，便也懷着正義之心前去自首。他以為他面對的是人。可是他完全想錯了，他向審訊人員解釋他與學生領袖接觸是為了勸說他們撤離天安門廣場，並在政府與學生之間斡旋，使政府也適當做些讓步。但他說的這些被對方寫成材料向上匯報，就變成：據×××交待，他們在背後策動，支持學生絕食，主要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目的。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青年學者被捕後，他妻子非常為他的生命安全擔心，有好幾次

她哭着找我說一點她丈夫的消息也沒有，他們四歲的兒子還不懂事，總是趴在媽媽身上問爸爸怎麼還不回來。有位記者在獄中傳出個條子，說要他妻子稍幾本圍棋棋譜，但後被警察阻止。據一位在秦城監獄關過的某公司職員，他住的房間門口有兩名士兵把守，兩個多月的時間沒讓他看過報紙上的一個字，書和電視就更不行了，他因與某高幹兒子是好友，兩個多月後被釋放出來，才得知江澤民當了總書記。

記者：

這樣看來，要想營救這些在獄中的知識份子，當然更重要的是改變所有中國人民的命運，就只有要現在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政府垮台了。

斬軍：

是這樣的，因為他們手裡有槍。若想加速現政府垮台，最重要的是經濟制裁。據國內權威經濟學家分析，若國外不再繼續給中國貸款，那麼現在鄧李揚政府只能生存兩年，若拿到貸款，則可生存三年以上。因為眼下國內經濟已到崩潰邊緣，物價上漲難以控制，給國家上繳利稅的大戶是國營工業大企業。但大企業不僅虧損嚴重，而且根本沒有生產資金，銀行也沒有錢貸給他們，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比過去更低了。據預測，一九九〇年中國經濟將進入最低谷，若政府仍拿不出錢扶植大企業，整個國民生活將進入混亂狀態。如果說這次學生因求民主而遭軍隊鎮壓那有那麼一點理由的話，那麼一旦工人、農民因經濟衰退而鬧工資、鬧物價，政府就無法讓軍隊開槍了。當然，這屆政府遲早要垮的重要因素，是由於他們已完全失去民心。

毛澤東思想重放光芒

張路光



「六·四」之後的中國大陸，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社會怪現狀。其中，一個最引人注意的情形是毛澤東著作再度暢銷。

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北京的大學生重新對「革命領袖」毛澤東產生興趣，在一些大學的學生宿舍，書架上出現了許多毛澤東的各種著作。

廣州的廣播電台稱，已故主席毛澤東的著作，最近在廣州市的書店裡十分走俏。廣州市最大的書店——北京新華書店，重新把銷量增加的毛的九種著作，擺放到最顯眼的位置，如「毛澤東選集」、「毛澤東五篇哲學著作」、「毛澤東論文藝」及「青年運動的方向」等。

儘管毛澤東著作的銷量增加，與中共中央新近號召人民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不無關係。因為雖然鄧小平上台後曾批判過毛晚年犯下的一系列錯誤。但毛澤東思想，仍被中共列為「四個堅持」之一。但是據來自大陸的信息稱，毛澤東著作再度暢銷，尚有其他一些更為特別的原因。

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四十年上下的中年心目中，是一個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一代梟雄。幾乎所有的人，都直接間接地深受其害，因此徹底否定毛澤東，自文革結束以來，一直是大陸民間最強烈的一種政治呼聲。

然而，在文革後十數年間長大的一代青年，特別是掀起「八九民運」的二十歲上下的大學生們，對毛澤東的認識是模糊的。他們對反右、文革浩劫那些歷史災難，缺少切身的體驗，對毛澤東也就談不上什麼切膚之恨。對他們而言，毛澤東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無以倫比的政

治豪傑。

因此，當中共重新在大學中加強政治思想教育，號召大學學習馬列及中共領導人的政治讀物時，青年們對現領導人鄧小平等人十分厭惡，自然不會去學習「鄧小平文選」，反而對毛澤東其人思想更感興趣。

從天安門事件可知，這一代中國青年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性質，缺少起碼的認識。如「六·四」時學生們之所以有那麼勇敢表現，與他們天真地認為共產黨不會鎮壓學潮不無關係。當軍人向學生開槍時，學生們的驚異超過了憤怒。他們一長大就生活在改革開放的氣氛中，從而不知道共產黨兇殘的一面。因此，在「八九」中國民運受挫後，大學生們最強烈的願望之一，就是重新認識共產黨的本質。通過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則是瞭解共產黨的最佳途徑。

不單單是在國內，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毛澤東重視中國社會實際的革命實踐和方法，亦重新受到民運人士的重視。許多人總結八九民運痛失江山的經驗教訓時，又重新提起毛澤東早年的活動。在中共黨史上，正是毛澤東，提出依靠農民階級和採取武裝鬥爭的方式，抵制了蘇俄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盲目指揮，使共產黨得以成功地奪取了江山。

而「八九中國民運」中，許多人發現無論青年學生，還是中年知識份子，都沒有解真地對中國社會的狀況進行分析，提出與社會各階層大眾有直接關係的政治主張，而僅僅空喊民主的口號。民運中在天安門廣場，一些工人群眾聽罷學生領袖慷慨激昂的演說後，便不客氣地說，你們講得很好，可就是沒有講我們應該怎麼辦。

以非暴力原則所進行的八九民運失敗後，

就像九十年前的「戊戌變法」失敗後，許多民運人士開始傾向革命的方式。因為改良，非暴力皆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因此一些人也重新想起毛澤東，以毛澤東的早年革命實踐為榜樣，探索中國的實際國情，尋找新的可行道路。在這方面，無論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如何，他都是講求實際和有效進行革命的典範人物。人們顯然想從毛澤東身上，尋找某種答案。

從上述分析，可知毛澤東著作在大陸重新暢銷是有其特殊社會原因的。這位共產黨的前領袖，扭轉中國乾坤的歷史人物，一生的政治實踐，究竟對今日中國民主運動有無借鏡作用？這種借鑒對民主運動而言，能帶來助益還是阻運？人們的看法目前尚難統一。

就社會心理層面而言，中國大陸重新出現的毛澤東熱，顯然是對當今中共政權的一種反動。盡管人民從理性上，都承認改革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但在現實生活的困境裡，人們情緒上日益對現政權產生反感。鄧小平時代不如毛澤東時代，已成爲日益流行的社會風評。如人們說「毛澤東時代，一毛錢頂一塊」。

例如大陸影界新近興起了一股歷史巨片熱，一反常態，各大電影製片廠並不阿於權勢，拍攝爲現領導人歌功頌德的影片。他們反而對毛澤東更有興趣，如四川峨嵋電影廠將要拍攝「走下神壇」，是根據毛澤東警衛員的回憶錄，拍攝毛澤東人性的一面。長春電影製片廠最近拍攝的巨片，也是將毛澤東由神還原成人。作爲對中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巨人，毛澤東的陰翳一直籠罩着中國大陸。雖然中共不許人民自由評價毛澤東，但這一禁錮正在被人民通過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突破。而亦由於此，一週時局的變態，毛澤東就會被人們加以不同形式的利用、褒貶，甚至幽默地玩弄。

千秋功罪誰人評說 天安門血案照片集

精裝燙金封面，全書200頁特級銅版紙彩色精印。

210幀權威照片，版權購自世界各大通訊社。

請珍藏歷史見證，購送客最佳禮品

唯一中英對照本，美華人人可閱讀

(美國市場零售價\$29.50，詳見「世界日報」出版廣告)

現特別優惠中外民運人士及中國留學生價\$24元，每本請加郵費：

支票抬頭請寫：SU YOUNG

美國\$1.6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加拿大\$5.00

74-14 WOODSIDE AVE

歐洲\$14.00

ELMHURST, NY 11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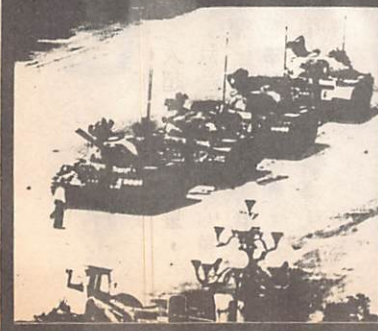
南美洲\$9.00

電話：(718)429-6777

亞洲\$20.00

獻給自由

DEDICATED TO FREEDOM



前面會有急轉彎？

胡平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鄧小平突然露面接見李政道。

前後政局恐有大變。聯繫到最近陳香梅、李政道會晤鄧小平，透露出鄧對六四事件似有悔意。於是，不少民運人士又對大陸近期政情演變展開了種種預測。他們關心的問題是：前面會有急轉彎嗎？如果有，我們該怎麼辦？

二、「勢」與「力」的巨大不相稱

預測中國大陸政局，有如預測地震：長期性預測較有把握，短期性預測非常困難。這一點很令人沮喪，因為人們最需要的是短期性預測。

一般來說，預測大陸政局短期變化的巨大困難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有關的理論尚不完備；二、相應的信息收集不齊全；三、人事不同於天事，其間本無「鐵的必然性」，而純偶然因素按定義來說就是不可預測的。如此等等。

特殊地是，當前中國大陸的政局變化尤難預測。這又和六四之後的中國的特殊形勢有關。倘若明天大陸就生突變，那並不會使人們驚訝；但十年之內，至少是三、五年之內大陸還不發生巨變，那也不會使人們感到意外。何以致此呢？為什麼同一個大陸政局，既可以脆弱到明天就大變，又可以穩定到十年、八年都不變呢？

有句成語，叫「勢均力敵」。可見，古人早已懂得把「勢」和「力」區分開來（法家韓非子對此多有論述）。今日之中國，從「力」的角度看，民主力量大大超過專制力量，八九民運的聲勢即是明證；但是從「勢」的角度看，也就是從現在社會政治結構的角度看，那「極少數、極少數」的專制者所處的「勢」却要優越得多。正是出於這種「勢」和「力」的極端不對稱，因而導致了中國政局既可能穩定相當時期，又可能須臾之間發生巨變的奇妙特點。

三、鄧小平真有悔意嗎？

在這種形勢下，某些處於特殊位置的人或事的變動，可能會成爲使整個天平向另一個方向傾斜的關鍵性砝碼。這並不是由於這個砝碼的份量特別重，而是由於它作爲頂端的砝碼具有可移動性，同時也恰恰由於原先的天平態勢本來就十分微妙（半年前胡耀邦的去世引發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那並不表明胡本人有多麼超乎尋常的力量）。從這個角度出發，現在鄧小平心裡打什麼主意，的確是很重要的。

說到鄧小平已有悔意，先拋開此一說是否確實不談，以下一系列問題是必須探究的。

第一，六四屠殺，首先地，主要地是得罪了中國人民，照理說，鄧小平應該向中國的老百姓表示悔意。他完全可以通過報刊文章、內部講話、中央文件等方式，公開地表明這一點，這樣才可能重新收拾人心。假如說有所謂面子問題，他也完全可以逐漸地降低調門，不動聲色地作若干補救工作，大可不必像傳聞中的那樣，向一個外邦友人私下流露。因此，與其

一、前面會有急轉彎？

前些天，國內有朋友傳出話來，說是年底

說這表明了鄧小平確有悔意，不如說他希望拉攏美國政府以減輕中共當局由於六四事件而招致的國際壓力。亞里士多德早就發現，專制統治者都喜歡與外邦人士結交，在外邦友人面前表現其人性溫和的一面，而對自己的臣民則百般壓制。故而，如果我們只看到鄧小平對某位外邦友人私下說了些什麼而不看他對本國的人民公開說了些什麼，那是很容易誤入歧途的。

第二，六四屠殺對鄧小平本人、對中共當局造成了重大打擊，就這點而言，我們可以相信鄧小平對於六四事件不會是很滿意的。但是搞政治這種事，盡如人意者很少。有時候，你要了熊掌，就不得不捨棄魚。很可能，鄧小平當初並不清願下令屠殺，但他又認為不屠殺的後果更惡劣，因此被迫出此下策。倘是如此，在事變之後，鄧小平內心感到不安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不過那決不等於他真誠悔過。想當年，趙匡胤借酒醉殺掉了他認為功高震主的鄭子明，殺完之後又痛呼「悔不該錯斬了鄭賢弟」。這種「後悔」，嚴格說來是不算數的。且不說死者不會復生，問題更在於，假如時光真的倒流，他仍然會作出同樣的決定。

當然，第三，從理論上講，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鄧小平確有悔意的可能性。

四、急轉彎可能性種種

鄧小平是否確有悔意，這一點或許只有後世的歷史學家們才能弄清楚。不過對於現實政治而言，鄧小平內心隱秘的動機並不是太重要。我們真正需要探究的問題是：在今天的形勢之下，鄧小平是否可能在政治上「急轉彎」？一方面，一個獨裁者，顧名思義，似乎是可以任意提出或更改自己的主張的。專制社會

裡政局動蕩多變，理由部分在此。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深入分析下去便會發現，世界上沒有一個獨裁者是真正完全「獨」裁的。鄧小平的選擇餘地固然比布什大，但亦非無限。因此我們不僅要考察鄧小平有無轉彎的能力，而且還要考察這個彎可能轉多少度。

首先，如上節所說，當政局處不穩定的微妙平衡狀態時，鄧小平個人的意向可能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具體地說，在當前情況下，鄧小平要再進一步強化對人民的控制恐怕是無能為力，但他若是願意反過來抑制一下保守強硬派，朝着改革開放的方向轉一轉則是做得到的。

其次，存在着若干客觀因素，驅迫着鄧小平轉彎子。這些因素大致包括：

(一)、六四屠殺引起的國內外強烈反對，政治上危機四伏，經濟上一籌莫展；

(二)、李鵬一派借鎮壓民運而急遽擴張勢力並大力倒退，在眼前有架空鄧的權力的趨勢，今後有威脅江澤民權力的可能，並且已經出現否定鄧小平這十年來正面政績的跡象；

(三)、鄧小平對國際大氣候並非一概無知，對身後聲名也不會無動於衷，他不能不考慮到，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只是遲早之事，如果他不對六四之後的局面加以某種調整，必將成爲歷史上的千古罪人（順便一提，大概沒有一個政治家會對自己的聲名漠不關心的，區別在於是否把它置於「第一優先」）。

所以，真正的問題還不是鄧小平等人是不是要轉彎子，而是他們究竟把彎子轉到多少度？

無非是三種可能：一百八十度、小於四十五度和九十度。

轉一百八十度的彎，也就是肯定八九民運

、否定六四「平亂」，這自然極好，但現實性很小。

轉小於四十五度的彎，就是說，在堅持「平亂有理」，肯定前階段「平亂」工作的前提下，搞一些類似右派「甄別」、幹部「解放」一類措施以舒緩緊張氣氛。這種轉彎子，實際上正是歷代帝王所慣用的所謂「先剿後撫」的故伎，它或許很投合當今某些執政者們的心意，但是在上層矛盾如此尖銳，朝野對立如此激烈，內外交困如此嚴重的今天，這種辦法根本無濟於事。

轉九十度的彎：一方面，承認學生們要民主、要改革、反腐敗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確有「極少數、極少數」人利用學潮製造動亂，一方面堅持「清場」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承認鎮壓行動「過了火」；一方面表示要繼續反右、反自由化；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反左，要反對重搞改革開放前的老一套。在黨內，趙派地位回升，但不會官復原職；李派勢力下降，但不一定公開打倒。對民運人士，除少數人外，在關押的會釋放，逃亡的准予回歸，參加過海內外示威抗議活動的一般群眾不再追究。如此等等。

對於鄧小平等人而言，轉九十度的彎，一是出於有壓力；二是感到有需要；三是認爲有可能。這裡所說的「可能」，是說鄧小平等權衡大勢，以爲這種總轉彎不致於造成翻車事故。其根據是，六四屠殺固然是黔驢技窮，孤注一擲之舉，但反過來它也使一般民運人士意識到共產黨目前還不是全無力量，搞民運尚不可操之過急，因此當出現新的機會時，應該有節制地利用。這就使得民衆方面的反應不致於過度。

六四之後，西方有人評論說：「人民低估

了鄧小平，鄧小平也低估了人民」。一位朋友描述國內的現狀是：「人民生活生活在刺刀尖下，共產黨坐在火山口上」。有人更把前兩年流行的一句話「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改為「現在誰也害怕誰」。這句玩笑話是否也有部份真實性呢？這次天安門運動把當局與民衆之間的對立關係揭示得一清二楚，其結果是使得彼此之間的對峙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這種局面固然很容易持續存在並進一步發展以致於最後引出難以把握的惡性爆發，但同時它是否也可能導向另一條出路？假定另一方面，民衆也由於害怕而不是一步就邁得太遠。也就是說，假定雙方由於互相有所顧忌而達成一種階段性的妥協，形勢又將是如何呢？

五、如何對待急轉彎

必須強調，以上所說，僅止是一種假設。迄今爲止，我們尚無任何可靠的證據足以表明中共當局要作出九十度的轉彎。因此我們切不可耽於幻想。但是我們應當看到，面臨內外的巨大壓力，當局中很可能會有人或遲早地採取轉彎措施。所以我們需要預先研究好應對之策。

首先我們要十分清楚，倘若當局真要作出九十度轉彎，那是和海內外民運力量施加各種壓力分不開的。因此，在當局尚未作此大幅轉彎之前，我們不應該減輕或放棄壓力。與此同時，我們又需要公開地表明，一但對方轉彎，我們將適度地減輕壓力，並再次呼籲對話。博奕論中有所謂：「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 的策略，用之於爭取民主的過程，我們就應當在對方壓制時堅決反抗之，而在對方有所退讓時作出相應的回報，從而鼓勵對方溫

和力量的上升並逐漸地建立起和平的合作——競爭的政治格局。

有幾個問題需要強調：

一、倘若當局轉彎不足九十度而只有四十五度左右，我們基本上不應視為讓步，因而不宜減輕壓力。

二、即使當局轉彎九十度，但那與戒嚴令前當局一度採取的溫和立場仍有明顯差距，所以我們的回報必須把握分寸。

三、一但當局轉彎九十度，儘管還和我們要求相差不多，但我們仍需抓住這個機會。到那時，有條件在大陸內部進行一定程度的活動的民運人士不必堅持說：「只要有一個民運人士還在牢中或仍在通緝，我就不出獄（或不同國）」。更明智的作法是利用這種有限的活動空間，積極而穩健地投入新的工作。

有人擔心，如果當局真的急轉彎，原來同仇敵愾的民運隊伍不會自亂陣腳。應該說這種危險是存在的。這也就是爲什麼我要事先討論這一問題的一個目的。面臨大陸政局可能出現的變化，民運人士必須迅速獲得更爲堅強的共識。毫無疑問，民運力量需要角色分工，而真正的角色分工必須建立在整體的堅強共識之上，否則不是導致各自爲陣，便是導致分崩離析。有條件先行在大陸內部活動的人應當採取「低姿態，高原則」的立場。這種立場，用康德的話來說就是：「我不去說出所有我相信的東西，但是我決不去說那些我不相信的東西」。民運策略靈活性的底線是基本人權。即使我們不能每時每刻都公開地、正面地爲每一個人的人權而戰，至少，我們在什麼時候都不要去否認他人的基本人權。比如說，在大陸內部，你可以聲稱「我不贊成某人或某組織的主張」——如果他們仍被壓制禁止的話，可是你應當同

時聲明「我認爲他們也有存在的權利」。最低限度，你可以迴避這一類敏感的問題，但決不要在不爲他人人權辯護的情況下附和對他人的攻擊。

六、創造時機，把握時機

在工程技術上，有所謂「定向爆破」（或曰：「受控爆破」）。然而，在現今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改革，却不可能有什麼「受控改革」。改革的深入發展，必然會超出統治者一人或一黨的控制。我們並不需要過份擔心——但當局作出某種退讓，人民便會滿足於「鳥籠自由」而放棄進一步抗爭的動力。八九民運早已證明，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堅定信念和奮鬥精神。我們需要進一步提高的乃是我們的政治謀略，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六四屠殺使更多的人清醒地意識到中共當局兇殘的一面，這對於磨煉我們的堅韌性和策略性甚有裨益。必須懂得，實行一套高瞻遠矚的、有理有節的、知進知退的民運戰略策略，不是立足於對中共政權的天真的幻想，而恰好是基於對之最深刻冷靜的洞察。這一點，我希望大家能反復思量。

關於鄧小平對六四屠殺略示悔意之說，充其量是一個試探氣球。我們不可當真，亦不可不當真。今天，民運隊伍有兩個迫切的任務：其一是迅速確立我們的基本戰略方針；其二是儘量用種種辦法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沒有後者，便不會有新的機會；沒有前者，縱然機會來了，我們也會交臂失之。對於這兩個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進行深入細致的研討。草就此文，願爲引玉之磚。

一九八九年十月卅一日於紐約

在八九民運的背後

陳一咨哥大講演節錄 黎民錄音整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有幸到哥倫比亞大學來和各位講「八九」民運的問題。我準備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八九」民運的始末。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今後的政局，或者說是「六四」屠殺後的中

國。
八九民運有五個原因。第一原因悼念胡耀邦，胡是耿直正派，為民請命的好人，八七年受不公正對待抑鬱而死，大家覺得應該替他說話。第二原因對改革進程不滿，通貨膨脹，社會不公，官倒、特權越來越厲害，人民始終沒必要的民主權力。第三原因對一系列社會現象不滿，道德淪落，分配不公，特權腐敗。第四是對工作失誤不滿。李鵬作總理後，在人大、政協反覆的說，問題是工作失誤，他的目的是攻擊趙紫陽的市場經濟的政策，當然贏得老頭們讚賞，可是老百姓覺得，怎麼政府、黨中央都是笨蛋，老是失誤呢？因此失誤的宣傳也鼓勵群眾。第五原因，學生運動發展，各階層參加，是被政府態度所激怒。

政府倒行逆施，步步激怒學生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四月十九日深夜在新華門前有兩萬人悼念，到凌晨四點還有三

千多人。學生原計劃五點退出，到四點四十分武警動手打人。第二天報上登學生打武警，不提武警打學生。這是第一次盾矛激發。

二十日上午政治局常委開會，李鵬認為現在學生是被少數壞人操縱，矛頭是對準黨、對準老同志的。趙紫陽當時說，少數壞人能操縱那麼多群眾，主張慎重處理，最好用對話辦法緩解矛盾。這時候情勢很複雜，例如胡耀邦治喪委員會始終沒有成立，即反映了部份內情。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因為清場，學生被第二次激怒。

二十三日下午趙赴平壤，臨走時向李鵬說，應以對話疏導，妥善處理。但二十四號晚上，李鵬召集政治局會議，由李錫銘作長篇講話，要點是學生人數不多，一萬多人，少數壞人操縱，矛頭對準社會主義、黨內老人，特別是對準小平同志。發展到現在，中央負責同志還在縱容。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到鄧小平家匯報，鄧小平深居簡出，消息不靈，左右皆老人，相信李鵬匯報，講了嚴厲的話，就是「四二六」社論。我當時住院，在二十五日聽到社論的內容，覺得完了，為什麼改革十年，四五運動十三年，還是當年的調子？八七年處理學運，學生最反感的是被指受壞人操縱，學生極不服氣。這樣處理，將會使對共產黨抱着最後一綫希望的人，都會失望，中國將進入動蕩時期。



鼓動暴亂究竟誰有預謀？

四月二十八日，李錫銘在北京市對處級以上幹部說，這次學生運動有三個黑手，一是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一是體改所，一是農發所。我很奇怪，我在醫院，怎麼變成黑手呢？後來一想，國內搞改革，政治改革由政改辦，經改是經改所，農村改革是農發所。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一些軍隊中人就說要殺我，原因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礎是經濟自由化，而經濟自由化來源就是破壞集體經濟，搞了包產到戶，而陳一諮最積極搞包產到戶，所以要殺我。而人民大學副校長宋濤在人大講：「我們的對面就是趙紫陽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窩子

。一八七七年壓力很大，這次更厲害。整頓體改所，派了三個工作組，體改委、國務院、公安部工作組分別進駐，還派許多軍隊，共抓了十四個人，體改所也被解散。

二十四日晚上李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沒有讓鮑彤參加，鮑彤是政治局常委秘書，同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常委開會，他理應列席，但這次會議不通知他開會，事後也不給他文件，因此鼓動暴亂，究竟是誰有預謀呢？

李姚贊成軍管，喬胡服從組織

四月十三日趙紫陽回北京，回來以後作五、六件事，都沒有成功，只說一件：五月八日他開擴大常委會，包括萬里、楊尚昆，加上鮑彤共八人，趙說，群眾不滿主要是官倒腐敗、民主進程慢，因此建議六點，一是公開中信、光大、康華等審查結果；二是副部長以上特殊供應取消，但七十五歲以上者保留；三是人大成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專責群眾對副部長以上幹部及子女違法亂紀的舉報；四是盡快制定新辦法；五是司法獨立辦案，不要再搞過去聯合辦案，從重處決；六是所有問題要在民主法治軌道上解決。趙紫陽主張，如果大家同意這六點，就在人民日報發表，讓群眾理解中央有改革決心，可能可以緩和事態。李鵬立刻說，這是趙個人意見，不能代表政治局，他不贊成，不能公開發表。這樣的事例有幾件。特別到最後，五月十七日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趙提出解決問題有軟辦法和硬辦法，軟辦法是承認學生行動是愛國的，學生組織合法，這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硬辦法有兩個，一是「空硬」，像四二六社論，公安局發表十條，實踐證明沒有

用；另一是「實硬」，就是戒嚴軍管，短期可能平息，長期却帶來無窮禍患。最後大家投票，姚依林在會上作了長篇攻擊趙的發言，指責趙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二是支持動亂；三是分裂黨；四是最大官倒。後來在六月的四中全會上罪名只有第二、第三條，因為趙做的所有重大事項，都經過討論，所以第一條不成立，最後一條中央派調查組查了四十多天，查不出實據，查趙的兒子趙大軍買賣彩電，却發現是楊尚昆批准，為安全部和總參倒賣，所以官倒罪名也不能成立，這是後話。且說五月十七日會議，李鵬、姚依林完全贊成軍管，趙紫陽反對，喬石表示服從組織決定，棄權；胡啓立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保留個人意見。聽到消息的人都不知道會上的「組織決定」是什麼，當時大局事實已經底定。

鄧小平由功臣變成罪人

可以說六四血腥鎮壓是一場清算十年改革的政變。以李鵬為前總指揮，姚依林為軍師、陳雲為總後台，這樣一場有計劃，有預謀，有步驟，清算十年改革的政變，他們作法是第一：激怒鄧小平，犧牲趙紫陽；第二：激怒學生和民衆，尋找藉口，為整肅改革派和民主派創造條件。他們的目標業已實現。這場清算中得益最大的是以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既得利益集團。失敗最大的是鄧小平，他從改革功臣變成人民罪人。趙紫陽扮演的則為悲劇英雄角色。實際上，八七年底以後，體改所的人就對趙紫陽失望了，所裡六成的人都出國了，計劃三年內全部出國。但是趙最後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趙有弱點，即使復出也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但他比其他領導人看的明白。

八九民運失敗教訓是什麼？社會不穩定是政治、經濟基本矛盾所引起的，由五個因素決定：一是民衆不滿意程度；二是領導人不滿意程度；三是反對派組織情形；四是控制社會與該加快改革，領導人不滿意，希望停止改革，後面三個條件民衆都不具備，因此一旦不穩定激化時就是一場悲劇。有人說在國內為什麼不提高組織化程度，提高共識呢？這個問題是，在中國共識提高一分，組織化要提高十分，風險却要增加百倍。國內只能三人一夥，五人一夥，很少有公開、徹底討論，就是無法有組織。所以八九民運沒有明確目標，沒有明確策略和成熟領袖，怎麼可能成功呢？學生和各階層、改革派和民主派也沒有很好的結合。

李鵬當總理是中國人的恥辱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組織化很高的對手。中國現在領導人主幹是第二代，解放初期參加革命的人，他們絕大多數看風駛舵，兩面三刀，整人有術，治國無方，對解決基本社會、政治、經濟問題完全不靈，這種人以李鵬為代表。這個人無德無才，心胸狹窄，對基本問題沒有感覺。他當上總理是中國人的恥辱，國際社會也不會接受他。連北京小孩都以「你是李鵬」作為「你是壞人」的代名詞。這樣人怎麼能夠長久？兩三年就會垮台。

雖然八九民運遭了鎮壓，但是也提供了機會。六四屠殺中止了十年改革的進程，市場化方向被計劃經濟取代，政治改革民主化方向被集權化取代，思想文化多元化傾向被專制取代。但是要實行計劃經濟有三個不可克服的困難，一是財權要歸中央，將遇到地方既得利益者

的反抗；第二強調發展大中型企業，就要壓縮民營，和個體企業，帶來的是經濟萎縮，而且一千萬農民失業怎麼辦？第三必然帶來消費品的短缺，擴大了民怨。

北京市人民內心憤怒是十分一致的，利用各種方式來發洩。中共除了遷都，或是把三百萬市民全部遷走，否則無法解決民憤問題。

殺人的政權結局不言而喻

戒嚴一百多天，始終不敢撤除，正是一個很好象徵，李鵬政權今後面對所有問題正像戒嚴問題一樣，進入進退維谷的情況，既不能放棄鎮壓，又不能加強鎮壓，既不能批判改革，又不能實行改革；既不能有效集權，又不能放棄集權。中國社會要進入動蕩時期。我不相信通過十年開放看到世界和通過六四屠殺看到中國的人，會繼續為這樣一個殺人的政權效力。而政治、經濟倒退的作法違背世界潮流，加大中國人民與世界差距，政治、經濟幾方面都一塌胡塗，結局不言可喻。

在海外，出現很好的新變化。海外華人在前一致，各國政府和人民給予中國民運人士極大支持。因此正是愛民主的中國人形成聯合的最好機會。我們要突破過去國共鬭爭、階級鬭爭和左中右的劃法，大家面對民族存亡，都要團結起來，我們團結得好，獨裁者就會分化和瓦解。

未來十年，中國會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人口可能達到十三億，在資源短缺、制度腐敗的環境下連印度都會趕過我們。中華兒女還不應該反思、奮起嗎？我們怎樣學習民主，用民主的方法重建中國，這是我們今後最大的挑戰。

舉報信箱

我揭發袁木走私

王凡

我們全中國十億人民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先生現在世界知名，請看筆者今天向全世界人民介紹的這位發言人走私的傑作。

筆者從幾位家長與袁木先生有深交的高幹子弟處得知：曾經因未能升副部級幹部而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中組部鬧情緒的袁發言人，利用出國回國時走免檢通道的機會，為現任中宣部部長王忍之之子王宏帶了一部國家不允許（打關稅也不許）的攝像機。另

據絕對可靠來源：王忍之之女婿最近托東部沿海某開放省的一位省主要領導人之子，找該省級領導人之子的日本朋友由該父所管之省海關又帶入了一台攝像機。

筆者希望中共如真正要反腐敗，請去查一下像袁木先生這樣的親信的走私罪行。同時筆者也有良知的記者下次在袁木先生開記者招待會時問他一下：他承認不承認他的走私罪狀？

舉報信箱

他顯然不是記者

馬里蘭大學 林蔭年



這個人在大使館前拍攝示威學生

頭。

他們均未佩帶記者證，不可能是非中共人員。另外，這兩人在使館門口四周活動很長時間，作出恫嚇示威學生的姿態。看得出是中共使館有意安排的威嚇行動。示威者曾和兩個攝影者隔街叫罵，示威者罵他們是中共的「走狗」，我沒聽清他說什麼。後來警察出來干涉那個拿攝像機的人，認為他沒有記者證，不能隨意對示威者拍攝，最後我們都見到他們回到大使館中去了。因此，我認為他們是中共派出的人是無疑的。我想是否可以在「中春」上對中共對留學生的百般恐嚇作出一個小小的反應，對鼓舞留學生的士氣也是有好處的。

中國之春：
隨信寄去我在九月二十九日拍攝的幾張照片，是中共人員在大使館外拍攝示威學生的鏡

寧要兩個魔鬼 不要一個天使

一、這不是幽默

幾年來，我在北京大學參加競選時，一位選民向我提了一個問題：「你認爲一黨制好還是兩黨制好？」

當時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兩黨制好！」可是下一個問題緊接着就來了：「那你是不是否定共產黨的一黨領導？」

這個問題幾乎把我逼入了絕境，要知道，在當時（一九八〇年）共產黨的領導還是個不容討論的禁區，也是個不容挑戰的領域。如果我回答「是」，就要冒坐牢的風險，如果我回答「否」，又和我的第一個回答相互矛盾。我急得一身冷汗，最後急中生智，答曰：「爲什麼不能有兩個共產黨輪着領導？」

也許大家對我的機智表示欣賞，把這一回答理解爲幽默。一陣哄笑，我化險爲夷。

可是今天，在九年之後，我鄭重聲明，這不是幽默。我的回答是非常嚴肅的：即使是兩個共產黨輪流執政，也比一個共產黨專制強得多。

二、政治和倫理要劃清界綫

也許有人會問：「照此邏輯，豈不是兩個惡霸比一個惡霸還好？現在中國只有一個共產黨已經把人民折騰得半死不活了，若是有兩個

共產黨輪流折騰，中國人豈不要生靈塗炭？」

且慢，在此，我想我必須先重復一下我常常強調的一個原則：形式重於內容。我在北大學過政治學，政治學研究的問題是權力的結構，權力的來源，權力交接的程序，總而言之，是研究形式而不是內容的。是形而上學。至於執政黨的善惡、優劣和功過，那是屬倫理學研究的範圍，涉及到一系列價值尺度的判斷。政治若不能和倫理劃清界綫是毫無希望走向正軌的，中國人自孔子創立儒家後，兩千五百多年，屢犯這一錯誤，此是題外話。

言歸正傳。我在提出兩黨制比一黨制好，甚至兩個共產黨比一個共產黨好這個論點時根本沒有考慮我所論及的黨是好黨還是壞黨。那怕一黨專政的那個黨是個人民一致擁護的好黨，我仍不贊成一黨制而堅持兩黨制，就像我碰上一個好皇帝仍不妨礙我繼續反對帝制一樣。我所討論的只是一個黨還是兩個黨，（或兩個以上）而不論這一個或兩個是什麼樣的黨。既然這樣，兩個共產黨和兩個民主黨，兩個共和黨沒有什麼區別，重要的是他們互相監督，輪流執政。

權力的結構比誰在掌權要重要的多，這正是中國人常常忽略的地方。

三、解鈴不宜繫鈴人

不久前我在一個學校講演（辛辛那提？密西根？）我用了四十分鐘的時間向同學們勾畫出了一幅非常暗淡的前景，並極力想證明一點：今天中國共產黨內無論誰上台，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會面臨同樣的困境，都很難收拾這付局面。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這時，一位同學機智地提了一個問題：「如果讓民聯回去執政，你們會怎樣收拾這付局面呢？」

我不得不承認：「我們也會面臨和共產黨執政者同樣的困境，也許會做和趙紫陽同樣的事。」

下一個問題緊接着又來了：「既然誰執政都一樣，那你們還老批評共產黨幹嘛？讓共產黨繼續執政不也一樣嗎？」

我幾乎又一次陷入了九年前同樣狼狽的絕境，幸好這一次我不必拐彎抹角，而可以直抒己見了。

中國人看問題總是習慣把注意力集中在事情的內容上。他們總是過份地注重政策、綱領、政績的區別和好壞，其實這對於兩黨制來說都是不重要的。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綱並無多大原則分歧，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兩黨制在這個國家的進步中所起的作用。

假如中國民聯回去執政（當然這只是個假設，前提是我們有和共產黨或國民黨同樣的執

丁楚

政能力和足夠的幹部)即使我們執行共產黨改革派同樣的政策效果也許會比他們好得多。他們做不到的事,我們也許就能做到,用同樣方法。道理很簡單,那個放羊的孩子喊「狼來了」,沒有人理睬他,可是若換任何一個其他的孩子喊「狼來了」,人們也許會趕來。難道他們喊的不是同樣內容的話嗎?可為什麼效果會不一樣呢?

共產黨把土地承包給農民,農民會有短期經濟行為,進行掠奪經營,以便在政策改變之前得到最大利益。可是若換任何其他黨來實行同樣政策,農民就有可能進行長遠投資。道理很簡單,因為共產黨有了政策多變和公有化傾向的 CREDIT,而其他的黨還沒有這個記錄。

中國有句俗話:解鈴還需繫鈴人。不過依我看,繫鈴人多半是解不開鈴的,換任何一個人去解鈴也比由他本人去解效果好得多。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有形之手無力回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四、有形之手,無力回天

共產黨要進行物價改革,在這一過程中,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商品的漲價盡管是價值規律在起作用,可是物價過去是被那只有形之手壓住的,而現在人們又親眼看見物價的上漲是因為壓在上面的手鬆開了,他們自然認為物價是你共產黨「提」的,怒氣自然要發在政府頭上。

過去中國人都吃大鍋飯,幹多幹少都拿一樣錢,可是後來改革了,要按勞分配,按個人能力、學歷來評工資。這本來是好事,可有一些人就不幹了。那些上山下鄉,到邊疆去,到艱苦

地方去的人會報怨:過去我們響應黨的號召,就誤了自己的青春,可現在我們的犧牲又不算數了。今天二十幾歲的大學生拿錢比我們多,那怎麼行?

這只手曾包攬了人民的衣食住行,可現在忽然撒手不管了。過去三元錢房租,二十元伙食費,可現在取消補貼,每月一百元飯錢,還要讓人們花上萬元買房子,人們當然不滿:「想推卸責任,豈有此理?」

這只手曾劣迹昭彰,它曾製造大鍋飯將平等的待遇強加在每個人頭上,它曾規畫一切,搞得經濟弊端叢生,資源浪費驚人。可是這只手現在却要悄悄隱退,讓市場和人民去承受不平等的後果和結構調整的陣痛,人們當然會憤然:「想賴掉罪責,談何容易。」

當一個政府把功勞全部歸功於自己的時候,就已為他成爲衆矢之的埋下了伏筆。如果你想把風調雨順歸功於自己,那無疑就等着人民把天災人禍的怒氣發洩在你身上。

在西方社會,也有經濟調整(危機),也有通貨膨脹,可是這是市場的無形之手幹的,人們的怒氣無處可洩,只能認了。而在中國,共產黨無論幹什麼都會成爲衆矢之的。其原因一是它從前幹的蠢事太多,欠下一大筆爛帳;二是它是有形之手,一舉一動歷歷在目,前者提供「矢」,後者提供「的」。翻雲是這只手,覆雨是這只手,翻雲覆雨還是這只手,它的劣迹有案可查,它怎麼能夠取信於民?

中國確實需要改革,不過由原來那隻手改看來是不行的,換一隻手或許好得多。

五、輪流背歷史的黑鍋

在第一次歷史學會的年會上,我曾做了一

個講演,題目是:誰來背歷史的黑鍋。我承認我站錯了講壇,其實這不是歷史問題,而是現實問題。

世界上任何一場社會變革都會遇到一個棘手問題,就是讓人們,尤其是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們,了却舊怨,承認現狀。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向前看。否則社會就會陷在無休止的抱怨,翻案和復辟中不得安寧。這就需要有人來對歷史的爛帳負責,換句話就是背歷史的黑鍋。

共產黨的傳統作法是拋替罪羊,把從前所有的歷史舊帳都算到他們身上,讓這些死老虎成爲衆矢之的的靶子,吸收人們迸發出來的怒氣怨言,最後讓所有的人都承認現狀。共產黨折騰幾十年,把家敗掉了,於是拋出林彪四人幫:抄家挨整的別吵,上山下鄉的別鬧,一切都是四人幫的罪惡,咱們從新開始「新長征」。可是誰知新長征不順利,交了一大筆學費,於是又拋出華國鋒替罪:所有爛帳都是華主席的,咱們在鄧總設計師的指導下從新來過……

縱看所有共產黨國家,替罪羊層出不窮。當然我們承認,在某種情況下這不失一個爲大轉彎製造機會的有效方法。但這畢竟帶有很強的權宜色彩。不談褒貶而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這種方式不可能制度化和程序化,這就爲社會帶來很大風險。每一次拋替罪羊都伴隨着一次內鬪和清洗,造成政治動蕩,使「安定團結」的局面危在旦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方法使用一兩次靈,可是用多了就不靈了。統治者可以暫時欺騙全體人民,也可以永遠欺騙部份人民,但他們不可能永遠欺騙全體人民。那麼怎麼辦呢?西方人的辦法是把替罪羊的方式給程序化、制度化,建立兩黨制或多黨制。其實兩黨制並不完全意味着輪流執政,它的另一個功能是輪着背歷史的黑鍋。

六、建立自我調節的社會機制

俗語說：「當家多年鬼也煩」。一個黨執政多年，總免不了犯點錯誤，引起百姓不滿，大家都想換個新面孔，創個新局面。那麼執政黨就要背着黑鍋下台，這樣在野黨上台也好辦事。凡錯誤缺點，都屬於原執政黨，大家向前看一切從新來過。許多年後，這出戲會反過來重演一遍，後者下台，前者上台。總之，輪着背黑鍋，公平合理。

從政治學角度講，背黑鍋的未必是壞人壞黨（政治要和倫理劃清界綫！）從某種意義上他們還是為歷史作出貢獻。任何一個新局面的開始，總有人要為此作出犧牲，去承擔歷史責任。有時候下台的執政黨或總統還頗為冤枉，例如碰上經濟危機，誰也沒有回天之力。這時候要為社會作點貢獻，就勇敢背上黑鍋吧，為下一任製造個機會。

一黨專制給社會帶來的風險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把事情搞糟了，一來它不太容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尤其是它曾經「偉大、光榮、正確」過；二來即使它認識到錯誤也礙於面子不肯承認，而且會連續犯第二個錯誤去掩蓋第一個錯誤，再犯第三個錯誤去掩蓋第二個……；（毛澤東就是個典型，他用批判彭德懷去掩蓋大躍進的錯誤，再用文化大革命去掩蓋批彭的錯誤，最後把社會帶入絕境）；第三，即使它認識到了錯誤，並願意改正，有時候也無能為力，就像一個醫生很難為自己開刀一樣。關於有形之手為什麼無力回天，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

因此，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社會會失去自我調節的能力和機會。歷史這輛車常常會憑慣性在錯誤的軌道上向前衝去，不碰南牆不回頭。而當這輛車在南牆碰得頭破血流，決心回

頭時，社會已付出重大代價了。

當然我們承認，有時共產黨在碰了南牆之後還是頗有勇氣承認錯誤的，所以它總是吹噓它自我調節的能力。不過，一個人第一次勇於承認錯誤人們會肅然起敬，可是它若一再勇於承認錯誤人們就會覺得有點滑稽了。第一次人們尊敬他，第三次人們嘲笑他，第十次人們就要憎惡他了。

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好處就在於為社會創造了一個自我調節的機制。當一個黨把事情搞糟了，背着黑鍋下台，換一個黨執政，就可以使社會順利地渡過政策大幅度調整的轉彎期，而避免陷入任何尷尬局面。

形式重於內容。只要建立了兩黨或多黨的自我調節機制，兩黨之間的綱領和政策之差別顯得無足輕重了。中國人常常覺得可愛，把綱領看得至高無上。實際上兩黨制中，雙方都可以是機會主義，前者左，後者就該右，前者右，後者就該左。那種說某一個黨的綱領就固定代表某一階級利益的鬼話是共產黨為自己加冕的祝詞。在兩黨制中，是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還是兩個共產黨，都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兩個黨都會在競爭中不斷修正自己的綱領，調整自己的政策。

社會常常是在左右搖擺中前進的，人們的情緒也會勿冷勿熱。政治沉悶了，人們要求自由，可是太自由了，人們又擔心社會治安了；在決策中，只有一個人說了算，大家都會有意見：「憑什麼他說了算，我們說了不算？」可是當所有的人都說了算時，就等於誰說了也不算，於是大家又痛苦不堪：「唉，還是讓一個人說了算吧！」所以，在兩黨制社會中，若有一個黨左一點，一個黨右一點，一個黨激烈一點，一個黨保守一點，一個自由化一點，一個

黨集中化一點……就可以較好適應社會前進這種一張一馳的步伐，使社會充滿活力，但又不走向極端。

其實，兩個黨的綱領比較接近，比兩個黨的綱領截然相反更有利於社會安定。

故兩個共產黨共存的局面未必會比國共兩黨共存更糟。若兩個黨的綱領截然相反，而又頑固不變，社會就會打擺子。你總不能一會兒把農民的地分下去，一會兒又收上來吧？

不過有一點是不必擔心的，只要兩個黨願意在一個體制下共存，他們就會自動地調節自己，放棄極端政策，向中間靠攏。西歐北歐的共產黨和社會黨一旦承認了多黨制，他們在執政後不也考慮現實，並沒有把所有的財產都公有化嗎？

兩黨制建立的關鍵一點是，雙方都要遵守共同程序和規則。這些規則比一個黨的政策、綱領更至關緊要。也許在沒有任何固定的軌迹時開車，司機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我們修了軌道，那麼司機的技巧就無關重要了，只要會踩剎車，會加速減速就行了。

鐵路，真是一個天才的發明。

七、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天使

「六四」之後，共產黨成了衆矢之的，人都在數落它有多壞。不過我自己對於評價一個黨是好還是壞向來不感興趣，使我耿耿於懷是共產黨妨礙別的黨存在的霸道行爲，所以我極希望有另一種力量去制衡它，無論這一力量是什麼，是好還是壞。

我相信這樣一句話：寧要兩個魔鬼，不要一個天使。況且，這唯一的一個還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呢？

我們需要失敗的革命

柯崗

本文認為中國仍然需要革命，但是革命不應勝利。只有在一系列不斷失敗的革命的條件下，中國才可擺脫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本文認為，我們必須超越革命和改良對立的神話，只有一系列不斷失敗的革命和即將到來的新革命的威脅，才能使統治者退讓，謀求改革。擺脫專制統治的道路不在「體制內改革」中，而在體制外革命和體制內改革的相互促進之中。

蔡京式的假改革

鄧小平的改革遇到了一個不可解的窘境之中：不改革的話，共產黨的正統性越來越受到威脅，「改朝換代」的呼聲越來越大，新革命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改革的話，共產黨的中央集權越來越受到削弱，市民社會越來越壯大。鄧小平強調「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這兩個「立國之本」的用意，就是想解決這個兩難困境。

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仍然強調改革開放，但是這種改革已不同北宋王安石式的改革，而更多類似蔡京式的假改革了。一方面，統治者仍然高舉改革的旗子，由此想獲得或增強合法性。但這時，改革反而是謀取合法性的一種新工具而已。他們僅僅聲稱要改革，而實際上

却不願意再改革了。另一方面，他們極力維持中央集權，用恐怖和迫害來維持其政治統治。這種假改革不僅最終會落空，而且為革命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一方面，假改革者還



坦克堵住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通道

要做出某些「寬鬆開明」的舉動，大量地製造如匈牙利詩人 HARASZTI 所描述的「天鵝絨般的監獄」(THE VELVET PRISON)。另一方面，他們又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促使

更多的人反抗這種倒行逆施的集權統治。一般而說，統治者的恐怖和控制太強，則使廣大群眾病態性「支持」現政權，或「虛偽地」服從現政權；如果統治者的恐怖和控制太弱，則群眾的反抗也相對的減弱；只有當統治者的恐怖和控制處於中間狀態，群眾的反抗程度將會處於最高點，六四中，他們對學生的血腥鎮壓，六四事件之後對知識份子的大規模迫害，及其「做枱面」的假改革，這一切為革命形成了一個較為廣泛的群眾基礎。

軟弱無力的改良派

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嚴家其、包遵信聯名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的檄文，旨在通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解決政治問題，使中國政治能走上理性化、制度化、程序化的道路。但其美妙的理想被坦克加子彈無情地摧毀了。在中國，通過訴諸於民主理想來喚起統治者的良心或善良意志，使其退讓並接受法制，這種想法多半落空。所謂「程序政治」的改良主張，建立在一個虛假的前提之上，即統治者有理性，還有使政治理性化的動機。六四事件表明，統治者決不會採納任何「程序政治」來限制自己的權力。使統治者採納程序政治的唯一可能

性是，他們已感受到革命的來臨。爲了挽救「王朝」，避免革命，他們有可能被迫接受和平的、改良的政治主張。例如，清末時，清王朝企圖搞憲政來避免革命。可見，如體制內改革要有成效的話，必須有革命派的壓力。沒有革命派的壓力，體制內改革就缺少使中共退讓的籌碼，他們的主張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就會軟弱無力。另一方面，體制內改革派也有一番現實的戰略思考。誠如蘇紹智所承認的，他不想推翻共產黨，「我們只能在體制內想辦法」。在中國，短期內推翻共產黨既不可能，也未必直接導致民主。中國社會的進步還需要黨內改革派來推動。關鍵在於增加革命派的現實壓力，從而使體制內改革派有逼使統治者退讓的資本和籌碼。

超越革命和改良對立的神話

近幾年在中國知識界中流行了一個革命導致專制，改良導致民主這一兩極黑白分明的觀點。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證據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導致了新專制，英國「憲章革命」擺脫專制統治這一歷史事實。這個論證值得懷疑。需要澄清一個事實，英國「光榮革命」的改良方略之所以被各派力量所接受，關鍵在於這之前英國革命的失敗導致舊王朝的復辟。這是一個在革命失敗後進行改良獲得成功的經驗。反觀中國革命，在康梁維新改良失敗之後，孫中山謀求革命途徑。正是在辛亥革命失敗之後，各派力量在中國建立了一套初具規模的國會代議制度。而正是在中共農民革命勝利之後，中國迅速建立了一個新的極權政治。由此可見，革命並非一定導致專制，失敗的革命有可能導致



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時的照片

初步的民主建設，而勝利的革命才可能導致新的獨裁。而且，改良導致民主必須有事先失敗的革命爲前提。沒有前一個革命的失敗和後一個革命的威脅，改良就一無成效。如此觀來，把革命與改良對立起來，分述其社會功能的這種思維框架，是在製造一種新的「神話」，即只有改良才可救中國；又在製造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只有改良才是正確的。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大弊病是，在人爲的「兩極」中爭誰爲正確，誰爲錯誤。知識份子靠意識形態而起家立業，也在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葬送自己。其實，革命和改良都對民主進程有作用，正是兩者交替或交互中才推動社會進步。如果革命派或改良派只認爲自己找到挽救中國的唯一正確途徑的話，那麼這種以正確和錯誤爲基礎的意識形態就內在地包涵了專制的萌芽。我們有必要清醒地排除這類意識形態之爭，超越革命和改良兩極對立的神話。

失敗革命論並非謬論

極端化的革命派也有其弱點：主張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即只要革命，不要改良；只要革命勝利，而不希望革命失敗。這種革命勝利的結果往往如改良派所批評的，導致一個新的專制。

如果改良派軟弱無力，而革命派又可能導致新專制，那麼擺脫這種困境的一個辦法就是使革命失敗。勝利的革命是走向對大多數獲勝的群眾重新「囚監」的最簡捷的道路；而一系列失敗的革命是走向使大多數失敗的群眾獲得自由的最簡捷的道路。波蘭團結工會的顧問，著名哲學教授諾瓦克曾倡導、闡述了這種失敗革命論。

諾瓦克認爲，在人民革命中，少數革命家只是權力迷，在他們眼中，群眾恰恰不過是一種工具、手段而已。當一個革命勝利後，革命者獨斷了權力，成爲新的統治階級，並極力反對那些在革命旗幟下的競爭者。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只是建立了一個極權社會。人民擺脫了私人雇主的經濟剝削，但又受到了國家政權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

另一方面，諾瓦克認爲：「馬克思強調，所有使社會轉變的改良策略，包括基督教對人的善良意願的呼求，在反對已確立的壓迫制度上軟弱無力，因此，革命是必要的。我認爲，這對馬克思來說完全正確。可是如果改良方法軟弱無力，並且勝利的革命是一場真正的災難，那麼使全社會轉變的唯一途徑是使革命失敗。……正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使統治（政治上）階級作出某些改革，放鬆對社會生活某些地方的控制。如果改革不是十分深入，下一場革命

將迫使統治者作出進一步的退讓，只要這次革命再失敗的話。正是用這種方法，一系列革命促使並加強那些旨在逐步改善人民狀況的改良。進步是由一些改良式的轉變而促成的；但是進步不建立在統治者的善良意志上，而是建立在他們對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恐怖之上。這個理論判斷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得到歷史事實的證實。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失敗了，後者勝利了。這就是巴黎公社導致了曾被禁止的自由工會的合法化，而十月革命最後導致古格拉群島的原因。今天，這些受害於勝利的革命的國家正開始通過一系列失敗的革命而進化，這就是一個真正進步在那裡出現的原因。

也許一些讀者會立即提出一個疑問：失敗的革命不一定導致統治者的退讓，也可能促使統治者進一步加強政治控制和壓迫。六四事件的事實可證實上述疑問有道理。

諾瓦克也認為，一個失敗的市民革命會導致極權主義。革命失敗後，恐怖隨繼而來。大規模的迫害是保證極權體系運轉的唯一方法。但是，這樣說來，失敗的革命走出專制統治的道路又值得懷疑。我們需要進一步澄清失敗革命論得以成立的條件，其中一個主要條件就是市民社會的壯大和發展。

市民社會的契機

諾瓦克認為，正是市民日益增強反對現有壓迫制度的能力才可擺脫迫害——革命——迫害的惡性循環。最先，部份人民不滿於現有的社會束縛，革命只限於部份市民中。繼之，越來越多的市民捲入反對極權專制的政治鬭爭之中。這樣，市民革命給統治者一個使自己擺脫周期

性迫害的機會，並造就一個基於縮小統治範圍基礎之上統治者和市民之間的新關係，即從原來統治者對市民的壓迫關係轉變為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關係。可是，壓迫機制如昔運作，統治範圍必然擴大。如果這個統治範圍不能再次達到極權化的程度，這就歸功於市民反抗力量的增大。為了避免下一次革命，統治者可能縮小管理範圍。正是越來越多的市民要擺脫被「監禁」的地位，並且正是大多數市民反對現有制度，才使統治者不可能採用恐怖、迫害策略。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退讓。當他們統治範圍急劇縮小，而社會自治範圍相應增大時，這就到達了一個革命的轉折點：它促使高度控制的制度轉變為一個相對鬆動的制度，而且革命者這時已不能採用極權化的政策。這樣就形成了革命——退讓——較大規模的革命，進一步的退讓這種良性循環，而避免了恐怖和迫害。革命進一步的恐怖和迫害，進一步革命這種惡性循環。



瓦文薩（右）同美國議員在波蘭團結工會

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功是以工人罷工、極端派的革命反抗為前提的。波蘭目前的政治就已初步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市民社會的復興擺脫了極權化的傾向，是走向民主社會的契機。

幾點結論

如果上述作為戰略思考的歷史觀具有相對可靠的基礎，那麼由此我們可得出下述結論：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失敗的革命才是出路。革命必須形成一定的壓力，迫使統治者為了避免革命而退讓；但是革命又必須限制在不推翻共產黨的範圍之內。因為推翻一個政權，並且政局向極權化方向發展，較易形成新的專制。革命的失敗會使革命成為進化的動力和媒介，從而使改良方略確實有效。

革命派、改良派及其統治者內的改革派需保持力量的平衡，形成某種政治均勢。能否擺脫專制惡性循環的關鍵在於各種社會力量的均勢是否恰到好處。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僅靠「理念」，更重要靠各種力量的撞擊幸運而形成某種歷史性的轉折點。失敗的革命和各派力量的交匯、交互作用是擺脫專制統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實行民主的充分條件。沒有這兩個條件，一切改良只不過是幻想而已。為此，本文建議，民主中國陣綫保持溫和改良的姿態，而中國民聯則採取悲劇性的革命派的立場。

我的結論是，群眾在革命中失敗比少數革命家利用群眾革命建立新政權更有好處；我們要革命，但不妨使革命失敗。這種結論雖然顯得荒謬、不合常識，但確實是我們擺脫專制政權的一種戰略選擇。如果理解了這個結論是對現實和歷史的冷靜思考的結果，那麼它就不是十分驚訝了。

痛苦的民主

安琪

安琪在巴黎會議上。

民陣巴黎大會反思

困惑之一——人事怪圈



「民陣有沒有派別之爭，公開化了嗎？」在民陣成立大會上，這個問題被提到了競選民陣主席的答辯會上。這不啻是給民陣敲響的第一聲警鐘。

此間，吾爾開希曾頗為激動地對記者說：「我不希望民陣成為體改所，也不希望成為四通，不希望成為共產黨的海外支部，更不希望天安門廣場的血白流。」這番話表達了人們的普遍憂慮。

誠然，無論是體改所，或者四通，或者學生，或者知識份子，這幾種類型的群體所具有的共識和不同傾向，本身有可能代表民主的多元化。問題的關鍵是角度和角色的選擇，角度的不同有時可以影響立場，而角色的變換有時又可以改變立場。

九月，巴黎燦爛的陽光，淡化了北京「六四」的血量。情緒化的激動已不合時宜，理性化的思考正在醞釀。面對一群流亡者充滿疑慮的探究的目光和海外此起彼伏的爭取民主的呼聲，民主中國陣綫在宣告成立的日子裡向人們暗示：已經聽到了一黨專制大廈搖晃的聲音。幾乎與此同時，民主究竟是什麼——這個一直煩擾着中共的問題，也開始令民陣的領袖感到痛苦。於是，另一種聲音說：民陣操作者的局限，則是中國民運的最大悲哀。

那麼，中國民運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到巴黎，僅僅是一種場地的更換嗎？

為什麼民陣的主要發起人劉賓雁、蘇紹智沒有參加民陣成立大會？儘管大會播放了劉賓雁的講話錄音，然而給人們的感覺却是掩人視聽。據筆者所知，早在民陣成立大會一個月以前，劉賓雁曾向民陣主持具體工作的人說明自己已在九月二十二日有一個活動，當時對方未置可否，之後仍然將民陣成立大會的日子定在九月二十二日，是疏忽還是其它，不少代表感到困惑。

還有，民陣籌備期間在人選界定上試圖沿襲中共機構的資歷、地位的做法，一段時間裡抱着曝光，爭當「英雄」的微妙心理等等，所有這些，遠不是像有些人所指出的關於四通文化對民陣的改造或某人在民陣搞獨裁那樣簡單。可以說，民陣的派別之爭，萌發了某些人劣根的慣性思維，它所帶來的排他性，模糊了鬥爭目標，造成了民陣領導機構人選上的困難，在海外民運人士特別是流亡者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反差。

追溯中共執政四十年來的歷史，一直是功利政治鬭爭的歷史。無論是：「巨人」時代的毛澤東，還是侏儒時代的鄧小平，功利政治的陰影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中國人民四十年來不懈的民主運動，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的「民主牆」運動乃至「八九」民運，正是為了從根本上削弱或改變這種統治，人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而且還在繼續付出。民陣從籌備到成立以來的一系列不正常現象，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焦慮。這是一個人事怪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人事怪圈，民陣成立之初就淪入這樣一個怪圈，豈不悲乎哉？

民陣的成立，是中國民運的一個新起點嗎？

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沒有對權力的制衡，那麼，我們最終也逃脫不了幾千年來封建專制功利政治的老路。

困惑之二——操作與操縱

民陣關於競選的爭議，一開始就比較激烈。在民陣籌備會上，有人主張直接選舉，有人主張間接選舉，爭執的結果後一種意見佔了上風。且不說這樣做有多少理由，單就迴避公開

競選本身，就使人們對民陣籌備組的民主意識有了距離感。尤讓人不解的是，在民陣成立大會的開幕式上，主持人說如果有十萬美金就可以搞公開競選，並多次強調民主需要妥協。人們嘩然：佔便宜的人都愛說顧全大局，如果有一萬個人參加競選，其中好的一百人，壞的一百人，相當一部份人是看不出來的，應該有公開競選的時間。民主需要妥協，但一定是在公開競爭基礎上的妥協，盲目的妥協只能是壓制。

然而，三天的會議議程安排得滿滿當當，程式化似乎準備代替程序化。第一天是在躁動不安中過去的，有人憤然：爲了民主中國奮爭的海外組織，如此這般怎麼能擔當起建設二十世紀民主中國的重任？

值得慶幸的是，更多的人則清醒地意識到，民主不是賜予的，也不是美金可以買到的，必須主動、積極地去爭取，在有限的範圍內爭取。因此，之後的兩天，無論對章程的討論，還是對領導機構的選舉、答辯，代表不同程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權力，雖然倉促而毫無準備，但是在亂哄哄的氣氛中，人們都感到了嘗試民主的愉悅和困頓。

結果當然是出乎意料的，甚至連民陣內部不準備公開競選的人也認爲比原來預想的好。但是，從僵死的程式化到簡單的程序化，我們難道僅僅能以此而滿足嗎？況且，這種實習民主的過程是否真正的民主程序？民主程序的操作是否就是民主本身？

困惑之三——精英民主

衆所周知，中國「八九」民運，是一次最普遍的全民運動，而非英雄運動。如果我們要

論英雄的話，首先應該爲那些已經犧牲在天安門廣場的勇士樹碑，爲那些仍然在大陸本土堅持民主運動的人立傳，更要爲那些身陷囹圄的志士謳歌。面對他們，我們是慚愧的。「六四」以來，從實質意義上講，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在一片頌揚聲中，口號已經重復多次，演講者亦已感到疲憊，無私無畏的犧牲精神呢？天下爲公的闊大胸懷呢？「六四」的光環不能永遠成爲人們注意的中心，「熱鬧過後怎麼辦」，正成爲輿論的焦點。但是，新的「精英」還在出現，真真假假，叫人莫衷一是。

「六四老太太」難道是「八九」民運命裡注定的副產品嗎？

無可否認，流亡者中的確是有真正的英雄的，然而，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在我們遠離大陸本土的那一天起，光榮就已經屬於過去了。如果我們仍然以領袖、精英自居，在海外擺天安門廣場的個人功績，我們就會落入中共論資排輩，論功行賞的白巢，這個沉重的負擔將會使我們舉步艱難。須知，民主是最大多數人民的權力，也是最大多數人民的事業，「精英」民主則是對最大多數人民民主意識的忽略。因此，人們有理由擔心這種狀況會不會將我們導向新權威主義的迷津？

困惑之四——民主的痛苦

民陣一位負責人曾經感嘆：中共的一套我們反對，真正的民主我們又不懂——這是坦率的。我們的痛苦就在於，明明知道民主不是一塊招牌，可是我們仍然因自身的局限而不自覺地排斥民主，使其不可觸摸。

這並不奇怪。因爲在實際運作中，我們才

發現推行民主遠遠不如成立一個組織那樣容易，人們會不斷地提出各種問題來限制你，制約你，動輒會說你不民主，說你專制。於是有人大呼：民主這個東西費人、費時、又費錢，而且出力不討好。

追求民主的人，就一定具有當代民主意識嗎？

當我們將民運的群體解剖爲一個個體的時候，人們惶惑了。這是一群在民主與非民主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的人，傳統的積淀和民主思想交織在一起，自身的不和諧，使我們只能報着手指預測中共政權對歷來冤案的平反周期，而不敢說「我們不要平反」。目標的不確定性，又使我們坐失了極有可能出現的海外民運大聯合的最佳時機。

我們曾經反對過的東西，我們自己又在使用。我們究竟怕失去什麼？

中國人民失去的已經太多了，在喪失了人的基本權力之後，這種種患得患失難道不顯得拙劣而可笑嗎？

我們應該割棄的是一切不符合民主利益的東西，我們應該防範的是民主陣營內部有可能出現的新官僚及腐敗。倘若不然，以民主爲目標的民運組織，也不排除走向民主反面的可能性。

這，將是民主的最大痛苦。

曇花一現的希望，並不是真正的希望。正如團結工會的代表所言：民主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追求民主的不流血的痛苦，其代價並不亞於天安門廣場上付出的鮮血。

有一點是可以預言的：民主終究會摧毀一切的不民主！

論平行結構及改革

崔三元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阿默斯·波爾琴特於一九八一年對當代世界的五類權威主義政治體制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平行結構」是權威主義體制的根本特徵之一。所謂「平行結構」，指的是執政黨或統治集團相對於政府和社會的結構，平行地建立起功能等價的黨內控制單位。

例如在蘇聯，黨內控制軍隊、特務控制警察；在中國，一九六〇年重建六大中央局後，在黨委內部分設了工業書記、農業書記、財貿書記、文教書記、政法書記等等；從中央人民政府至一切國家機關和企業均有黨的委員會（各部、委有「黨組」）；中宣部負責管文化部和社科院。諸如此類「平行」的控制關係，不勝枚舉。由此形成了「黨政不分」的平行結構。

對於通過革命的途徑建立起來的權威主義體制來說，「平行結構」的產生有內在邏輯。「奪取政權」，必定包含着有志於在各方面替代原有政府的功能，也即是在鬭爭中「平行」地另建一套。就中國來說，黨的一元化領導正是奪取政權的「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來的：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針對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各方面工作不協調的情況，決定在同級黨、政、軍、民各組織關係上黨是最高領導機關。這是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平行的控制機制。在奪取了政權之後，「平行結構」更加發展和鞏固

了，因為它是黨對政府與社會進行控制的「組織的武器」。建國初期的鎮壓運動，為防止「左」的偏差，中央規定要有黨內審批；可是一九五四年憲法實施後，黨內審批制度仍在政法系統裡長期保存延續了下來，這正鮮明地顯示出平行結構的巨大控制作用。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試圖改革「平行結構」，進行「黨政分家」。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這種努力的一些跡象。例如，一九七八年三月憲法中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這在一九八二年憲法中被微妙地改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是，儘管我們不懷疑這種「黨政分家」的努力的誠意，我們却不能忽視這種努力的高難度：這是一種「自我約束」。正如古希臘英雄尤利西斯怕自己被海妖的歌聲所誘惑而把自己縛在船棹上一樣，中共也試圖約束自身過多干預政府和控制社會的傾向。不過，與尤利西斯的確把自己縛在桅桿上從而使他的自我約束有了可信性不一樣，中共的自我約束尚未對於黨外人民來說成爲一種「可信的承諾」。而自我約束的可信性問題，正是改革「平行結構」成功與否的關鍵。

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肯耐指出，民主國家中的許多制度安排是專爲增加政府對人民承諾的

可信性而設的。如一八二五年後國會的委員會制度，使「瞬間的多數」不起作用，從而增加了政府的公共政策對於選民的可信性。這啓發我想到，中共中央自我約束的企圖，也應訴諸一些具體的制度安排，方能增加可信性。真要改革，必須自己對自己過河拆橋，使自已除改革外無處可退。這就是自我約束的制度安排。

具體地說，我認爲應建立制度，保證黨的財源不來自國家預算。黨和政府的財務關係必須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在蘇共一九二三年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曾秘密散發黨的財務收支平衡表供代表們討論，但不公開發表。這以後便連這種討論也沒有了。在西方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份蘇共財務收支平衡表是一九二〇年三月廿八日的「中央委員會通訊」，其內容顯示出：百分之八十五的黨的收入來自國家預算支出。這等於強迫其他非黨公民交黨費。中共中央這方面的情況不得而知。但既然有誠意進行自我約束的政治體制改革，將黨政分開，就應該將黨的財源建立在黨員交黨費和向社會各界籌款的基礎上，堅決根除與國家財政預算的關係。如果這方面的制度安排與公衆監督真的建立起來了，黨政不分的「平行結構」就不復存在，廣大公民對黨的今後的其他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就有所信任。因此，這是很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中國政治發展的重大課題。

論中國的聯邦制

靜光

一、一個危險的領域

至少在相當一批改革者的內心深處，始終抱着對聯邦制度的追求。經過十年的探索，包括在朝的開明派、少壯派，還是在野黨的民主人士或獨立知識份子，大家在「六·四」屠殺之後，放棄對中共的最後幻想，以重建共和國和締造聯邦制為新一代革命家的歷史使命。透過十年來的變革，我們可以從「分區立體開發戰略」、「財政分灶吃飯」、「梯度論」和「國際經濟大循環」等一系列國家的發展戰略中，看到一種趨勢和潮流：不同的政治、經濟口號，雖然像是提法上的藝術，但却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了一種共同的信念。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多樣化傳統的泱泱大國，集中統一地，步調一致地對現代化，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的現代化，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也許使這個國家的人民難以承受。適應變遷與社會進步，解決中國各局部所獨有的問題，可行的路途似乎還是有限單元內部的自組織，政治上的制度形態的選擇就可能是一不冠以聯邦名義的聯邦制，或者明確地說，分省自治。

在中國大陸本土上、學術上探索聯邦制也是相當危險的話題，人們總要擔心是否會背上分裂國家主權的罪名，不少學界和政界的權威也在為中央權威統治的日漸勢微和地方精英統治者權力的膨脹和事實性而深感不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發展時期，可能有不同的政府形態，但人類發展有相通處。問題不在於聯邦本身是否正確與否，根本問題在於權力界限的劃分，一個界定財產和政治權利清晰的政體制度，其構架可能有不盡善之處，但具備可修正之可能，則此種政治格局就有生命力。中國區域問題的解決，同時具有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解放之意義，作為既成格局的現狀，如何設計可供人民和當權者作為替代當前局勢的選擇，才能使分權意義上的聯邦中國以和平過渡的方式達致理想的彼岸，需要一系列條件，包涵澄清政策設計者內心對聯邦制的追求與恐懼的矛盾。

二、地方主義的興起

就國內而言，傳統集權意識中認為聯邦是一種分裂國土的可能方向。在海外，人們體驗到此種意識不過是對聯邦制基於無知基礎上的幻覺，而在中國大陸，它却是一種真實的恐懼。新疆、西藏反復出現的獨立傾向和一些平民示威，更使中共當權者感到惴惴不安了；其次，中國的十年改革已經造就了一批相當成熟，具有地方利益意識並擁有實力的地方政治力量，已經形成了一股以沿海發達省份為先鋒的地方自治的潛流，對此中央政府雖早有覺察，但迫於改革大潮所趨，保守勢力難以把握和控制，面對崛起的地方政權，中央政府的統一調度能力，特別是一般經濟財政權威性，已經過計劃、財政和物質多方面的改革而遭受到致命的弱化，由此產生大權旁落的「中空」心理，名義上則是對中央政權調集戰略資源以備不時之需的擔憂；第三，中國地域之廣闊，區域資源賦存條件差異之大，資本積累能力之懸殊，以平等的觀念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很可能在「匆忙的」分權過程中進一步迅速擴大，以至原有「落後緊張感」的不發達地區陷入對發展的絕望中而無法動員起來加入爭取現代化的行列，這也不是不可能的；第四種擔憂來自經濟上的現實考慮，中國法制之不健全，之無權威性，舉世皆知，當分權與統一協調的經濟政策上稍有失誤，經濟獨立和各種國際貿易中空見慣的保護主義的手段即會在中國的區域貿易中迅速興起，並成為嚴肅的政治問題，甚至釀成頻繁的衝突。經濟上的割據，很可能使舊體制下的資源配置方面的失當和非經濟性變得更加積重難返，如糧食調入省和調出省之間的矛盾，產棉區和紡織業集中區，即原料輸出區和深度加工區之間的經濟不平等，由於難以短期形成平均化格局，此次保守勢力的大反攻，可能更令人在聯邦制的设计上裹足不前；最後，地方立法權和全國名義憲法之間的衝突亦會發生，盡管可能假以時日，立法衝突，多樣化與客觀可調控性在分權的過程中，其難度自然可急劇上升，它也會引起大部份當權者，尤其是中央層的不滿。中國地方官僚從來視其所轄的領土作為己有，正是所謂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可惜「天高皇帝遠」，發展地方經濟，繁榮當地文化，形成獨立政治力量，在十年改革中，往往是經濟發達省區的

目標，尤其在歷次政治風潮中，地方省份只要不介入，經濟保持穩定和增長，不僅經濟力量壯大，政治實力也隨之強化。因此，以鄧小平為首的打下中國江山的一代，突然意識到地方主義的興起，並深深地擔憂着。以上種種擔憂，在「六·四」之後，變得更加明顯，中共高層人士的結構，往往傳遞出中國政治上的最重要信息，以上海、天津的地方勢力抑制北京地方勢力，以地方幹部抑制中央幹部，表面上看是鄧小平的政治手腕，不錯，實際也含有中央準備向地方讓權以謀利的動機和壓力，中國經濟的難題在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發達省份的貢獻來解決。沒有權位方面的代表性讓步，中央的權威將會面臨直接的挑戰。近期對廣東潮的整肅，也表明中央在借「六·四」血案之機，迅速攬權，以清掉難以指揮和控制的大尾巴——如粵省。

三、經濟分權與政治民主化 是學生兄弟

形成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的不同發展風格，對於中國，一個長期在一統意識下倍受苦難的民族，可能是和平年代發展經濟，培養政治的一種相對而言為上策的形式，只可惜在這屆政府的專政統治下，地方分權的正式誕生是不可能的了。但歷史趨勢所在，誰又能阻擋呢？經濟上的分權已為政治上的民主起到了培養基礎的作用，沒有理由指責十年經濟改革是過重於經濟而放棄政治民主化，從而導致了「六·四」屠殺。將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相割裂的觀點，不論是什麼人，都是對中國實際政治經濟運作的無知。在地方分權化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的壓力就會逐步由底層轉到表面上來，形成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組織部分，民主

的形式和程度是可以存異的，並因實際狀況而調整。

事實上，經濟分權與政治民主化是很難長



·四·突變，但一個成熟的中國民主制度在中國的誕生和成長，可能還要經過一段漫長的鬥爭和痛苦的歷程。「五·四」精神和「六·四」國殤日仍將是一代代年輕人追求和嚮往的目標。對聯邦制度的構想執不同的看法，其思想之間的衝突並不會構成中國進步的障礙，科學地、理性地探討人類的有效組織形態，特別是在結合中國情形的具體條件中形成可能的非統一性質的反應調態方式並使之以制度的方式相對地固定化，可能有出路。現實中，那些由於地理上的差異，土壤貧瘠、氣候不同而產生的不同生活方式以及伴生的區域衝突，形成對中央政權的巨大壓力，才是長期的，難以迴避的問題之癥結所在。正是這些現實的、強制的統一和表面的偉大，才給中國各民族人民帶來了如此之多的苦難和難以協調的利益衝突和緊張。

期割裂處置的一對學生姐妹，特別是在中國的官場政治和官場文化中，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雖然有「六

當然，沒有一個堅強的、高效的中央政府（非軍事管制方式意義上的有效），一味放權讓利於地方各級行政當局，而在過程中又缺乏對活動及功能邊界的認同和確實，整個社會必然陷入總體上的不安。蘇聯和中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嘗試，沒有老百姓再相信共產黨那一套鬼話了。蔣介石當年痛恨共產黨，因為他確信：共產黨是一種泯滅人性的制度。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財產權利問題上作了近乎極端的公有化運動，從而在人性深處將人類對生活，乃至對生命的追求轉為盲目的行動，從狂熱到消極，

而始終找尋不到的就是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全民所有的產權形同虛設，資源在產權虛置的條件下，沒有負責的經紀人作出最佳的決策，而徒然浪費。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已經沒有任何經濟理想的激勵和對私利的追求，又有什麼能激勵人們久久地「奮鬥不息」呢？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背後意味着政治過程的黑暗，它在表面上看似是節約了客觀意義上戰略資源配置上的交易費用，包括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談判。但與此同時，任何現場式的配置決策，適當的激勵和自動調整適應的功能也在一統制的約束下，喪失了無數機會。

四、起點和終點 都將是獨立的人

「六·四」民運之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以企業為起點，以地方分權為依托。「六·四」之後，這種表面文章將難以為繼。終於打出人權的旗幟和聯邦制的理想。從此，分權潮流中的起點和終點都將是獨立的人，而聯邦制在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運動中，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而聯邦制的第一步，還是在經濟權利上作財產和功能上的界定。大致劃分經濟活動的範圍，可以認為，小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分權是一類，現代大公司型的制度分權又是一類。前者每個小商品生產者的活動能力有限，影響力也自然要受到種種來自社會傳統和自然條件的種種約束，從而表現其談判能力的不足，難以與一個雖然低效但太龐大的中央官僚機構抗爭，影響力也自然受到局限，這種分權近乎一種無組織的自然狀態，相當於經濟學中的完全競爭的概念，既不能形成規模經濟，也不可能與政治上的壟斷組織——中國共產黨，所抗衡；後者，即現代大公司組織形態上的分權

，它將克服小經濟與大政府之間永遠無法逾越的困難。因此，事實上將形成壟斷競爭的格局，地方政府與中央北京政府的分權活動和方式，都可以在現代公司組織活動形態和方式中尋找借鑒，聯邦制度在中國的演進，不僅要將此兩類純粹發展意義上的分權加以運用，同時必須借助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理階層，也是趙紫陽最賞識的「企業家」階級，沒有一支中產階級的創業者隊伍，中國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企業家的產生，則僅僅是改革的果實。像萬潤南這樣的企業家，沒有改革造就的大氣候，永遠也只是個共產黨的小官僚。而今，大家能抱有「重建共和，締造聯邦」的理想，共同為推翻專制而奮鬥，則是海外之一大幸事也。

個人、企業、地方三級分權結點在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整體發育過程中，同時並存，利弊得失混雜，彼此矛盾或相互促進。「八九」民運之後，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趨於複雜化，不僅面對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而且同時面對種種現實的困難。難怪人們在設計或思考聯邦制度在中國實現可能性時會產生上述種種擔憂。中國大陸十年艱辛改革，對於幾乎所有參與改革者的人來說，雖然成績斐然，舉世公認。但今天平心而論，八九民運和改革進程的停頓以至倒退是息息相關的。未來改革的走向、趨勢和格局，已經超越了中國傳統中的記憶，也超越了現實中可以學習的經驗，在一個尚未完全開放的國度中，可資借鑒和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少了。聯邦制，或者第一步稱為分省自治，對於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在探索自身發展的國家，（一個巨大的國家）分省決策，首先將可以分散由於統一行動形成的危險共振。在局部失效，乃至失敗時，不致引發全局性的動

亂，而在局部成功的條件下，又可以適時地加以有效地拓展，不致於退進失據。

從中國自身改革過程看是如此，今天從國際背景看中國，更令人感到要解決中國的大政問題，聯邦制可能是迄今可供選擇的政治形態中最好的選擇了。正如中國民陣主席嚴家其先生所指出的那樣，聯邦制至少可以幫助我們一起思考台灣、香港和西藏的問題。這三個地區的問題，只有在聯邦制度的框架內才有討論統一的可能性。

回顧前些年的改革，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間財產權利和行政功能方面，我們實際已經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努力和嘗試。當時的原則完全是就事論事的解決問題而較少明確的原則。憑借「熟識社會」中的個人關係而調整制度結構中的某些零部件。今後的原則可以很明確了：私有經濟財的運作及歸屬，為民有、民享；公有經濟財則視其地方性和國家性而以徵稅的方式完成收入方式的任務，非國家利益由省級決策完成其配置。就中國現今階段所走過的財政、貨幣、工資、稅收和物資等方面實行的大包幹式的試驗，對於正確規範的形成，恐怕都將停留在非制度化的短期政策水平上。各種形式的經濟大包幹，對於地方行政官僚的機制，根本不同於「包幹」所給予農民帶來的激勵，對於此種根本性的差異，早該引起高度注意。地方大包幹的形式只是在現在的行政圈子裡作了第一手的轉手交易。作為一級行政管理單元，他們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產權激勵機制，主體生產單位也就難以形成質的改觀。產權，如果不與個人相聯，在不發達國家的客觀管理過程中，在缺乏基本法律和行政監督的條件下，產權只可能是一種虛設。但以削弱中央權力為手段，以盡可能接近信息源和事變點的觀點，

任何與地方事物相關連的權、責、利都應無條件地回到地方級。儘管這裡還有許多轉型社會中的基本矛盾，但作為第一步，走向地方則是由無序到有序的開始。

五、革命對中國仍然不如改良

雖然經過了「六·四」屠殺，在許多人堅持打倒共產黨的主張聲中，我們始終應客觀地看待現實，並指出中國依然存在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實現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推動聯邦制的實現，至少就大陸現階段而言，可能的努力方向仍將是地方立法權限的設立，在軍隊鎮壓人民之運動之後，中國法律的尊嚴已一掃而空，地方立法權似乎已是虛空，但若能認清時局，不失時機地奪到此項權利，今後的收復靠現中央的權威是辦不到的，同時此舉又將會在地方法規與憲法之間造就矛盾，從而形成推動修憲運動的潛流，中國區域間、民族間的巨大差異和發展程度方面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經濟背景，造就了各地域（省區級和地縣級）所面臨的問題是迥然不同的。充分利用中央採取極端手段鎮壓人民後形成的「權威」真空，以經濟權下放為手段，輔之推進地方立法，中國的黑暗政治時代就可能壓縮，而不致於在形勢轉變後，我們依然無所事事。中國政治民主化，單純地依靠自下而上的街頭民主運動，或寄望於開明君主的新權威下的宮廷革命，或者可能釀成新悲劇，或者曠日持久，而難以奏效。現實的選擇必然是二者的結合，而不是彼此孤立地運動。省區級立法權既便能有，中國法制建設過程中的沉痾依然難除，整個制度將會出現極大的供給不足，從而也給地方獨立化的傾向提供了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

。孤立地看待地方爭取立法權的暗中努力，可能是悲觀的，但若將此置於更廣闊，更長期的發展時空中看待它，結論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中國未來能否走向聯邦制，尚屬未定之論，但今天的努力一定會為未來奠下一個基礎。

除了在法律方面的基本努力，中央和地方在財稅方面的結構應有一個事先大體明確的設計，整個稅收結構的基礎建立在何處，公共開支的決策權置於何處？隨之而來的進一步問題會漸漸涉及私有權和個人選擇自由的基本點上的核心問題，而能否解開這些束縛，則是中國能否邁向政治民主化的關鍵。理順中央與地方在財務上的關係，是中國政治長期穩定的基礎，朝令夕改和變動不居的財政結構，往往累積起更多的政治怨恨。「六·四」之後，北京之外的不少地區，都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中共政策的強烈不滿，並對進一步的各種運動持保留和觀望態度而不是憤常的積極響應和協作。這些都是涓涓細流，可早晚要匯成一股潮流的。總不能對三十個省區都實行軍管和戒嚴吧。稅制的改革，八九民運之後，首當其衝要被束之高閣，中央太需要集中調度資源以「撫慰」各方了。因此，經濟意義上的所有經濟稅金（自然壟斷形成的和資產累積形成的）都可能遭到來自中央政府的伸手派的暗算，至於能否算計成功，則端視地方精英所應付的事了。

六、十年改革已形成強大動感

如果說，在法律上和財政的進步過程中，成效可能不大是預料之中的，那麼，十年開放和改革至少使人產生了「動」感，區域間的盲流會令中共大為頭疼，那麼「不用選票而用腳」去作出相應的經濟選擇也是推動中國分權運

動和最終走向聯邦制的一種重要努力。國內區域間的貿易、勞動要素的自由流轉，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須條件之一，也是逐步形成政治秩序的有效步驟和必要環節。契約精神的形成與分權條件下的貿易關係，可以從近些年的區域封鎖和橫向經濟聯合兩方面汲取經驗和教訓，以期從中探索中國在契約化、規範化的貿易格局中，地方利益的形成和發育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改革以來，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逐步明確化，地方決策涵蓋的範圍也日漸擴大。回顧大陸這些年所不斷出現的「羊毛大戰」、「糧食禁運」以及其他種種形式的區域封鎖，不難看出，雖然中國的生產者已有了利用價格信號對產量作出調整的動機和行動，但由於地方主義的着眼點不在於基本的法律上的自治，而是盡可能多地攪到實利，從而地方行政部門與直接生產者之間又會繼中央、地方間矛盾之後而生出地方、企業間的矛盾。經濟物品在行政勢力的控制下，加之雙軌制的影響和作用，正常的區域間，甚至省內的經濟流都可能難以順利實現而遭阻滯。已經被人們淡忘的，曾經熱鬧一場的橫向經濟聯合，也同樣是一種籠罩在產品經濟陰影下的實物交換過程，從而不可避免地歸於流產。沒有國際開放和借鑒，單憑自身的努力實在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利用外部衝力的能量，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狹狹大國，雖可加速現代化進程，但畢竟是十分有限的，主要的難題還在於國內事務方面。

中國政治民主化從不因爲迴避它而自動消失。聯邦制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幾十年，上百年政治歷程的結果，中國的許多現實問題，如果不沿着聯邦制的思路往下想，很難求解，而避免分權過程中的割據，也是制度設計者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問題之一。

改革開放政策與大陸民運

楊力宇



中共十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逐漸改變了大陸的經濟結構，和引進了西方的科技、設備及管理技術，也引進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因而也間接地導致了大陸的民主運動。中共始終未提出相應的政治改革及政治開放來配合其經濟改革及經濟開放政策，甚至設法阻擋民主的巨流，加速了大陸學生的民運。

其實中共並非完全漠視政改的重要性，中

共亦曾提出具有局限性的政治改革。在十三大的文件中，中共雖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但却同時強調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只承認在其「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中共認為這些「缺陷」包括「權力過份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未肅清」。因此，中共在十三大宣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是中共制度的「特點和優勢」，並表示決不接受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通過選舉而建立的輪流執政制度。在此一認知下，中共十三大並未確定任何政治制度之根本變革，只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政治（其實是行政）改革：

- 一、黨政職能分離。
 - 二、進一步下放權力。
 - 三、改革政府工作機構。
 - 四、改革幹部人事制度。
 - 五、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
 - 六、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某些制度。
 - 七、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 在上述各項改革中，除「黨政分離」比較意義重大外，有的是口號（如加強法制建設），有的是形式（如建立協商對話制度），亦有

的是行政改革（如改革幹部人事制度）。而在「黨政分離」上，中共雖強調黨政職能分離，但却並未改變黨權至高無上、以黨領權，及一黨專政等本質。因此，中共十三大所確定的「政改」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並無朝向政治民主化及政制基本變革的趨勢。

早在一九七八年，魏京生等民運人士開始出版「北京之春」之時，他們即已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要求。然而，不久「民主牆」被封閉，「四大自由」（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自由）被取消，魏京生以「透露國家機密」之罪而被判刑十五年（至今仍在獄中），中共並提出了「四個堅持」，且載入其黨章及憲法。「四個堅持」現已成為中共政治現代化的主要障礙之一。

近年中共雖允許「民主黨派」之復活及人大、政協的「熱烈討論」，但並未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至高無上權威；人大、政協，及民主黨派絕不可能改變中共中央的意志；民意、輿論，及民主運動亦不可能改變中共的決策。一切重大決定由上而下，形式化的選舉及投票，安排式高級領導人繼承制度均少有意外，一切承襲中共當局的意旨。中共雖已實行了所謂「差額選舉」，但基本上仍是由中共提出其所能接受的候選人，與真正的民主選舉仍有本質上的差異。

中共一再批評「西式民主」，繼續奉行其特有的「民主觀」。中共式的「民主政治」具有以下特點：

- 一、民主集中制。
- 二、民主協商。
- 三、一黨專政。
- 四、安排式的選舉。
- 五、黨治高於法治；人治高於黨治。
- 六、軍隊由黨控制。
- 七、未能獨立的司法制度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淪為政治的工具。
- 八、立法機構基本上仍扮演行政當局的橡皮圖章之角色。
- 九、安排式的領導人繼承制度。
- 十、象徵性的民主黨派。
- 十一、憲法對各種自由及人權之保障形同具文。

然而，早在八〇年代中期，大陸學生及知識份子即已展開了強烈的政改及民主化的要求。他們的要求至今仍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 一、舉辦基層選舉。
- 二、除花瓶裝飾性的「民主黨派」外，允許不受中共控制的獨立政黨之出現。
- 三、保障基本人權及憲法列舉的各種自由。
- 四、逐漸建立「三權分立」(中共斥之為「三個政府」)之政治體制。
- 五、開放民辦報刊。
- 六、允許民意及輿論產生制衡及監督的作用。

七、建立完善的法制。
在十三大期及十三大以後兩年中，中共對上述的基本民主要求，全不考慮，在政治上

並無任何突破。甚至連十三大提出的「黨政職能分離」及甚有局限性的行政改革近兩年亦無重大進展，因而導致近年來大陸學生及知識份子的失望及憤慨。而日益嚴重的物價問題及貪污、腐化，和特權等普遍現象，使城市居民及工人的生活亦更形困難，對中共及其政府的怨恨日益加深，信心盡失，最後終於爆發了一九八九年全國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以迄六月中共當局一再拒絕與大專院校學生代表及民運領袖作平等對話，亦未採其具體步驟來推動民主化及清除貪污腐化，反而動用軍隊及坦克來全面鎮壓民主運動，引發了六月四日的軍事鎮壓，中國大陸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危機及空前浩劫。政改因而全面停擺，經改又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受到整肅，和平順利的政治繼承基礎已被摧毀，而權力鬭爭亦更趨激烈。軍事鎮壓行動亦導致軍方勢力的膨脹；保守僵化的中共元老似有回朝之趨勢——中共十多年來的經改及開放政策所傳播的西方民主思想助長了大陸的民主運動，而鎮壓行動幾乎摧毀了中共近年建立的穩定及改革開放政策上的成就——這不但是鄧小平的個人悲劇，也是一個中國歷史性的悲劇。

而造成此一悲劇的主要原因中共拒絕面對世界民主化的巨流及大陸內部日益高漲的民主運動。中共領袖遲至今日仍然認為經改必須進行，但民主化必然造成政治上的動蕩(甚至動亂)，影響經改及經濟發展。因此，中共未能從經濟開放走向政治開放，亦未能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更未能從經濟現代化走向政治現代化，因而引發了壯大的民主運動。

(作者為新澤西州西東大學亞洲學系主任)

自辦加拿大移民

請問您是否為在美國不能轉身份而感到煩惱？請問您是否想早日和您的親人團聚？如果您的回答是「是」的話，您大概會為三、四千美金的律師費而感到棘手吧。

其實，您不必請律師，我們可以幫助您，我們為您提供移民加拿大的資料及八九年最新職業評分表，詳盡告訴您如何成功移民的密訣。無論您有無學位，您都可為自己找到充分條件，因為加拿大很多職業只需「經驗」。我們的資料費只需三十元，而如果你請教律師，第一次談話費就要五十元。

我們的資料成功地幫助了數十位學生、學者移民加國，加國政府今年增加近三分之一的職業移民配額。如果您想把握這個良機，請寄\$30美金支票到L·L·XIE, P·O·BOX 1260 NEW YORK, NY 10159。

註：我們的移民資料適合所有可以移民加國的國家。

什麼是「非暴力」？

吳牟人

「X是什麼」先於「X好不好」

「不要「打倒共產黨」，是前段時間的熱門話題。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是說老實話，我對「打倒共產黨」這句話到底指的是什麼，却並不很清楚。因此，我在三個不同的場合，問了三個人一個同樣的問題。他們有人贊成「打倒共產黨」，有人激烈反對。我的問題是：當你說「打倒共產黨」的時候，你指的確切意思是什麼？我得到了三種不同的回答。唯一相同的是，這三個人在聽到我的問題後，都愣了一下。

這使我想起在芝加哥一次大會上的情形。幾十個人在討論要不要在海外成立一個政黨。一位朋友提出，政黨的一個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奪取政權。另一位對此似乎極為反感。他站起來激動地說，我們要的是一個「搞」民主的政黨，而不要再像共產黨那樣，一心想的就是奪權。這時，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台灣朋友問我：「奪權」是什麼意思？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消解了這一爭論。當我們把「奪權」定義為「成爲執政黨」的時候，那位剛剛表示反對的朋友也就贊成政黨就是要奪權這一主張了。看來，他只是不喜歡「奪權」這個詞，這同有人不喜歡「打倒共產黨」一樣，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

「X」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先於「X」好不好這個問題的。

現在，人們又在爭論「非暴力」有沒有效用的問題了。有的已經把它奉爲行動的準則，有的則大不以為然。但是，却從來沒有聽到那一位人士來告訴我們「非暴力」是什麼。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就字面上來說，「非暴力」的意思似乎很明白。一位朋友就不假思索地告訴我，「非暴力」就是不使用暴力。但實際情況却複雜得多。我對美國政府就從來沒有使用過暴力，今後我也不會有這種意圖。我能不能由此說我對美國政府堅持了「非暴力」的原則呢？

這篇文章試圖給出「非暴力」概念的定義。採取的方法是：通過對「非暴力」概念在各種上下文中的用法的分析，得出這個概念之明確而全面的定義，再進一步把這些定義所假定的前提揭示出來。在這裡，我不想就這個方法本身進行更多的討論。就這方法我想說的只是：如果讀者同意我對各種用法的分析和解釋，如果定義的各個方面及其所假定的各種前提邏輯上相一致，結論就必須被接受。除非你重新創造一種「非暴力」這個詞的用法，從而改變了它的意義。你可以說：當我說「我對美國政府堅持了非暴力的原則」時，聽起來雖然奇怪

，但我有權力給「非暴力」這個詞這樣一種新的用法。當然可以。唯一的區別是，人們並不會由此像尊重一個非暴力主義者那樣尊重你。

非暴力乃有權使用暴力而不用

我首先從「暴力」開始。按照詞典的定義，「暴力」是一種有形的力量（PHYSICAL FORCE），它造成人類的身體或生命或其財物的損害或破壞。這個定義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我們在此可以暫時撇開心理、情緒暴力的問題）。當然，動物保護主義者可能會提出反對意見。

表面看來，只要同意了「暴力」的定義，「非暴力」的定義就很簡單。「非暴力」或許會被理解成這樣的意思，即一切沒有使用暴力的狀態或行爲，但事實並不如此。「我昨天在街上滿面笑容地推銷書籍」指的是一個事實，但是，如果我說「我昨天在街上以非暴力推銷書籍」，人們會覺得奇怪，人們會說我不知道「非暴力」這個詞的正確用法。這個例子證明，我們並不把一切沒有使用暴力的狀態或行爲都稱作「非暴力」。「和平的行爲」和「非暴力」在這點上並不重合。這一點至爲明顯。如果我們把一切沒有使用暴力的狀態和行爲都稱

作「非暴力」，「非暴力」概念就失去了其特殊的意義。我們不但把甘地稱作非暴力主義者，我們還想知道，他同一個永遠滿臉堆笑的人的區別在那裡。

對那些沒有使用暴力的狀態或行為作一分析，我發現，我們之所以不稱其為「非暴力」，是由於它們所共有的一個性質：在那些情況下，都不存在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我推銷書籍的時候是這樣，美國總統在受到責難時也是這樣。

由此，我們得到了蘊含在「非暴力」概念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性質：把一種沒有使用暴力的狀態或行為稱作「非暴力」，非暴力的主體（個人或組織）必須具有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

這樣，關於「非暴力」的第一個初步的定義是：

(1) 非暴力是在有權利或理由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拒絕使用暴力。

但是，這個定義有一個嚴重的缺陷。定義中的「權利」或「理由」，這二個概念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我們有各種社會的、禮俗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道德的標準。它們對權利都有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規定。即使按照同一套標準，對一個具體事實的解釋也難定於一尊。尤其是在幾套不同的標準對同一事件中的權利概念作出相互衝突的解釋時，上述定義就變得更不確定了。一個美國法官所認同的權利，一位中國老太太很可能大不以為然。因此，美國法官眼中的非暴力主義者，就不會得到中國老太太的認同。

根據其邏輯的可能性，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權利」或「理由」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定義的不確定性，才能被消除。第

一種辦法是：徹底取消權利或理由的概念。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存在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或者有一個不存在任何暴力的世界——大同世界；或者有一個非理性的野蠻世界。但是，這種辦法雖然消除了不確定性，它把「非暴力」概念本身也取消了。對生活在這兩個世界中的人來說，說一個事件是「非暴力」的，並不表達任何意義。在這兩個世界之內，也就是說，在談論發生在這兩個世界之內的事件時，他們不會使用「暴力」和「非暴力」這兩個概念。

這一點，更加凸出了「非暴力」原則中「權利」概念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就無所謂拒絕使用暴力。沒有「權利」概念的「非暴力」的概念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種辦法是：由某一種權威來嚴格確定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有權利或理由使用暴力。事實上，特別是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地球上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都認為，在生命受到暴力的威脅時，人們有權利暴力反抗。可以說，至少有一些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是在人類中普遍得到同意的。在這種情況下，「權利」概念得到保留，並有了明確的規定。現在，我們可以把關於「非暴力」的初步定義改寫成：

(2) 非暴力是在有普遍認可的權利或理由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拒絕使用暴力。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反例。設想一下一個受虐狂的情形，設想一下一個極其膽小者抗的情形。設想他們都在受到暴力攻擊時毫無反抗的情形。按照我對中文的理解，我們都不會稱他們為非暴力主義者。「非暴力」的這一用法揭示了「非暴力」概念中又一個極其重要的性質：要把一種沒有使用暴力的狀態或行為稱

作「非暴力」，「非暴力」的主體（個人或組織）必須是出於某種特定的動機。並不是出於任何動機而不使用暴力就可以被稱作「非暴力」。在稱一個行為為「非暴力」之前，我們要問：為什麼不使用暴力？上述的初步定義未能回答這個問題。而一個完整的「非暴力」概念的定義則必須解釋這一點。

耶穌和甘地的超越原則

第三種，也是最後的一種辦法是：承認存在着某些普遍認可的，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但同時設立一個超越所有這些權利或理由的最高原則，並按照這個原則，拒絕使用暴力。這個辦法的具體化需要詳細地分析，在此，我將不再根據純粹的邏輯可能性來作推斷，而以兩個按照此一方法闡述其「非暴力」原則的人物來加以說明。這是兩個極有影響的人，我指的是耶穌和甘地。

如果要以一句話來準確概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區別，那就是：基督教相信耶穌的這個人是基督（即猶太教所稱的彌賽亞），而猶太教則認為絕不是。這就是為什麼猶太教只把「舊約」奉為聖經，而不像基督教那樣，把主要記載耶穌事跡的「新約」也奉為聖經。在歷史上，猶太人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壓迫。猶太教一方面把這看成是由於猶太民族對上帝誓約的背叛而遭到的懲罰；另一方面，猶太教裡又充滿了復仇的觀念。猶太教相信，上帝最終將消滅壓迫猶太民族的敵人而還其樂土。羅馬帝國時期在猶太教中所流行的彌賽亞即將來臨的預示代表了這種觀念。猶太教的彌賽亞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即將降臨於世，以其無比的強力消滅壓迫猶太人的羅馬帝國，拯救猶太民族於

水火之中。

這時，當一個猶太人站出來，宣揚以愛來代替仇恨，以寬恕來代替復仇，並說出「愛你的敵人」，「打你的左臉，把右臉給他打」的時候；特別是在他竟然宣稱他就是彌賽亞的時候，猶太教信徒的憤怒和震驚就是可以理解的。對猶太人來說，這既是對其民族的一種背叛，也是對上帝的無上褻瀆。把這個人送交羅馬總督予以處死也就成了必然的結局。

在這裡，猶太教相信殘酷的暴力面前，他們有充足的權利或理由進行暴力的反抗。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行使這種權利，如果有這種能力。他們的這種期望以「光榮的彌賽亞」這個形象表現出來。他們的上帝並不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

耶穌基督則設立了一個更高的超越原則，非常簡單地來說，這個原則就是愛。在這個超越原則面前，一切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都不再重要。由此，一切關於這種權利或理由的爭辯就不再具有決定行動的意義。一切恩怨到此為止。不管你有如何正當的權利或充足的理由來使用暴力，你必須在超越原則面前宣示寬恕。在這裡，「權利」或「理由」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非暴力」概念的不確定性，以使他們不再具有決定如何行為的方式被消除。但是，超越原則並未由此徹底取消了權利或理由的存在。相反，這種權利或理由的存在才使超越原則得以表現。只有擁有這種權利或理由的人才能給別人以寬恕。而同時，這些權利或理由也由於超越原則而得到升華。上帝的愛不僅表現在他拯救，而更表現在雖然他有權利和理由（由於人類的罪惡）施以毀滅，但他却拯救。

聖雄甘地對非暴力原則的說明同耶穌基督

的思想在結構上是完全一致的。甘地的超越原則則是印度教中的 SATYAGRAHA——一種宇宙的愛力（LOVE FORCE）。甘地強調，沒有對「愛之神」（GOD OF LOVE）的真正信念，就不可能有非暴力。（見 POLITICAL IDEOLOGIES GOULD AND TRUITT 編一九七三 P. 四二〇）在甘地那裡，權利或理由的作用，一方面表現在他們使 SATYAGRAHA 在非暴力者身上表現出來，另一方面，他們也使暴力者感到震撼。因為暴力者按照其自身的邏輯，會預期一種暴力反抗。他因預期落空而震撼，從而感受到 SATYAGRAHA 的力量。

現在的結論是，為了在定義中保留權利的概念，為了在定義中消除權利概念的模糊性，為了在定義中解釋為什麼非暴力（這三個條件是定義所必須提供的），耶穌和甘地設立超越原則的方法是邏輯可能性中唯一可行的辦法。從他們的方法中，我們得到關於「非暴力」概念的完整定義。這個定義是：

(3) 非暴力是在有普遍認可的權利或理由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按照一個超越所有這些權利或理由的最高原則——愛，拒絕使用暴力。我們看到，我們毫無疑慮地稱耶穌和甘地為非暴力主義者，而他們關於「非暴力」的說明，也正是我們邏輯分析的結論。這真是一個非常令人賞心悅目的結果。

非暴力絕非權宜之計

在定義(3)中，所謂的「最高原則」並不是一個可任意替代的指稱符號。它具有特定的所指，也就是對人類（包括敵人）的愛，對愛和善的力量的「活生生的信念」（甘地語）。由

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按照其他不同於「愛」的最高原則而不使用暴力的行為，有沒有可能是「非暴力」？也就是說，如果出於不同於「愛」的其他動機而不使用暴力的話，是不是「非暴力」？如果找到這樣一個不同於「愛」的最高原則或動機，定義(3)就仍然是不完整的，它還不是關於「非暴力」的唯一可行的定義。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其困難性表現在：除了「愛」的動機外，人類還有其他無數的動機。如果為了證明唯有出於「愛」的動機才是非暴力，我就必須逐一考查其他動機所產生的行為是否為「非暴力」。很明顯，我們是不能考查無數的。我也不能找出一種動機，並規定，只有出於這種動機的行為才是「非暴力」。耶穌和甘地正是這樣做的。對他們來說，沒有愛，就不存在非暴力。他們是「立法者」。但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說我贊成他們的觀念而已。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到目前為止關於「非暴力」概念的說明中，還沒有其他的說法既符合事實（即能被接受為非暴力行為），又能在邏輯上一致的。因此，對上面那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我可以這樣回答：現有的，用不同於「愛」的其他動機來定義「非暴力」的說法，要麼不符合事實，要麼邏輯上不一致。

比如，如果一個人由於害怕而屈服，但又說他堅持了「非暴力」原則，就不會被接受。尖刻的甚至還會嗤之以鼻。再比如，一個人想到自己手無縛雞之力，沒有有效的暴力來制服敵手而不使用暴力，但又說他堅持了「非暴力」原則。他之所以成為「非暴力主義者」，是因為「搞不了暴力」。這種說法實際上是自相矛盾。因為人家自然要問這種「非暴力主義者

「一個問題：如果你搞得了暴力了，如果你有強大的軍隊了，你還搞不搞暴力？如果你說否，那你就否定了原先的說法，因為你不搞暴力並不是由於你搞不了。如果你說是，那麼你就不是「非暴力主義者」了。」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按照過去的經驗，在中國，以暴制暴，除了帶來更多的仇恨和苦難，並不能達到富強中國的目的。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對過去來說，這個觀察是否正確，對將來，這個觀察是否有效。問題在於，出於這個動機不使用暴力是否是「非暴力」？假如只要再使用最後一次暴力，就可以消滅一切敵手，一勞永逸地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使不使用暴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不是「非暴力」，至多是一種偽裝的「以革命的兩手對付革命的兩手」式的「非暴力」。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就否定了原先的說法。因為之所以不使用暴力，並不是由於暴力不能達到目的，而是由於其他的原因。我希望，達賴喇嘛不會是由於看到西藏很難用其他手段達到獨立而主張非暴力的。

上述過程揭示了「非暴力」的一個重要的性質：

如果實行「非暴力」只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這種目的通過其他手段也同樣可以達到的話，這種所謂的「非暴力」就一定會陷入自相矛盾的二難境地。非暴力主義者必須在任何情況下拒絕使用暴力。

另外一種更爲使人費解的說法是：非暴力是因爲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在民主這個大潮流中，再要提倡暴力是不合時宜的。我要坦白地說，我經常被這類出現於各種報刊、討論會、極難理解其確切意義的句子所迷惑。我想這句話想表示的大概是這個意思，即按照民主的原

則，不能使用暴力。如果這裡的民主指的是一種制度，我當然同意這一點。問題是，中國現存的制度並不是民主制度。如果這裡的民主指的是民主政體及政府的基礎和限制的理論，那麼，就我所知，所有的這種「民主理論」都認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人民有權利進行暴力反抗。中國傳統的「泛道德化」的傾向已經使「民主」這個世俗性的東西極其神聖化了。在這點上，休漠不愧爲一個實在坦率的人，對他來說，民主制度的設立與維繫之所以必要，是因爲我們人類都不是君子。所以他們對自己的利益竭力爭取，在遭受壓迫時要求反抗。如果有人認爲，之所以要堅持「非暴力」，是因爲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文明的中國人不應該再使用暴力來達到目的的話，那就等於取消了中國人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很明顯，這也同時否定了「非暴力」的存在。總之，這種說法不但沒有提供一個所謂的超越原則，反而把「非暴力」的根據，即權利的觀念也取消了。

還有一種解釋來「非暴力」的基礎的說法是：堅持非暴力就可以喚起那些有良心的，尤其是具有暴力後盾的人的正義感。我把這種說法叫做「苦肉計式的非暴力主義者」。「苦肉計式的非暴力主義者」如果發現人們雖然都很有良心，但卻沒有暴力後盾時，他就會消聲匿跡。直截了當地說，沒有那些有良心的，有暴力後盾的人最後出來打抱不平，非暴力就沒有意義。

這一次的問題是：「苦肉計式的非暴力主義」是根據什麼反對別人使用暴力？唯一的回答是：因爲別人有使用暴力的權利或理由。但是，一個不反對在有權利或理由的情況下使用暴力的人，就不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在自已和別人都有權利或理由使用暴力的情況下，

自己不使用暴力，但却反對別人使用暴力，甚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別人的暴力之上，這種「非暴力主義者」，不但是自相矛盾，稱之爲「膽小鬼」是絕不爲過的。

由此，我們得出了關於「非暴力」的又一個重要的性質：

非暴力主義者必須反對任何人使用暴力，不管是自身還是別人。非暴力主義不能是一種策略或權宜之計。

甘地以宣示式的語言表達了同一個意思：「當非暴力作爲生命之法而被接受後，它就必須遍及整個存在，而不能僅僅運用於幾個孤立的行爲。」（見上書P·四二〇）

非暴力的最高原則是犧牲

但是，「苦肉計式的非暴力主義」却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非暴力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非暴力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使用暴力，遇到一個死不悔改的無賴怎麼辦？一個獨夫豈不即可雄霸天下？對於這個問題，甘地的回答非常簡單：信仰 SATYAGRAHA 有無限力量的非暴力主義者也必定由此相信，人類中不存在這樣的無賴。「沒有人會邪惡到不可拯救的地步……」每個 SATYAGRAHI（此處可譯爲非暴力主義者——引者）都有這樣一條信念：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墮落到不能爲愛所皈依的程度。」（見上書P·四二一）有的人認爲，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之所以成功，是因爲他的對手是英國人。這確是對英國人的一種恭維。但他對中國人，却不願作如是之想。非暴力最終只能通過對人類心靈中善的訴求而起作用。非暴力主義者必須相信，即使是最邪惡愚昧的人，在堅持不懈的非暴力抗爭下

，也最終會在心靈中體認到，這個世界上所存在的某些制度，規章和行為方式是同人的本性中善的本質格格不入的。非暴力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改變某一特定的東西，而是提升人的價值。只要這一點做到了，其他東西的改善也就成爲自然而然的結果。但是，在這個世界上，非暴力又只能通過對某一具體的世俗目標的執着追求而去震撼人的靈魂。對甘地來說，印度獨立並不是他的最終目的。僅僅政治上的獨立並不會爲印度帶來真正的福祉。但是，英國對印度的奴役這個事實却同時降低了印度和英國人的尊嚴。在印度的英國人失去了個性，而英國人治下的印度人則失去了勇氣。所以，必須通過以非暴力追求印度獨立的方式，來提升兩個種族，因而是全人類的價值。「歸根結底，我認爲只有道德價值才至關重要。其他一切都是垃圾。」（見上書P·四二六）

上一段的論述蘊含了使非暴力起作用的三個條件。

第一、非暴力主義者必須相信，你的對手最終必定會體認到，你所反對拒絕的東西是違背人之本性的。換句話說，你必須相信，使你的行爲成爲非暴力的那些權利或理由將最終獲得對手的承認。如果你追求的目標是侵佔別人的房屋，那你不但不能使對方相信，你所做的任何事都稱不上非暴力。非暴力的這個基礎是不可能從理論上得到證明的。它的基礎是一種信仰。

第二、要使對手相信你具有這樣的信念，你必須在行動上表現出來。非暴力並不是對罪惡和暴力的忍受和退却。在你具有權利或理由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比如當你處在一個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時候，默默地忍受並不能把你同一個屈服者區別開來。一個被迫服役，但爲了避

免暴力，而在戰鬥中不朝目標開砲的士兵，在甘地看來，並不能算作一個非暴力主義者。按照他的嚴格標準，這個士兵犯有欺騙和膽怯的雙重過失。膽怯在於他爲了逃避懲罰而服了役，欺騙在於他既然作爲一個士兵，又沒有盡職。只有在不使用暴力的情況下，堅拒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合作，不讓其達到目的，非暴力才能夠顯現出來。只有在劇烈的，面對面的衝突中，尤其是在以生命作爲代價的衝突中，你的信念才會真正的表現出來，你作爲一個非暴力主義者，才會得到最終的承認。由此，非暴力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真正的戰鬥。我會設想過，如果所有的北京市民選擇這樣一種非暴力主義的方式來拒絕同現今的非法政府合作：他們全體和平平地靜坐在家，但在任何暴力面前拒絕出走。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

第三，一個給自己的非暴力設定限制，也就是說，一個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就會放棄非暴力，或者退却的人，表明他對非暴力的超越原則並不真正的信仰。在犧牲這一關頭之前的一切非暴力行爲，將由此毫無作用，變成一種真正的浪費。這種所謂的「非暴力」將使鬭爭的雙方更爲墮落。對暴力者來說，他只要把暴力升級到威脅生命的程度，一切抵抗就會瓦解。一個真正的非暴力主義者必須隨時準備犧牲。「非暴力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呼喊的這一誓言，提升了所有中國人的價值。手無寸鐵，兀自阻擋坦克的那位中國青年讓全世界看到了這一原則的活生生的體現。在彈雨中，在憤怒群眾的包圍中，冒着生命危險救護屠殺自己的士兵的那些中國學生，實踐了這一原則。在人類歷史上，這類事件並不常見。

我不敢妄稱非暴力主義者

對人類來說，非暴力是一種太高的要求。非暴力要求堅定如山的信念，要求無邊無盡的寬恕，要求視死如歸的勇氣。最後，它要求犧牲。雖然我崇敬歷史上的非暴力主義者，雖然我崇敬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年輕的學生，雖然在一個基督徒說解決中國苦難的唯一途徑在於所有中國人的祈禱和寬恕後，我的心靈爲之震撼，並開始思考寬恕的意義。但是，捫心自問，我知道，我還是太注重追求自己的權利，我對人類還沒有建立真正的信心，我還害怕死亡。如果眞的有人能夠說服我，在現今的中國，經過妥協，中國將和平地轉變成一個較爲理想的社會，我將樂意聽從。但是，我絕不會由此自稱爲非暴力主義者。我絕不會說自己堅持了非暴力的原則。對我來說，一致性是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人類的價值標準曾經有過多次的變化，它也正在變化的過程當中。但這個標準却從來沒有被人類拋棄過。這不會是沒有道理的。對那些不能成爲非暴力主義者的人來說，不自稱爲非暴力主義者，是對那些眞正的人來說，不自稱爲非暴力主義者表示尊敬的唯一辦法。對那些還在創立「非暴力主義」一詞的用法的人，我的唯一請求是：把這個稱號留給他們。因爲在理想語言中，一個詞只指稱一個特定的對象。





劉剛被捕時的情形。

劉剛與北大民主沙龍

黃村

六月十九日傍晚，在中共所列的二十一名學運骨幹通緝名單中排行第三的劉剛，在河北保定不幸被捕了。惡訊傳來，令人悲憤不已。癡視着報刊上關於劉剛被捕的照片，思緒萬千，追憶起與他交往的日日月月，人人事事。

劉剛一九六一年生於吉林省遼源市。在一九八零至八四年就讀於中國科技大學（合肥）時追隨方勵之先生（時任該校副校長），積極投身學運，是方最親近的學生之一。一九八四年秋劉剛考為北京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專業研究生，導師正是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在一九八六年底全國性的學潮中，劉剛曾作為北京地區的組織者之一而遭公安局拘禁。

見義勇為救同學

我就是在那時聞知其一些事情的，如在學運中北大某學生因在校外與外國記者接觸，被兩位便衣特務跟踪，一直追到宿舍，他們在檢查了該學生的學生證後便欲強行把他帶走。此時劉剛正好來此宿舍，見狀立刻阻止，並召來其他學生，劉義正詞嚴地要這兩人出示證件，並警告他們以後不得隨便闖入學生宿舍。兩位色厲內荏的便衣見勢不妙，慌忙摸出證件，狼狽而去。事後劉剛立即要求北大校方公安局提出抗議。

協助導師李淑嫻競選

在一九八七年北京海淀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直接選舉中，李淑嫻出馬競選北大選區的代表，而劉剛是她最得力的競選助手，為她的當選立下了汗馬功勞。李的競選引起北大當局的恐慌，因而受到種種無理阻撓和刁難。但劉剛等同學據理與校方展開一系列抗爭。當時校方當局對劉剛軟硬兼施，並以畢業分配工作的去向問題進行威脅（劉將於該年七月畢業），對此劉剛的回答是：「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圖上，你手指任何一點，我都可以去，都活得下來。」表現出一個革命志士豪邁、樂觀的氣概。李當選了。

自由化講座事件

劉剛畢業時沒被允許留在北京，一九八七年七月他來到浙江省寧波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公司工作，當時我正在寧波探親，與他結識了。劉給我的初次印象是，目光剛毅冷峻，談吐灑脫，行止果敢而不拘小節（中共通緝令中所描寫的「絡腮鬚」當然也是他最明顯的特徵之一）。

我於同年八月回到北京後一直與他通信，但十月初開始却失去了他的音訊，他的單位也找不到其踪影。寧波市十月發生了所謂「自由化講座事件」，十多位進步青年因舉辦「現代化與人系列講座」而遭公安局傳訊，被稱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事件，許多人的家被抄（我家被抄過兩次，一些提到劉剛的信件也被兩位英勇的公安人員繳獲）禍及數十人，為首份子分別被二至六年徒刑。我當時甚為劉剛的處境擔心（雖然他並沒有參加過上述事件），特別是得知兩名公安人員十月中旬去他單位搜查之後（對於這次搜查的原因，劉和我一直都不甚知道。當然，他現在肯定明白了）。

十一月的某天，我在北京的單位裡接到了劉剛從市內打來的電話，頗覺神秘。我們當晚便見面了。他說他剛從杭州抵達北京，尚無落脚處，想先在我處暫住幾天。原來，他於九月底從單位「失蹤」（其實他事前向單位提出辭職，只是沒被批准）後，藏身於附近的幾家鄉村企業，進行一系列的社會調查，並寫成精辟的研究報告。劉剛在我處住過幾天後，方勵之（當時已在北京天文台工作）為他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所找到了一份臨時性的工作，從此他在北京進行了「職業性」的民主活動。之所以是「職業性」的，是因為他在那家研究所工作只是想解決食宿問題，並無多少工作

可做，因此可以用全部精力投入民運（或許方勵之的用意也在於此）。

天安門靜坐爭教育經費

劉剛在北京進行了許多活動，例如曾引起海內外廣泛報導的去年四月十日天安門廣場靜坐事件，就主要是由他發起的。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內正在召開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靜坐所舉的口號有「增加教育經費」、「改善師生待遇」等。不過，我認為劉剛最引起反響的業績之一就是組織被西方報導為「民主沙龍」的活動。其實，劉當時自己取的名是「草坪講座」，地點是北大勺園五號樓對面塞萬提斯塑像下的一塊草坪，時間是每週三晚上七點以後。劉剛旨在使之成爲一塊固定的、公開的、自發的言論園地，他希望聲勢擴大後，學生和其他人每週三晚能自發地來此草坪聚會，展開辯論（這點的確成功了）。

民主沙龍數次活動

當時協助劉剛的有王丹、張××（北大）、徐×（北京氣象學院）、王××（北大）等人。劉剛有這樣幾個想法：一、最終目的是形成一個自發性的定期沙龍，所以他們幾個人只能組織開始的幾次，待自發形成後他們即停止一切事前安排；二、即使是開始的幾次，也不能讓別人看出有任何「組織」或「安排」的跡象；三、開始時爲了吸引盡量多的人來參加，宜邀請著名人士來作主講，以引起大家的討論；四、爲了盡量減少組織的跡象，組織者所做的事只限於事前約定，迎接主講人，一旦主講人到場，則由其自己開場，在場的人絲毫察覺

不出有任何「會議主持人」一類角色的存在（也正是爲了減少「組織」的跡象，劉剛特別反對使用話筒或其他設施，並主張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在室外，以免引起校方疑心）。

連樹上都坐滿了聽衆

五月四日是第一次（我記不清那天是否真是週三，不過以後幾次都是），主講人是方勵之夫婦，聽衆超過七百人，似乎圍了無數圈，



方勵之在草坪沙龍上講演

許多人都爬在樹上。正是在那次演講中，方勵之他那引起爭議的觀點——「就像不存在於中國的物理學和西方方式的物理學這樣的區別——一樣，現代化就是現代化，根本不存有所謂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凡是現代化，其實質都一樣，如政治方面都必須包括民主、自由

和人權」。演講後，要求方夫婦簽名的人們排成長龍，有些學生讓方在「鄧小平傳」上留名。

許良英要著民主論

第二次的主講人是許良英，那天由王××和我去許宅接請。許良英是今年初「四十二位科學家公開信」的發起人。他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和學運領袖，又是著名科學家，但自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後被遣回原籍浙江當了整整二十年的農民。他們代表許多曾爲中共事業奮鬥而最後又幻滅的老一輩科學家。他那天主要講自己在二十年的農民生涯中如何日夜研究馬列思想全集和愛因斯坦思想，如何萌發過在農村搞武裝暴動的念頭，以及正在構思的著作「民主論」（按其自己的話來說，是想和嚴家其的「君主論」配對）。

吳祖光嘲弄文痞

第三次的主講人是吳祖光，他當時剛被「勸退」出黨，本來也請了吳的妻子，著名平劇演員新鳳霞（曾塑造了劉巧兒這一家喻戶曉的生動形象）。但當劉剛和我那天進吳宅接請時，却看到新鳳霞由於文革挨整時被打殘，已成了終生殘廢，無法獨立行走，她指着腿對我們說，「阿姨這都是被「四人幫」害的」。其語悲然，聽罷催人淚下，一個廣受人民喜愛的演員的最佳年月就這樣被無情地毀滅了。吳祖光那天主要講他受迫害的經歷，還生動地詳細描述了胡喬木親自登門勸他退黨的情景，把胡這一文痞的醜惡嘴臉刻畫得入骨三分，引起陣陣哄笑。吳在總結他與黨的曲曲折折的關係時說

「我從來沒有變，而黨老變，當它變得和我一致時，它就把我吸收進去，而當它變得和我不一致時就把我轟將出來，而我從沒變過」。

把人變垃圾的制度

第四次主講人是著名詩人，「詩刊」前總編邵燕祥，他談到正在構思自傳，題為「人與垃圾」，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訴說：「這個制度怎樣使人變成垃圾」。

第五次主講人是包柏漪。本來只請她一人，但她還是叫來了她的丈夫——美國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其實，那天美國大使館出動了約十五人，分乘數輛汽車浩浩蕩蕩趕到草坪。大使夫婦就為這種問題與大家展開熱烈辯論。

包柏漪事件和柴慶豐事件

「草坪講座」就這樣順利地進行着，場面越來越大，發展到幾乎每晚都有許多人自發地到那塊草坪去辯論時政，許多外國人和港台人士也頗活躍，星期三與平時相比似乎只是多了一個主講人。校方對此自然難以容忍，除了每次都派人嚴密監視外，一直苦於找不到藉口下手。但藉口還是終於來了。本來，下一次該由王蒙來主講（包柏漪曾說願去請王），但就在包氏夫婦演講後不久，發生了所謂「柴慶豐事件」，即北大一名叫柴慶豐的學生在校外被流氓殺害，而校方或公安局對此事追究不力，引起學生強烈不滿，紛紛上街遊行示威，不久遊行性質即變為要求民主自由的大規模學運，北大當局和公安局立即進行鎮壓，並趁機指出此番「鬧事」是由「草坪講座」煽動的，於是宣

佈其非法。「草坪講座」暫告終止。

此後劉剛等人又在北大新華書店前的三角地帶組織數次晚間集會，但終遭校方鎮壓下去，劉剛一度被禁止進入北大。公安部還把劉的父親（吉林省遼源市公安局幹部）召來北京說服其子，而劉此時已悄然遠赴安徽農村搞社會調查去了（約七月中旬）。八月初劉回到北京，幾經奔波，竟成功地恢復了「民主沙龍」（即「草坪講座」）。不過地點放在圓明園東門外的水泥地上，恢復後的首次主講人是李淑嫻。但此後並無其他主講人，只是學生和其他人自發地去那裡交流思想（後來學生佔領天安門期間，骨幹份子也常到那裡開會）。

迎民運高潮放棄出國

我最後一次見到劉剛是今年三月底他約我一起去許良英家，沒過幾天我就來澳了。那天他說正在和一些學生領袖一起組織「五·四」大遊行，準備在今年掀起民運新高潮。我問起他的留學計劃，他說已在方勵之的幫助下基本上聯繫妥了紐約州立大學，但目前民運高潮即將湧現，顧不上這些了。來澳後很難得到他的消息。五月時得知他是「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骨幹之一。六月二十日（北京）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他前一天被捕的情景。

他是怎樣離開天安門的？為什麼想到要去青海（通過保定）藏身？還有，他是否都收到了我五月給他寄出的關於澳洲學運的資料？作為他的朋友，我如此急切地想知道這些。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只能在我們下一次見面時才能述說了，我堅信還存在着這「下次」；或許，還像以前那樣，一起走回那塊自由的草坪：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總 _____ 期）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歐洲地區：PARISER ST 52 5300 BONN W. GERMANY

港澳及世界其它地區：香港 九龍 廣東道 501號 二樓 4室

訂費（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港、澳地區）
機關：60 美元 200 港幣
普通訂戶：28 美元 96 港幣
學生訂戶：24 美元 84 港幣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航空
加拿大 US\$15
中美洲 US\$25
歐洲、南美洲 US\$35
亞洲、澳洲 US\$45

大陸留學生法案在漩渦中

馬怡陽

避難美國有人高興有人愁

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稍事觀察，你就會發現，美國接納世界各國難民之政策，是極端不平等的。蘇俄猶太人進入美國最方便，宛如入無人之境。十月初猶太人新年之前，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猶太新移民進入美國。在肯尼迪機場，你經常可以見到猶太紐約客在那裡接機，手中舉着用俄語書寫的標語：「猶太人的上帝住在美國。」

然而在邁阿密，你會發現港口附近一座座網球場般用鐵絲圍著的集中營，裡面圍著從海地逃來美國的海地黑人，他們雖然說英語，却大都被警察無情地抓獲，然後遣返。

美國的移民政策每年都在不斷地檢討中，政治因素和遊說活動不斷地使天平擺來擺去。美國對各國的移民配額像股市一樣時高時低，影響著世界每個角落的一些人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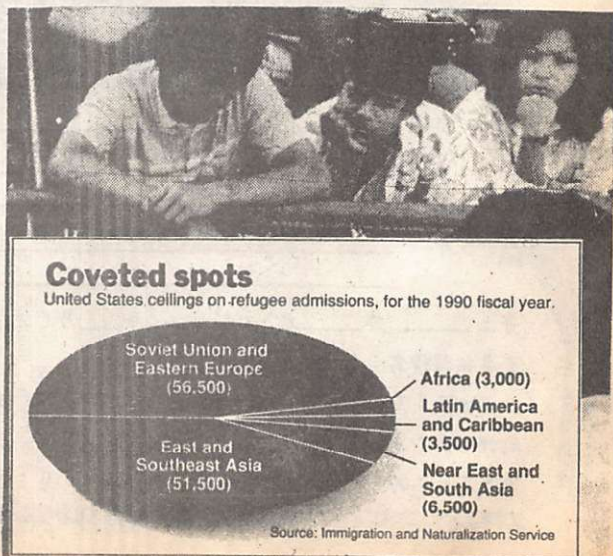
布什總統時下正在安排着一項計劃：明年有多少移民被准許進入美國，他們來自那些國家。這的確不是一項輕鬆的工作。據移民局稱，每接收一個難民，美國政府便將花掉七千元美金。華盛頓抱怨這是「憐憫的煩瑣」。

政治是中軸，人道是潤滑油

其實，美國的移民政策越來越受到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壓力團體的「利益性」左右，而非基於人道和同情心那麼簡單。有限的移民配額和資金，正在受到有目的地、強烈的競爭。一九八〇年國會修改了美國的難民政策，突出強調人道的考慮。該法案稱，難民名額只是給那些一旦被遣返時，便會處在絕望的需要中和明確的迫害恐怖中的人們。但事實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在下一個財政年度中即將進入美國的十二萬五千難民中，只有幾千人是靠着人道的理由將被批准入境。其餘的絕大部份，如五萬名蘇聯人獲得配額，基本上是靠著外交政策方面考慮的緣故。

這方面有什麼規律可循呢？移民政策研究學者史瓦茨認為：「一般而言，美國的難民配額和避護，較易給予那些從敵對國家逃出來的人，而較難給予那些從與美國友好的國家逃出來的人。」這一語中的的見解換句話便是，政治與外交的利益，在移民政策中，遠遠大於人道的考慮。

這種差別對於任何試圖遊說美國國會的利益團體，是十分重要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六四」之後，對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在人道方面佔盡優勢，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並沒有足夠的力量，足以影響到美國與北京的相互利益關係。在人道上，美國國會及公眾絕對將同情放在大陸學生和民間方面，但這與美國的國家利



益完全是兩碼事。

據傳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六四期間就大相信中國大陸可能出現戲劇性的政局變化，他們甚至因搞不清楚當時仍然是鄧小平還是別人在掌權，因而遭到白宮的責備。基本上，美國不相信共產黨國家的政權可以輕易被推翻，自然包括中國。基於此種事實，美國在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和道義遣責上，都顯得軟弱無力。美國所能採取的一切行動，都受到不與中共政權徹底決裂之界限所有。

中美關係超出人道考慮

因此，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遊說工作，就顯得十分乏力。因為這種遊說活動只有道義的依托而缺少政治的實力為後盾。目前形成於海外的所有中國人團體，基本上都不能與中共放

在一個天秤上被考慮。「六·四」後由國內逃亡學生領袖、知識份子以至改革派官僚所組成的「民主中國陣綫」，根本沒有獲得白宮或國會的重視。「民陣」首腦人士在美國曾經同官方聯絡，希望與美方溝通，希望取得某種名義上的承認和財力上的支持。但並沒有獲得美國方面的任何答覆。因此，「民陣」的總部只好不大情願地設在了巴黎。在美國國土上，赫赫有名的流亡政治家已多如牛毛。

人們說美國民族是天真的民族，但美國政府從來就沒有天真過，它是以實力玩政治，搞外交，從而他也習慣於崇尚實力。法國畢竟是一個人道主義傳統最悠久的國家，不怕中共方面的任何壓力。

美國對於世界各國的難民，歷來存在所謂雙重標準。在不同的標準下，美國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難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採取着最寬鬆的政策。如果說政治的重要性和外交壓力，蘇聯顯然遠勝於中國。結果正基於此，美國將蘇聯列為能威脅美國生存的敵對國家，無論如何搞東西方緩和，這個事實短期內是不會改變的。也正基於此，中國被列為可以牽制蘇俄的盟邦式國家，無論北京當局如何咒罵美國，這種戰略上的政治關係都是不會被改變的。

這也正是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卸任之後十數年間，仍然能夠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呼風喚雨的緣故。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的理論確立，基辛格是始作俑者。在「六·四」之後，基辛格發表一系列袒護北京當權者的言論，正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理論依據的。

院外游說活動扭轉乾坤

除了外交政治的主要考慮外，各國在美國的院外遊說活動，是影響移民配額的重大因素。蘇聯猶太人之所以在移民美國方面獨佔鰲頭，與美國猶太人社區強大的政治實力是分不開的。加上以色列的政治影響，蘇聯猶太人在美國的「移民天花板」正在逐年增高。

在中南美國家，與尼加拉瓜反對派遊擊隊有關的難民是最優先的一類，而美國友邦薩爾瓦多的避難申請，百分之九十七遭到拒絕。儘管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十年來有六萬平民在那個國家裡被殺害。由此顯見美國的人道是有偏見的，不公平的。而南美國家難民受到最冷遇的是海地，美國海岸警察通常盡數將滯留的船民遣回，並堅稱海地人來美不過是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

東南亞國家在美國的院外活動僅次於蘇聯猶太人。他們的活動不是自己做的，而是由美國最強大的退伍軍人團體，協助的主要國家是印度支那三國，從七五年迄今已有九十萬人定居美國，形成強大的民意基礎。一旦東南亞的難民配額受到威脅，美國的東南亞社區就會產生成千上萬的請願書寄往白宮和國會。由於布什總統在去年的選舉中得到印度支那社區的全力支持，明年給予這一地區的難民配額已增加致五萬六千五百人。

大陸學生的游說主力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台灣本省人和黨外在美國的院外活動亦十分成功，「保釣」時期台灣留學生也曾進行過居留美國的活動，但據有關人士稱，他們的活動，與今日大陸留美學生的活動規模相比，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今年在美國移民院外活動中，出現了一只

強大的生力軍，那就是「六·四」以後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國會遊說活動。中國學生的競爭力是十分強大的。他們年輕，教育優良，是美國歷史上最高檔次的移民群體。據美國保守主義的雜誌「新聞週刊」（八九年十月九日）透露，美國國會正在考慮調整對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的移民配額，以增加對中國學生的配額。東歐、南美、東南亞、中國各院外活動的競爭，已使得美國政府疲於應付。布什總統已經向當局提出下一年度設立三萬額外的「特殊移民」。而無論那一方的配額的增加，都會引起其他方面的不平之鳴。

「六·四」後大陸留學生法案接二連三

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移民院外活動，可以說始自八七年「中國民聯」營救在上海被捕的成員楊巍。「中國民聯」通過北卡羅萊那參議員赫爾姆斯等人提案，促動美國政府同中國政府進行營救交涉。美方藉楊巍美國留學生的身份，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此次院外運作十分成功。

「六·四」之後，未經中國留美學生的努力，美國國會移民小組當即主動在一項臨時法案上，使持「一簽證」的大陸留學生自動延期一年。美國新聞總署於七月二十日宣佈，凡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前入境的中國大陸「一簽證」人士，若他們的簽證在九〇年六月六日前到期，均可獲得延期一年。受影響的中國學生可以透過移民局進行申請。

此法例將會使四萬多大陸留學生中的相當部份獲益。根據移民局法律顧問維丘透露，中國大陸留學生總數的正式統計為四萬零二百多人。其中，三萬二千名是「一簽證」持有者。

，佔百分之八十，八千名持F簽證，二百多名持M簽證。

此外，加州舊金山民主黨眾議員波洛西提出議案，要求凡持J—一簽證中國學生，均免除返回原居地兩年始得轉換其他非移民或移民簽證。波氏提案另外給中國大陸學生學者提供保護的部份，在眾院討論時，納入了莫里森提案。

由眾院移民小組主席，康耐狄克州民主黨眾議員提出的議案，是一項內函廣泛的提案，應用範圍擴展到了中國以外有類似情況的國家。該案要求司法部長對戰爭、自然災害等出現特殊情況的國家，可准許該國國民在美國暫時居留及發出工作許可等數項內容。對中國大陸學生學者部份，該案特別提到要對八九年七月一日前入境者臨時保護身份不少於三年（至九二年）。

波洛西案七月三十一日在眾院獲得通過。但到了八月四日，由於科羅拉多州共和黨參議員阿爾斯莊要求在波案上附加給予大陸人士違反一胎政策者給予保護，結果受到司法委員會及移民小組的反對，而使該案不能在國會休會前通過，送交總統簽署生效。

策略失當盡數擱淺

但到了九月五日國會復會之後，有關大陸留學生的所有提案，已經不再被提上日程，其原因有三：（一）北京政府緩過氣來，開始對美國施加壓力，外交部長錢其琛訪美發表一系列中美關係緊張，咎由在美方的談話。（二）國會面臨十一月份的大選，多數議員已經把注意力轉到大選上去，而中國留學生不是選民群體，自然不會受到青睞。（三）天安門事件已過去三個月，

事件的敏感性已開始淡化，熱度一過，打鐵已無機會。

儘管尚有許多同情中國留學生的國會議員諸如波洛西、阿爾斯莊、戈登、賽蒙、赫爾姆斯等仍未放棄努力，但通過「免返兩年」提案的大勢已去，他們也無能為力抵當頹勢。

至此，基本的結局已經顯而易見。整個過程中，中國留學生的院外活動十分廣泛，幾乎每個州都有留學生聯絡當地的國會議員要求支持，但結局却極不理想。人們不禁感到，中國留學生的院外遊說活動，好像是做了一場戲。因為遊說活動不同於遊行活動，前者的成敗以法律上的結果為依歸，後者的成果以其本身和新聞效果為依歸。一般的民主運動只要召集了群眾，走上了街頭，引來了記者，登上的報紙，也就造成了影響，達到了預期的結果。但國會遊說活動儘管能引來議員，提上了議壇，登上了報紙，但只要沒有通過，等於沒有影響，而且還會造成士氣頹挫的負面效果。

分析這次留學生爭取自身權利的活動之失利，概述之有如下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同情大陸學生，美國國會議員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強大政治衝擊波面前，連續提出範圍不斷升級的提案，至使原本有希望的「波洛西」簽證案中途受挫。許多律師業者認為，如果沒有阿爾斯莊議員過份熱心，在波洛西案後面附加提案，波案極大可能在九月之前被敲定。

游說失利原因分析

另一方面，大陸留學生在院外遊說活動中雖然來勢威猛，却缺乏經驗而顯示出多方面的失策。

首先，大陸留學生對美國的移民政策的基

本原理缺少充分的認識。如前述，美國的移民政策原則上是基於人道、人權的意識形態立場，但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仍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政治外交的通盤考量以及地緣政治等。中國留學生在遊說活動中，基本上沒有在這方面做策略的考慮和戰術的施用，而僅僅從人道方面情緒方面進行訴求。所以在根本上，在美國聯華抗俄的基本國策下，所有努力都不會有根本性突破。

第二，參與遊說活動的各方面的留學生骨幹人士，均把遊說活動看得過於簡單，或者根本是積累個人信譽的政治熱身活動，缺少嚴肅的態度。在今年七月底芝加哥全美學聯的大會上，不少留學生在競選時將自己的遊說工作不同程度的誇大渲染，在整個留學生心中造成形勢一片大好的盲目樂觀情緒，致使整個遊說工作一下子疲軟下來，遭遇障礙時沒有一絲的後勁。

第三，大陸留學生的院外活動在整個戰略考量上，缺少可行性分析，如除上述各項提案國會的議案外，某些大陸遊說骨幹甚至提出要免除對大陸學生各種優先的配額，主要是第三優先的配額。這猶如痴人說夢，根本不可能實現。就美國國會以往的法案可知，凡是對一項事件提出不加區別的一般性法案，都極少有機會獲得通過。例如美國在「六·四」之後自動給予大陸J簽證延期一年的優惠，便在時間上、類別上附加了種種限制，結果在三萬多持J簽證大陸學生中，只有兩千多人可以受惠。

第四，中國大陸留學生遊說活動此次異軍突起，聲勢浩大，但實際上完全沒有起到結構性作用，而是人人各自為政，各顯神通，甚至互相排擠，爭搶風頭，如果大家溝通一下，把各自的關係協調運用，那力量也許要比現在強

大得多。而其他族裔的移民遊說活動，都是集中人力、財力精誠合作，鮮少像大陸學生這樣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這方面有關人士和團體應深刻反省，以期在日後的類似活動中加以改善。

第五，在遊說方法上，大陸學生骨幹不大善長運用各種在美國極其有效的民意壓力。例如越南難民在本身配額問題上如遇障礙，當即便會發動社區，大搞「群眾來信」，施以強大的民意壓力。中國大陸學生從八七年胡耀邦事件後，更成功地搞過多次千人以上的簽名活動，向中共政府施加壓力，中共政府當然頑愚不應。但美國政府則是完全不同的政府，如果大陸留學生在「紐約時報」或者「華盛頓郵報」上面，發表千人簽名信向美國政府施壓，筆者敢肯定地說，將會收到巨大的效果，促使國會和白宮重新考慮對中國留學生的移民政策。

第六，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遊說活動，基本上與此間的華僑社會形成脫節關係，未能有意識地調動一百三十萬華僑的社會力量，這是極為可悲的疏忽。如前述，美國國會議員由於忙於十一月的大選，對並非選民力量的大陸留學生群體，自然不會給予應有的重視。但如果大陸學生的遊說活動運用了一百三十萬華僑的選民力量，那情勢將大不一樣。再者，議員競選需要大筆的經費，而留學生又是一群經濟上尚無根基的群體，自然在議員選舉中得不到重視，也無力支持同情自己的議員當選。但如運用了華僑的財力，支持同情我們的議員當選，那今後再有遊說活動，將會有自己的議員出來說話，情況就會比現實好得多。

政治庇護大有斬獲

至此，我們了解到，大陸留學生的遊說活動，在「六·四」後的大好形勢下，異軍突起，在美國院外活動的世界裡初露鋒芒，雖然問題尚多，但至少佔了一席之地。

然而，中國留學生在另一個相關領域，却無師自通地大有斬獲，那就是政治庇護。自「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留學生大批申請政治庇護，在觀念和膽量上都徹底改變了對政治庇護的態度。雖然在尋求美國國務院放寬限制方面，從未有進行過有組織地遊說活動，但却是振展最成功的領域，在美國的律師裡，也形成了一批政治庇護的能手。如洛杉磯名律師姚樂斯·哈潑、紐約律師包路曉·德邁斯特等。

哈潑所經手的最著名案子，是中國大陸留學生李永益案。李氏要求避護的理由是違背了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本來此案已被移民局否決，但哈氏通過李永益天主教徒的身份，將案子轉化為宗教迫害的性質（天主教不許墮胎）。而使移民局無力拒絕，因為墮胎問題是美國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拒絕了就會犯眾怒。從事中國學生避護案件的移民律師，先後開了許多特殊案例的先河，紐約律師德邁斯特甚至在國務院駁回案子後反控國務院，終於取勝。中國大陸學生辦政治避護的數量，目前尚無法統計，但一般估計在三千人左右。美國對政治避護的批准，沒有固定的配額限制，但綠卡的發放數目每年限制在五千人上下。其中，蘇聯、東歐和南美佔去百分之九十強。所以許多大陸政治避護申請人獲得批准兩年尚沒有拿到綠卡。雖然他們的身份狀態已經是永久居留並可以出國過境自由往返。

從數字分析看居留前景

從一九七五年至今，已有一百三十萬人以難民身份進入美國（國務院公佈）。其中，八十五萬七千來自印度支那。九〇年布什總統公佈的難民收容數字是十二萬五千人，其中五萬人配給蘇聯，六千五百人配給東歐，五萬一千五百人配給東南亞國家，三千五百人配給拉丁美洲，三千人配給非洲。正數字與正常的移民配額無任何關聯。

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六四之後，幾乎百分之百地有意向留美不歸。但是究竟那條路最容易走通呢？

在臨時法案方面，通過前述分析前途渺茫。即使免除回國兩年的波洛西案獲得通過，三萬二千持J-1簽證的大陸留學生仍然難於解決身份問題。因為他們只能走第三優先的路，而第三優先每年只有一千人。假設每個人都有能力辦成第三優先，三萬人要卅年才能輪滿配額，而從今日美國面臨世界性壓力的移民政策而言，這項配額只會從嚴而不會放寬或免除。在難民政策方面，除非某一天中國大陸爆發內戰，或中美蘇三角關係發生逆轉，否則我們沒有一線希望看到蘇聯、東歐或印度支那的情況發生在大陸留學生身上，而東南亞國家五萬多移民配額，尚不夠滿足院外活動強大的越南難民的要求。

目前，唯有個案處理的政治避護案件有望獲得聚少成多的成果，而且已經在國務院和法院積累了充分的優秀判例。在美國東西各主要城市，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民間壓力團體和道義性協會。這方面的唯一缺憾是尚未形成一個泛美性的遊說力量。如果大陸留學生、各種民間團體以及美國律師界三方能夠協同行動，將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使大陸留學生居留美國的機會更充實，更廣闊。

廣州商業城：股份公司的悲劇

楊天樹

城市改革放衛星

一九八四年十月，全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剛一拉開，廣州市就放了一顆耀眼的衛星。

現在已經無從考察，那個氣壯山河的商業城計劃最先出自哪個天才的大腦，但是它的誕生，却無可爭議地成為廣州市街頭巷尾最熱門的話題。北京路，是廣州市最繁華的商業區，在這裡將平地豎起一個高層大廈群。北京路和西湖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將現有的西湖商場（一層樓）太白商場（一層）禺山市場（一層）以及美華、南粵（各兩層）拆除，改建為三幢互相連通，凌空橫越北京路和西湖路的摩天大樓。其中西湖大廈五十六層，太白大廈和禺山大廈各三十層。同時，北京路上的青年文化宮也要改建為二十八層的青年大廈，郊區公安分局折建成二十九層的振興酒店，北京路和中山五路交界的百貨公司將改建成二十二層的商业大廈。一時間，全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路地段將成爲一片大工地，高樓群起，欲與天公試比高。

這個商業城的藍圖號稱：建立大空間集約性商業中心，集商、貿、旅業、飲食、服務、娛樂於一體，集國營、集體、個體商業爲一體。這真是一場空前規模的空間立體大戰。輿論



界被轟動了，報刊雜誌上充滿了溢美之詞：亞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國城建史上的創舉……

更令人振奮的是，這個商業城的計劃將在國家不出一分錢的情況下由民間集股建成。如果說「世界第二」「亞洲第一」之類的評價僅僅是未見過紐約曼哈頓、東京銀座、香港尖沙咀的廣州人一種自我陶醉的話，那麼這一民間集股建城的創舉，無論如何也堪稱全國第一了。

十月四日，廣州商業城股份公司宣佈成立。接着即向社會發行首期股票兩億元。該股份公司可行性報告宣稱：五十六層的西湖大廈總投資爲二億三千萬元，而建成後每年將獲利四千五百七十萬元。照此速度，五年後即可回收。此後每四年的純利就可建一座同等規模的西湖大廈……按照這個速度滾下去，用不了多少年，整個北京路一帶很快就會成爲一片摩天大樓的城中之城。

這一光明的前景引得廣州人如痴如狂，商業城的股票成了熱門的搶手貨，每個單位都在推銷，街頭的股票推銷點排着長龍。首期兩億元股票，一搶而空。

商業城，如同一個拔地騰空的新星，第一砲就打響了。旗開得勝。

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西湖商場拆掉了，可是人們望眼欲穿的那

幢五十六層西湖大廈却遲遲沒有出現。爲了不浪費這片商業的黃金地帶，一些個體商販在那片空地上搭起了臨時的簡易篷，做起了小本買賣。這塊地不愧是風水寶地，生意也確實興隆起來，以致在周圍形成了一片燈光市場，每天半夜十二點還大頭湧湧。燈光市場越滾越大，最後竟和全國聞名的個體戶一條街——高第街平分秋色，廣州亦有晝進高第，夜游西湖之說。本來人們以爲簡易篷是臨時性的，可沒想到「臨時」就是三年多。看來那些賺錢紅了眼的倒爺們準備安營扎寨了。

市民們疑惑了，他們在問：那個欲呼而出的商業城呢？這靜悄悄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他們要求知道真相。

股東們憤怒了，他們在問：那個曾咤吒風雲的股份公司呢？第一次董事會公佈的三十五個董事會到那裡去了？他覺得自己被耍了一頓，他們要求退股。

報紙不是說第一期股票兩億元一搶而空嗎？那麼這兩億元的巨款都到哪裡去了？

號稱兩億元今何在？

中國人向來喜歡「號稱」。曹操明明只有二十餘萬人，却要號稱八十萬大軍。問題恰恰就出現在這個「號稱」上，商業城股份公司的兩個億，也是號稱，而實際到手的錢只有四百五十萬元，只佔計劃集股的四分之一。

平心而論，當年的報紙並未吹牛。商業城的認股資金確實超過兩億元。其中六十七個單位認的公股爲二千五百八十萬元，一萬零八百餘戶個人私股爲一千九百四十萬元，這兩部份的錢已實際到帳，這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那四分之一的實數。

剩下的四分之三，共計一億五千萬元是由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廣市一商局和二商局這四個大戶認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商業城計劃出籠的半年之後，全國經濟突然來了個抽風似的銀根緊縮，所有的大筆款項均被凍在銀行，商業城股份公司一下子被卡住脖子，一口氣沒上來，此時，那個立體空間大戰的宏偉計劃就已胎死腹中了，只不過外面沒有多少人詳細節罷了。

在西方，股份公司的帳目都是公開的，要接受千萬個股東的監督。每個財政年度都要及時公佈公司年度報告，包括董事會的年度報告，公司損益報告和資產負債表。可是商業城股份公司的帳目情況，就連實到股金沒到四分之三這樣的情況也滴水不漏。難怪股東們憤怒了。四千五百萬元實到股金，僅相當於前面提到的可行性報告中的年利潤，分了紅之後，還剩下什麼商業城？

牽一髮而動全身

不但股金沒有湊足，更滑稽的是連總體建築設計的方案也沒通過就發行股票，這確實是世界上一大創舉了。

銀根緊縮從另一方面講也未必不是好事，它同時也使人們「發熱」的頭腦冷靜下來。一九八五年十月，商業城的計劃在廣州市城建、交通、公安等部門以及各專家學者的聯席論證會上引起一場激烈的辯論。

根據推算，這座方圓零點五平方公里的摩天大樓商業城一旦建成，每天將吸引人流將近五十萬人次，日出入機動車兩萬輛，否則設計中的商業空間利用率就無法達到。

牽一髮而動全身，商業城不單單是一個孤立的建築工程，它涉及到整條北京路以及它附近的商業區的總體規劃。爲解決五十萬人流的交通，要麼將北京路拓寬一倍，要麼沿路建兩條十米寬的高架行人道，同時要把所有大廈的底層連通，疏解外圍交通。爲解決兩萬輛車流，必需拆除兩邊人行道，增設停車場地。

除此之外，還有搬遷、電力、供水、消防、排污等各方面問題。每一項配套都需要資金，顯然，這一總體規劃的投資不是兩億元資金可以解決的。商業城一旦破土動工，牽涉的資金將是幾十億，甚至上百億。不要說銀根緊縮，就是在寬鬆的環境下，上哪去弄那麼多錢？難怪商業城胎死腹中，就是不死，母體也沒有能力把它生下來。

又是一大筆學費

商業城的夢破滅了，那些焦慮不安的小股東們已不在奢望見到那個激動人心的大廈群體了，他們現在關心的是，他們的股金呢，上哪裡去了。這四千五百萬元股金裡，滲透着平民百姓的血汗錢。

錢上哪裡去了？原西湖商場搬遷至長堤，南華東和中山五路三處營業，每年補償搬遷費二百萬元，四年共支出八百萬元。

股票的利息爲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這是集股時就公佈的，爲取信於民，不能不付。於是每年付股東利息約三百萬元，四年爲一千二百萬元。

除此之外，設計費一百五十萬元，拆遷買房七百六十萬元，西湖大廈的基礎工程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又花去二千多萬元。加之開辦費

、廣告費、人工費、論證會等開銷，總計近五千萬。若僅此而看，加上這筆錢的利息，收支大致相符。

可是商業城股份公司竟宣稱它還有二千八百七十萬元的債權，債務人是大名鼎鼎的南方企業有限公司。

南方企業公司和商業城可謂同胞兄弟，幾乎同時成立，又同在流花賓館對門辦公，同為一九八四年成立的廣州市貿易開發總公司下屬企業。而「賀總」的董事長則是廣州市副市長，當時赫赫有名的改革家鄧漢光。若按今天的話說，這三家企業均是「官倒」。

南方企業公司名為股份公司，但實際上並無自有資金，開辦時僅向茗提園酒家借款一千元開設帳號，却向工商管理局申報註冊資金四千萬元。沒錢怎麼辦？通過鄧漢光的面子，南方企業公司調用了商業城的資金周轉，結果發生巨額虧損，導致鄧漢光下台。這二千八百七十萬元的債務形成了一個大窟窿，看來只能由市府財政承擔。

又是一筆學費。

喜劇開場悲劇落幕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商業城股份公司廣州迎賓館召開了第二次董事會，三十四名董事參加了會議，董事長鄧漢光因隔離審查缺席。這個董事會自成立以來共開了兩次會議，第一次是四年前宣佈公司成立，公佈三十五名董事名單，而這一次，董事會一致通過了另一個重大決定：解散商業城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城，以喜劇開頭，以悲劇結尾。

根據原來在民間集股的協議，商業城的股票可以還本付息。公司解散是悄悄進行的，四

年前曾喧嘩一時的新聞界也以沉默相對。廣州市一萬八百多名私人股東基本上退了股，領回了本金。致於那六十七個單位股東的股金，只能打落牙往肚裏吞了，不過反正是國家的大鍋飯，這一性質不會因為加上「股份公司」的頭銜就改變。

商業城股份公司的業務交給了一商局屬下的西湖商業公司承擔，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西湖商場是這個宏偉計劃的最大受害者，流離失所四年，現在只好自己承擔起重建家園的重擔。所有商業城的高空建築已在幾起幾伏中被砍伐殆盡，只剩下孤零零的西湖大廈。即使這個西湖大廈，也被連砍兩刀，第一次從五十六層砍到三十層，第二次再從三十層砍到十八層。廣州早已有了三十層以上的花園酒家、白雲賓館。這十八層樓的西湖大廈再也引不起廣州人的興趣了。

商業城的悲劇，落幕了。

白馬劃道不會變成斑馬

鄧小平說：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業城股份公司的興亡，從頭到尾體現了「中國特色」。

資本主義的股票有兩種基本功能，一是集資，二是分散風險。在西方社會的概念是：承擔風險是股東的天職。因此，股票是只能轉移股權，不能退股的。這意味着風險可以轉移，但絕沒有保險，既然風險可以轉移，那麼股票的實際價值就不可能穩定在票面價值上。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的分離，以及二級市場的存在，是任何一種股票的基本特徵。

商業城股份公司顯然是改革中效法資本主義的一種嘗試，可是沒想到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誕生出一個非驢非馬的怪物。

首先，商業城在發行股票之初就宣佈「可以還本」，並固定了每年分紅的利息率。先不說「還本」這一規定使股票完全喪失了分散風險的職能，還沒肯定是否能贏利就公佈分紅利的百分比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那些股份公司的發起人只想到了贏利的分配，可是對虧損後果的承擔連想也沒想。

商業城股份公司的中國特色之二是具有明顯的官辦色彩。負責財貿的副市長鄧漢光親任董事長這本身就是以市政府的財政作抵押。股東們認股的信心，一方面是來自對商業城前景的光明預期，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政府財政的擔保。也就是說，贏利是股東的，風險是政府的，這樣的事何樂不為？

既然政府承擔風險，那麼就由政府的代表說了算，董事會四年只開兩次會，如同橡皮圖章，股東更是蒙在鼓裡。而鄧漢光可以因南方企業公司困難就從商業城股金中抽調資金。兩千萬元以上的巨款董事會竟然不知。不決策者不負責，最後的爛帳當然要由政府財政背着。

一位股東憤憤地說：縱看商業城四年的歷史，就像看董事會變戲法一樣，第一次亮像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幅五彩繽紛的藍圖，然後放進了黑箱，一放四年，等它第二次拿出這幅圖畫時，已變成一筆爛帳了。

歷史走了四年，原封不動回到原地，唯一的變化是一筆學費沒有了。起點是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終點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人們發現，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中國式。

正如佛里德曼預言的：在白馬身上劃道不會使白馬變成斑馬。這就是商業城給人們的啓示。

噫！錢啊錢！

袁雪峯

「錢」的命運在中國大陸幾起幾落，頗受挫折。二三十年前，「錢」老先生被革命群眾掛上了資本主義尾巴的黑牌子幾番批鬥，落得名聲掃地，一片淒涼。

直到十年前，「錢」某才得到平反，恢復了名譽。而近十幾年，隨着大陸的改革開放，錢先生的地位迅速膨脹。最近已到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地步了。

人們常說，西方資本主義是個金錢至上的世界，有錢能使鬼推磨。不過這話今天來講已是老皇曆了。錢的神通和威力在今天的中國要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今天的中國人，爲了錢，沒有險不敢冒的，沒有臉不敢丟的，沒有辦法不敢想的，沒有賴皮不敢要的。

不信請看以下鏡頭，這樣的鏡頭在西方也罕見。

鏡頭一：洪水中的救命錢

一九八八年七月，浙江嵊縣被洪水淹沒，座座房屋在巨浪中像多米諾骨牌似地倒塌。一位到下面視查災情的局長被困在一棵老樹上，四周陰雨濛濛，一片汪洋，水勢越漲越高，險象環生。

這時遠處划來一個竹排，上面一個老者和一個年輕人在打撈水中雜物。局長大喊救命，竹

筏漸漸划近大樹。局長正要上竹排，那青年狡黠一笑，道：「要想上筏，先交六十元。」

局長忙解釋說：「災情緊急，早上出門時連手錶也忘了帶，哪來的錢？」

誰知那青年悻然作色：「不給錢別想上排。」說罷就要撐開，幸虧那老者說情，說救人要緊，局長又自報單位姓名，答應上岸後一定給錢，絕不食言，年輕人才讓他上排。上排後還搜遍了局長的全部口袋，確認沒錢了，才快快划動竹排。

一路上，他一邊撐筏，一邊撈東西，嘴裡不停地發牢騷：「哎，救你還不如多撈根木頭，撈根木頭還不止六十元……」

一週後，這位青年沒有忘記那個口頭承諾，親到局長辦公室討走了六十元救人錢。

鏡頭二：地震後的過橋費

一九八九年十月，山西省陽高縣發生地震，棗泉村的民房和窑洞大多成爲一片廢墟。地面裂開一條一丈多寬的裂縫，把村子和村邊的小河給隔開了。露營在外的村民要想到河邊去打水，必須設法越過這道裂溝。

村民閻某家就在裂溝邊，他家的窑洞已倒塌。他蹲在溝邊抽着烟出神了一天，第二天就動員全家把門板拔出來，架在溝邊，做了一個簡易橋。全家輪流坐在「橋」邊收費，過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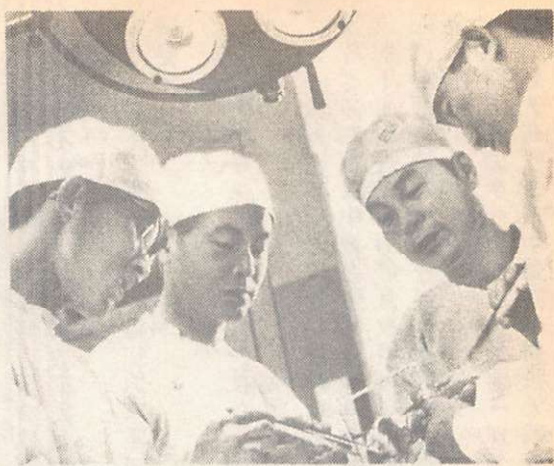
一角錢，一天也竟賺了三四十元。

三天之後，旁邊一家姓朱，也模仿閻某搭起另一座簡易橋，收費五分。這樣一來，「閻家橋」便沒了生意，大家都過「朱家橋」。閻某大怒，帶領兒子到朱家橋尋釁，後經鄰里調解，雙方談判以各收七分錢壟斷價格達成協議。可是第五天，又有另一閻家在溝邊造了閻家二號橋，以致閻朱結成聯盟前去拆橋，引起一場混戰，雙方各一人受傷。直到區政府派人前來干涉，並由村民委員會出面造了兩座公用橋之後，風波才算平息。

鏡頭三：手術台上搶內臟

過去，從病人身上開刀取出的膽結石只供記錄病情，但不知什麼時候起，膽結石竟然也能賣錢了。自有人收購膽結石以來，四川省隆昌縣人民醫院的手術室就亂了套，發生多次哄搶病人膽結石的鬧劇，而且越演越烈，逐步升級。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該縣石碾村村民李國平因病開刀。主刀醫生周正文將患者病變膽囊摘除後，取出一塊膽結石放在病人胸部。這時醫生梁某走進手術室，其助手巫某將結石越過手術台抓過來放在梁某開的處方上，據不成文的規矩，誰診斷出膽結石，結石就歸誰。對此行爲，護士曾某大爲不滿，她斥責道



手術台上的內臟也能賣錢。

：「手術還沒完就搶東西，也不好笑？」，說話間，巫又繼續從器械盤內抓出膽囊，準備遞回梁，囊內還有許多小結石。憤怒的曾護士一把將膽囊抓住，雙方僵持不下，使手術無法繼續進行。主刀周醫生大怒，脫下手術衣拂袖而去，停止手術，助手、護士也憤然離去，只剩下血壓下降的病人躺在手術台上，達八分鐘之久。若非院長干預，手術換人，幾乎出人命。

鏡頭四：電話機裡淘金礦

上海金陵東路是該市最早設立電話亭的地區。剛開始，這些公用電話亭給市民帶來極大方便，可是好景不長，設沒多久，這一路電話亭就千瘡百孔了。

一九八九年一月，解放日報一個記者路過金陵東路，想打一個電話。路過第一個電話亭，塞入硬幣而後沒有音響，遂掛機退幣，可是話機絲毫沒有反應。第二個電話亭連鋁門框也

也沒有了，話機上電話已被人截走，只留下半條電綫。走進第三個話亭，剛一塞入硬幣，一眨眼硬幣就自動滾下來。再試一次，依然如故。記者生疑，細瞧退幣口，不禁大吃一驚，儲幣盒已被人撬開一個大口，裡邊的硬幣已一掃而空。

記者退出話亭，問一位住在附近掃街的老伯，電話局是否知道這裡的電話壞了，是否派人修過。那老伯漫不經心地說：「這電話早就被人偷過了。修有啥用？前脚修好，後脚就被人撬開。」那口氣，就像說電影裡的故事一樣。

記者黯然，繼續找下一個過話亭。誰知道一個電話亭距離又特別遠，走了幾乎十條街才找到。不巧，裡邊恰恰有人，一個小伙子在裡邊，還有兩個半大小子在外面站着。

記者一看，就在十來米遠的路邊停下來等，誰知那三個小子一看記者，拔腿就跑，一會兒就無影無蹤了。

記者覺得有點奇怪，走上前一看，亥然，電話剛剛被撬壞，錢還未掏乾淨，還有幾枚硬幣灑在地下。顯然這一案為剛才幾個年輕小子所為。

整個一晚，該記者走了七個電話亭才打到電話。此後他專門調查了上海市的電話亭情況，到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九日止，上海新客站廣場原有五十個電話亭，已被人撬壞十一個，剩下三十九個，亦有一半有故障。

鏡頭五：承包作業考試題

學生上學要做作業，考試，這本乃天經地義之事。可是「經濟搞活」以來，只要有錢，現在的學生也可免受其苦。

上海科大物理系學生梁某對公共理論課十分厭惡，於是將該科目一學期的課外作業承包給同宿舍的同學，她則負責支出該科目上課當天的早、中餐費用。

另有復旦大學一文科學生蘇某，最怕作文，於是請他人代勞，自己謄抄後交給老師。據他稱，每篇每千字平均付費五到六元，數目雖不大，但不少同學樂於承擔。該校還有學生將上課筆記甚至畢業論文「承包」出去。

上海盧灣夜大經濟管理專業有學生一百五十人，而經常聽課的只有三十餘人，缺勤率超過一半。可是學員考試合格率高得令人驚訝，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原來一位學員將老師講課內容記錄下來，在復印機上將原筆記大量複製，人手一冊，每本二十元。該校理科學生還有「考試公司」。分配人力，分頭編寫和復印有關資料，把解題步驟列出，滙成參考資料，出售給不來聽課的學員。最後結果是各得其所，有人得錢，有人省時間。



孤獨的作業承包者

鏡頭六：導遊打槍要回扣

蘇州是個旅遊勝地，那裡有個「十全街」，又稱「文化街」，聚集了很多個體戶的書畫工藝品商店，因這條街頗代表了蘇州當地的風情，故是外國遊客的必經之地，自然也成了當地導遊的生財之地。在這裡，導遊是店主人的財神爺，他帶外國遊客到哪家店就會為哪家店帶來生意，由於外國遊客不太熟悉產品，導遊的意見對他們購物就是舉足輕重的。因此，各家店主都要對導遊小心侍奉，而當地導遊索賄已成爲公開的秘密，甚至有了不成文的習規。八九年春節，導遊王某帶幾位日本遊客走進一家工藝店，進門第一句話是：「回扣多少？」

「兩龍（百分之二十）」，店主小心翼翼地回答。

王導遊傲慢地看了店主一眼，然後對遊客噁哩咕嚕道：這家店東西太貴，質量也不行。結果一行人轉身而去。

那店主憤憤地道：「兩龍還嫌少，真是黑了心了。」

可是第二天，該導遊又帶了另一批日本客人走進該店，店主立即笑臉相迎，忙說：「三龍如何？」

導遊嘴上露出一絲隱隱微笑，立即回身向遊客介紹，這家店是當地最有特色的商店，物美價廉。於是遊客紛紛解囊爭購。這一下子就爲該店帶來四百多元的生意。店主滿面春風。導遊臨走時關照一句話：「記上賬，下次我還來，一起算。」店主點頭稱是：「一定，一定。」另一導遊劉某，帶兩位日本老太太踏進一家工藝店，女店主憑着幾句簡單日文做成五百元生意。日本老太太正要付款，被劉某止住，

說：「我代付，回去結帳。」說罷掏出二百五十元遞給店主，暗示還有一半「回扣」了。店主因是自己拉的生意，不願意，導遊拂袖而去，店主緊追不捨，直追到賓館。日本老太太很奇怪，問導遊怎麼回事，那導遊解說店主後悔賣得太便宜，還要加二百五十元。結果日本老太太又稀里糊塗掏出二百五十元外匯券來。

當地導遊把索「回扣」稱之爲「打槍」，常常互相攀比，吹噓今天打了幾槍，進帳多少，甚至當着遊客面談論，毫不避嫌。據當地個體戶店主稱，常來的幾個導遊每年進帳至少十幾萬。

導遊翻譯索回扣方法五花八門，當場攤牌要價，並不避外賓的，多是外地來的「全陪」，他們是「一錘子買賣」。背後暗示，定期結帳的多爲本地「地陪」。他們每人每天口袋裡都放着一張生意單，日後好憑單要帳。

鏡頭七：警察與司機的遊戲



唉，他又壓白錢了。

北京，一輛出租車載着一個美國留學生在前門大街上疾馳，接近一個十字路口時，前方出現紅燈，司機緊急煞車沒有煞住，前輪碾綫。這時旁邊崗亭走過來一個警察，一手指着白綫，另一只手伸進口袋掏罰單。

司機一瞧不妙，立即嘻皮笑臉地向警察敬一個禮，道：「首長，這是第一次，手下留情。這是小意思，首長站崗辛苦，慰勞慰勞。」說罷從座底下拿出一條「溫斯頓」香煙，遞給警察。警察拿過煙，露出笑臉，一揮手，車子開走了。

留學生見了這一幕，大驚，道：「一條煙五十多塊……」司機漫不經心道：「罰款至少八十元。所以我們要準備幾條煙應付這些首長們。」說罷又從座底抽出一條「五五五」牌香煙。

留學生知道，這些煙只有外匯券才能買到，問：「你上哪搞這麼多煙？這要花外匯券。」司機一聽哈哈大笑：「你猜這些煙從哪買的？交通中隊。還是廉價的呢。這些貨品警察再轉手賣出盈利，賺了錢發獎金。實際上就那麼多煙在我們這些司機和警察手中周轉。」

留學生聽罷，玄然。

廣州火車站，一對老華僑從海關走出，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立即迎上，問：「哪裡去？」

答曰：「華僑新村。」

司機拉開門，道：「上車。」

從火車站到華僑新村走環市路只要十五分鐘，可是該司機在市區足足繞了四十分鐘，才把兩位老華僑送到家，最後收款三十元外匯券。

老太太半信半疑道：「怎麼那麼多錢？五年前我回來時好像火車站離家很近。」

司機臉不紅，心不跳，道：「那邊修路，所以繞了點路。」說罷趕緊溜掉。

辦一件事真難

訪「六四之聲」電台李三元

本刊記者

編者按：

六四天安門大慘案發生後，海外留學生一下子組織了近百個民主聲援團體，遍布全球。但是，隨着低潮的到來，大部份團體由於經費拮据或無事可做，像泡沫一般地消失了。保存下來的大部份是做實事、有韌勁的組織。

為此現象，本刊特訪問了總部設在芝加哥的「六四之聲」電台主持人李三元先生，通過他的故事，讀者可以瞭解到搞民運的艱巨性及可行性。「六四之聲」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不斷走向正規化，訣竅何在？請看下面的訪問和介紹。

李：「六四」大屠殺後，大家都想做點什麼，如辦研究所研究中國問題啦，辦電台辦報紙等。當時我們幾個同學如胡明、王輝雲、杜剛等，準備探索一下辦電台的可能性。於是開車去了華盛頓，與一些華人社團和大學教授接頭。當時形勢很熱，大家以為資金很容易解決。我們想得也比較樂觀。

問：你們最初不是計劃在香港辦嗎？

李：當時香港對天安門事件反應很強烈，又是離大陸最近的地方。於是我們便打算把電台設在香港，直接向大陸播音，即使這一步做不到，也可以從香港積一筆資金。但是一經聯絡，發現問題很多，很多人許諾出資又遲遲拿

不出來。

但是很快，哥大的同學給了我們一千元，馬利蘭大學同學也給了一千五百元錢。我自己拿出三千五百塊錢，胡明也拿出一些錢。我們人貼的錢本來打算有錢後可以報銷，但後來沒錢，只好賠進去了。

六月二十一日我們帶了六千多元去香港籌辦電台。一到香港反應很好，我們對香港朋友說，美國的朋友也有播音設備，我們兩、三個星期內便可以播音了。香港學聯、中文大學等賣力得很，也有錢，表示支持。但香港的廣播電台却堅決地說不可能做到我們的計劃。

問：為什麼？

李：他們舉出的理由是：第一，香港中共的特務很多，會暗中破壞；第二，他們自己也怕得罪北京政府。因為香港靠大陸供水、電、供蔬菜，他們得罪不起北京政府。因此香港之行不得要領，却花了很多錢。

回美之後，我們很快建立了製作室，在七月中旬與當地電台取得聯繫，開始播音，但只局限於美國的發射塔。中國沿海地帶的一些發射塔由於種種原因也沒有給我們播音。然而電台必竟算是開始了。

問：搞一個電台如此容易？

李：當然，條件非常艱苦。我把家裡空出



李三元：電台現在財政危機，急需大家捐助，捐款抬頭請寫 CHINA CRISSES，地址請寄 1314E HYDEPARK BLVD, APT H2, CHICAGO, IL. 60615

來，用毯子堵窗隔音，算是錄製室。也沒有空調，坐十分鐘就一頭大汗。

問：有一個疑問，芝加哥「學自聯」成立大會時，為什麼沒有把你們的電台包含進去？

李：大會之前籌備者很感興趣。但大會中某些人士認為電台只是一個設想，還有一些專業人士說辦電台如何困難。所以支持的人不多。

問：他們是否沒有弄清你的構想，我到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前途的構想。

李：其實我講得很清楚，但是大會並沒有給我們講清楚的機會；再者他們想做的事情很多，盡管表示支持，真正開始工作時，參與就需要敬業精神。因為工作很繁瑣，很花時間，

所以有人很熱心却不願意自己參與。

開始的發起人胡明，也開始為「民陣」方面去工作了，只剩下我和王輝雲繼續作了。

問：你們的播音節目都有那些內容？時間多久？

李：我們採用播音方法很多，有每星期兩小時的，也有一星期固定那一天播出。但是必須承認，我們的節目與正規的電台還沒法比，新聞性不強，主要內容都是中國學生和海外民主運動的消息，基本上自己撰稿。和其他電台的内容完全不一樣。我們除報導新聞外，還側重中國局勢的分析。

問：節目政策怎麼制定？

李：我們有一個委員會確定節目政策，成員都是一些學生領袖。學聯主席劉永川是電台委員會名義上的主席。

問：現在電台同「學自聯」是什麼關係？

李：從名份上，我們是學聯的一個電台，或職能機構。但學聯方面的工作效率我很不滿。到今天為止，學聯沒撥給我們一分錢，沒提供過一篇稿件。可以說，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但許多地方的學生組織却給了我們很多幫助，如加州的學生領袖、威斯康辛的學生領袖，他們給我們提供稿件，還幫我們四處募捐。

問：現在你們的公司結構是什麼樣子的？

李：我們的編制目前有五個全職專業人員，還有一些特約撰稿人和記者，分佈在全美各

地。電台委員會只是一個後援會，它的功能應該是做決策，但由於很難開會，所以也有些流於形式了。只是某些委員個人時常提出一些建議。

問：這種事情很難，就拿「學自聯」來說，他們自己的委員會怎麼開會，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現在總部設在芝加哥，主要活動也在芝加哥。

問：目前貴台五個專業人員拿工資嗎？

李：我們基本上可以發出八百到一千的生活補助，因為工資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這樣的收入與他們的勞動相比是不夠的，甚至可以说，打餐館、看小孩，在芝加哥做任何事都比我們這的工資高。

問：你們今後發展的構想是什麼？

李：我們計劃今後在全美各大城市都播音，而且增加在中國沿海地區的播音。

問：貴台與此間各民運團體有何關係？持何態度？

李：我們是其中之一，我們為所有的民運團體服務。同時作為新聞事業，我們也保持我們自己的獨立性，並不是為民運唱讚歌的。那個民運組織有什麼問題，我們都會以善意的態度提出來。海外民主運動面臨的問題，也是我們要探討的一個主要方面。

問：你們現在在名義上仍屬於「學自聯」，但在七月底「學自聯」成立大會時，就有人提出「新聞自由導報」作為新聞機構，不宜從屬於任何政治團體。

李：本來：「學自聯」答應我們提供經費和稿件，才形成這麼一種名義上的關係。但是後來諾言沒有實現，而且「學自聯」自身很多問題落實不了。可見「學自聯」目前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來充當我們的上方機構。

STATEMENT OF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CIRCULATION

1. Title of Publication	CEDIA SPRING	2. Issue Date	10/31/89
3. Issue Frequency	MONTHLY	4. Annual Subscription Price	\$24.00
5. Complete Mailing Labels of Single Copies of Publication	12	6. Total Number of Copies	12
7. Complete Mailing Labels of Single Copies of Publication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EW YORK, NY 11773	8. Complete Mailing Labels of Single Copies of Publication	
9. THE ABOVE AD ABOVE			
1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1. DEMO. CHU THE ABOVE AD ABOVE			
12. NONE			
1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2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3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4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5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6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7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8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1.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2.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3.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4.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5.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6.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7.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8.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99.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100. DEMO. CHU 74-14 WOODSIDE AVE., 2ND FL., SEABROOK, NY 11773			

談天行

律師事務所

各州各類之移民案件 房產買賣 生意轉讓
意外傷害 分居離婚 政治庇護 商業契約

321 BROADWAY, 6FL., NEW YORK, N.Y. 10007
曼哈頓百老匯大道321號六樓 (移民局正對面)

212 693-1303 請電話預約

為歷史保存一份檔案

——訪「六四」計劃負責人盧偉力

本刊記者

記者：
能不能告訴我您的名字是怎麼寫的？

盧：
我叫盧偉力，是香港人，現在在紐約市立大學讀書。

記者：
你們這個「六四」計劃組織是怎麼搞起來的？

盧：
這你也知道。今年六月，你們中國之春在聯合國門前哈馬紹廣場發起絕食請願，隨後有很多團體參加，成立了一個絕食團，再由絕食團的成員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運作。

到了絕食後期，大家覺得中國的形勢發展很快，大清洗大逮捕開始了，我們不能光消極地坐着絕食，而要成立一個相對穩定的團體，長期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我記得在當晚我們委員會成員討論了一個通宵，決定成立現在這個組織，並擬出了一份「六四」計劃宣言。

記者：
你們這個計劃都有什麼具體的內容？

盧：
我們要搜集一切有關天安門慘案的資料，加以整理，最後建立一個檔案庫。我們希望我們的檔案終有一天能在天安門前的博物館展出。回北京做調查較困難，就算進去後也只能通過秘密渠道。一些組織，如國際特赦也只能搜集不到一百人的名單，但以保守的估計，天安門慘案死者應有二、三千人。當然，這目前尚不可能，但我們相信，通過努力，這一目標是可以達到的。

記者：
搜集資料的工作現在進展如何？

盧：
我們通過幾個主要途徑，一、透過本地留學生團體在北京的親友、同學；二、透過四月到六月有很多香港的大學生和記者在北京；三、向全世界的新聞媒介搜集資料。最初二個月的搜集，我們發覺要搜集國內的資料很困難，在新聞封鎖和海關的搜查，因此只能以偷運方式。我們得到一批圖片，這些圖片在別的新聞媒體中未出現過。包括達姆彈打的人和坦克車碾過學生、工人、腸臟外露。證明了坦克車碾過了無辜的老百姓，軍隊也確使用了達姆彈射

殺老百姓。我們把圖片發給新聞界，中國之春也採用了，駐聯合國的一些國家代表也向我們索取了一些照片。

我們還想做一些死難者的名單和小傳。因我們得到的一些資料令我們感到很傷心，例如有一位名叫蕭波的北京大學化學系助教，二十七歲，十六歲已考入大學，可說年輕有為。六月三日晚參加教師遊行，當時他去救人，中槍，並非要害，人們把他送往復興醫院。當時已有很多人在排隊，由診室到大門口。他在大門口因未能進去而失血死亡。死亡那天剛好是他二十七歲生日。死後留下太太和一對滿百日的學生兒。

我們希望透過六四計劃籌款給死難者的家屬。現時已有個人名義捐款。絕食時我們籌到五千多元，我們通過兩個可靠的途徑把款送回去。



右起第一人為盧偉力

在我們搜集的資料中得知北京民心憤怒極大。一老太太之子在六四犧牲，她持一杯有毒的開水給戒嚴部隊的一名士兵喝，士兵懷疑有毒，要她先喝，她喝後再給那名士兵，爲了報仇不惜同歸於盡。

我們還搜集一些目擊者的報導。搜集目擊者的名單，香港的目擊者有記者和學生，我們會做一些錄音訪問。我們也聯絡了一批交換學生，在紐約有十多人。

記者：
你們準備怎樣處理得到的資料？

盧：

目擊者的材料更有真實性，因爲不是憑想像和「以爲」而得來的。我們有一個出版計劃，把目擊者的資料和死難者名單以檔案方式去出版。出書暫時沒有經濟條件，我們用原始方法建立檔案資料，把資料發放到圖書館。我們搜集的可能不完全，但可變成其中一部份。我們不但搜集血腥暴行的照片，也搜集一些很有意義的照片，比如其中一張，一個小孩舉着「大學生萬歲」的牌子，我們覺得這是很令人振奮人心的照片。還有一張是一些老百姓輪在坦克前阻止坦克前進，這是不畏強權的反映。

記者：

上期中國之春封二的像片組「血，留在人們心中」是你們免費提供的，我想知道你們提供給別的組織或新聞媒介的照片有否收費？

盧：提供給別的團體的照片按兩個方式，一是收回成本，一般是翻拍的大照片；另一種

是小型相片，我們沒有收費。還有些給外國朋友，如一位日本朋友認爲這些照片寄回日本，可推動人們對中國民運的同情，我們提供大相片，每張收八元五。他後來又捐助二百餘元給我們。

記者：
我想知道你們的財政狀況如何？

盧：

六四計劃是貧困的團體，我們把絕食得到的五千多元全那捐出。其後和幾個朋友自己出資租一房一廳作辦公室。

記者：

租金從那裡來？

盧：最初自己拿錢出來，現在通過捐款。在九月初我們得到合法社團批准，才開始接受捐款，當時得到七百元左右，後來我們弄了一個餐會，在長島，得到二千五百元。其後我們用這些錢做一些紀念品，九月十五、十六日民主中國日擺攤位，賺到五、六百元，我們共得到四千五百元。

記者：
你們的組織架構是怎樣的？

盧：

凡參加二十四小時絕食都是我們的成員。

記者：

我也參加了超過二十四小時絕食。

盧：

理論上你也是我們的成員，成員每人交會費一元，但留下來積極運作有九餘人，其後又有新成員加入，主要爲本地青年華僑。現在經常工作有十餘二十人。現在我們有籌委三人，其中有二個是香港學生。

記者：
他們的名字是……

盧：

一個叫李麗嫦，在紐約市立大學讀碩士課程，另一個叫王子鍵，是大陸留學生。我們正在召集會員，希望其後能開正式會員大會，選出新的理事。現在是以籌委會來指導運作。

記者：

你全職投入民運工作？

盧：

我仍是學生，還要考學位試，我從香港來，還有小小積蓄，也不能支持很久。我還有些謀生本領，我還寫寫稿，我手頭有四、五千元，可以過半年。

李麗嫦原來一週上五天工，現在一週上十小時，抽時間搞六四計劃。另外一些核心同學也有同樣情況。

記者：

成員的比例如何？

盧：大陸、台灣、香港學生都差不多，大陸的學生不屬於比較活躍的社團成員，不屬民聯也不是民陣。

記者：

你準備堅持多久？

盧：

計劃書說希望能工作不懈，直到中國民主建成。能堅持多久？我們都是學生，讀完書後要回原地，因此要設法吸納本地僑民，或者把它變成國際性的團體。這也涉及到經濟條件。希望能得到一些基金，和一些義賣工作。聯繫方面涉及和別的團體的關係。我認為有第五種民主力量出現。

第一種是國民黨；第二種是中國民聯；第三是民陣；第四是學自聯；第五是華僑。他們來自港台、中國大陸，他們運作都不錯。我們和第五種力量和中國民聯聯繫、合作都比較多。

如民聯郭城六四自行車隊，我們全力支持。

記者：

我們是否可以分期發表你的資料？

盧：

可以，但要過兩三個月後，資料會多些。

記者：

你們的未來規劃？

盧：

未來一年做三件事：一、明年六月四日綜合媒體的六四慘案展覽；二、全力協辦六四環球自行車隊；三、在本地一華語電台（美加地區）播放「民主中華」每週一次一小時。訪問各團體，報導民運消息、討論民主概念。這是在美加地區第一個面向美國華僑播放的節目。

路漫漫其修遠兮

本刊記者

六四環球自行車隊側記

郭城：我們的事業是悲壯的

從左至右：張以林、郭城、王洪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使這個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們憤怒了。我們中國人，更是眼中流淚，心中淌血。」許多從坦克下面逃出來的目擊者都斬釘截鐵地說：「我一定不會讓他們白死。」是的，中國人民在六四中付出的代價，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嚇倒了。保持中國人為民主奮鬥的陽剛之氣，這就是六四自行車隊組成的宗旨。

搞民主是多元化的。有人回國同共產黨對着幹，像劉曉波，就是這樣的。有人在海外繼續奮鬥，像「中國民聯」、「民陣」、「學自聯」；有人搞示威；有人寫文章；有人遊說美國政府。我們「六四」自行車隊，選擇了宗教精神的苦行方式，周遊世界，傳播民主火種。好聽的說到這為止。下面是不好聽的真實情況。六四自行車隊，不是騎自行車遊山玩水，那是十分艱苦的搞民主方式。比如說，從組建到今天，我們的隊員已往換了好幾撥，沒有體力，沒有筋骨，只有熱情是不行的。

謝謝捐款的及時雨



「六四」環球車隊隊徽

王洪設計

六四自行車隊第一個隊員不是我，是夏威夷飛來的王洪，本隊急先鋒。六月十號王洪打電話給我，一上來就把我誇一頓，說我三年前民主長跑如何如何讓他佩服。然後真話才說出來，要我組織自行車隊再來一次。我開始沒答應，就嚇他說，環美長跑幹過了沒意思，美國留學生這次會上街了不用我們再鼓動，要幹咱們來個環球的。

我本想用這招把他嚇回去，沒想到王洪這小子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種，一聽我的話更高興了，還要到北極給六四英雄立塊碑。我沒折了，只好答應他再次下海。

計劃搞出來後，先找隊員，報名的很多，真幹的沒幾個，一訓練就淘汰了一批，一上路又淘汰了兩個。人員穩定後又去搞錢，這時已經九月份了。捐款不太容易。我就路回西部舊金山老根據地找我的老朋友楊海萍。他一下子就給了五千塊現金，外加小汽車和照相機和目

行車。他是我們的急時雨宋江。

第二個宋江叫戴奇，他自己沒錢，但會要，問我們怕不怕。我說不管美帝、蘇修還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錢都要。我們行為正義，就沒那麼多講究，這一點可以成爲其他民運團體的榜樣。

捐款中最讓我們感動的是紐約華埠老人中心的捐款。六四百日祭那天我們出發，老人中心的老頭、老太太全來參加了，他們不到二百人，一人一塊，共給我們捐了二百六十塊。

老美夠意思

出發那天儀式很隆重，紐約市長郭德華親自接見了我們。送給我們每人一個蘋果即紐約的標誌。郭市長跟我同姓，脾氣都差不多，不信由你。他在六四前後多次和總領事館對着幹，我們中國人應該記住他這位朋友。

出發之後，也得到老美的熱情支持。如我們快出紐約時，找一個警察問路。他一聽我們是爲民主的車隊，立刻自動報名作嚮導。用警車夾道把我們送到他的執勤範圍邊上，並打電話給下一個分局，要他們派人接我們。那位紐約四十七分局的警察，還把他帶了十年的局徽送給了我們留做紀念。

我們第一段是從紐約到波士頓，沿一號公路挺進。美國的公路與大陸不一樣，是爲開車修的，雖然直但高波又長又多，開車沒感覺，騎車就受不了。高波蹬到一半就蹬不動，下來推着走，下坡不敢騎快，一個勁地掙掙。好像中國民主運動一樣艱難重重。

美國發達路難行

從紐約的波士頓我們騎了四天，其中三天兩夜下大雨。一路上別提多難。最麻煩的是遇上修路，還有修車。美國的自行車高級但不耐用，特愛壞。我的自行車是一個日本學生捐的日本賽車。有一天車胎爆了，修好後去加油站打氣，却發現汽口與美國汽筒型號不合。費了好大勁才把車胎吹起來。

有時候遇到橋不讓騎車，警察不讓我們坐巴士過去。過去我一個人長跑很簡單，祇個車就過去了，現在四五口子人加上車子，沒大車根本搭不了。

有一次過橋沒巴士，我們截了四個小時才遇上一部開卡車的老頭停下來。起先不同意，最後我們說是基督徒，讓他看在主的份上幫我們一把，終於過了橋。

到波士頓四處找接待人，最後香港同學會把我們接過去參加六四紀念會，同吾爾爾希一起發言，我們最驕傲的是，我們的隊歌走到那裡都是第一，到處有人向我們要磁帶。在哈佛和麻省工學院的「六四」百日祭大會上，我們幾個一唱隊歌，全場跟着用手打拍，場面激動人心。

過了波士頓以後，捐款的情況好轉了許多，名氣也響了，但隊員們也自我膨脹起來，大家不願意住帳篷，却要住旅館。但是我說，我們車隊的性質不能變，有錢就改善一下，沒錢什麼都不能要求，我的工作方法也不太好，氣太粗。不過現在我們有一部車，還有大洗澡桶等設備，錢夠了還要買衛生保險。有隊員說我專制，我也道了歉。

英雄各有本色

車隊隊員都是烈性小伙子，一幹起來誰

也不讓誰，但我建立總指揮威信的方法是有好處大家輪流站，比如記者來了我不上去，讓別人上，有女孩子獻花我乾着急，也只好站後面一點讓他們接，這樣人家才服你。在民主組織裡，誰官大誰當孫子。

但原則問題我不讓，華盛頓以後，我堅持要算里數，否則沒法向公眾交待。但隊員的身體素質不一，本來是有隊形的，像軍隊一樣。但王洪愛逞強，自己一溜就跑去好遠，張以林也夠勁，送過外賣，我的爆發力不錯，但一過二十哩腿就痛。以前長跑留的病根。後來我就開車跟着他們。

這幫隊員成天騎車也不累，精力過剩，像張以林，每天晚上有什麼球場打什麼球，經常回來晚，有的一到一個小城市就愛看風景，王洪一見老美就練英文，聊起來沒完，特別遇到女孩，這小子嘴甜，女孩都愛跟他聊。

現在世界上誰也不怕誰

我們一路上的政治影響還不錯，有時候歡迎很熱烈，又是訪問又是吃飯，有時候到了一個地方沒人理，大家情緒就低。於是我跟他們說，現在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別老把自己當最大的英雄，我們的行動是悲壯的，不是湊熱鬧的。

但這一次有一個根本的變化讓我很鼓舞。三年前我搞民主長跑，每到一地出面迎接的都是台灣、香港同學，大陸學生熊，不敢跟我這個反革命接觸。但這次情況大為不同，接待歡迎我們的，主要都是大陸同學，台灣同學跟着大陸同學一塊來。這說明什麼？共產黨沒戲了。你瞧着吧！

記得三年前有一次在澤西州，三十多台灣



在華盛頓遊行隊伍中(左 王子健)。

同學給我搞了一個晚會，我們的盟員鄭文杰就感慨地說：大陸的民主運動，大陸的同學反而不敢搞。後來我上廁所，一個同學跟着我過來，見周圍沒有人，他含着眼淚同我說，他是大陸同學，他為大陸人感到內疚，鼓勵我別洩氣。

上次我跑步路過喬治亞州的亞瑟斯，曾經和那裡一所大學的大陸同學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當然，在當時人們對共產黨的改革還未完全絕望的時候，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不歡而散。可是這一次車隊路過亞瑟斯的時候，受到大陸同學的熱烈歡迎。他們說，他們要洗刷三年前「圍攻」我的恥辱。這話雖是玩笑話，但由此可見人心已經變了。

下回分解請問王洪他們

我由於上回長跑受了傷，騎車已力不從心，後來給車隊搞後勤。出了華盛頓，我把王洪他們帶到一個對我來說非常有紀念意義的地方，告訴他們：上次長跑，我就是在這裡和我的後勤人員黃奔、李信他們分手的。當時他們把我送到這裡，對我說：「多保重，今後全靠自己了。」在此之後，伴隨我的就是漫長的孤獨和非凡的艱辛。這一次我把車隊送到這裡，也對他們說：「多保重，今後要靠自己了。」我不知道，王洪他們是否理解這句話的含意。我們合影一張，就分手了。後面事，請王洪他們下回分解了。



挺進馬里蘭(女，陳洪—車隊後勤)。

張以林：以苦行方式追求民主

我們出發後第一個大型的活動是在華盛頓與「全美學自聯」一道參加大遊行。本來安排我們十點鐘就入場，但由於節目很多，一直等到下午三點鐘。

當時天下着大雨，我們站在雨裡等候，與其他民運人士交談。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我本能的反應，要去找幾把傘來，但郭城却不客氣地拉住我說，不准打傘，我一下子就意識到他的用意。那就是，在許許多多的民運活動中，我們自行車隊之所以有特別的意義，正在於我們選擇了這種苦行僧的方式，我們就是要受些苦，為民主受苦。

兩點多鐘我們終於上台，由郭城講了幾句話之後，我們開始演唱隊歌，很受歡迎，氣氛很熱烈。大遊行開始後，我們排在第三隊，首隊是自由女神塑像，二隊是學自聯的各位領袖，第三隊就是我們。北京大學隊緊接在我們後面。

隊伍到了大使館門前，群情激昂。我們感到最自豪的是，群眾一起唱着一首我們改編的歌曲，即大陸文革歌曲「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誰也不怕誰」。這首歌不用教，大陸人都會唱。

到了喬治亞州安蔭去斯市後，當地的同學給我們舉辦了一個慶祝會。同學們對我們的精神表示讚佩而外，主要還對大陸的事情比較關心。我覺得我們車隊真像是一個宣傳隊，走到那宣傳到那。我們也能發現廣大學生現在關心的都是什麼問題，比如，如何將中國的工農大眾與民主事業結合起來，我發現許多很有價值的問題，都是雜誌所沒有注意到的。



王洪疾馳在公路上。

王洪：我們都是平凡的人

我首先想說的是，發起自行車隊的行為，對我而言，只能算「參加民運」，不算做「搞民運」，因為搞民運是件很難的事，需要能力、魄力和智慧。我說這話的意思是，我發現許多中國人喜歡個人膨脹，參加了一兩次活動後，就自認為是搞民運的英雄了，說話的口氣都不同凡人。

因此我時常向大家強調，我們自行車隊沒有什麼豪言壯語或偉大的事跡，本來我們的行為屬於一種最基本的事情，即把六四的遺業傳

下去，讓大家不忘「六四」國殤。因此我自己認為只是民運的普通參與者。不像吾爾開希，是「六四」英雄，郭城是一方神聖。我只是一個愛國和民主感情驅使的參加者。

我們自行車隊名目太大，環球自行車隊，現在基本隊員只有三個，俗話說，兩人為伴，三人為伙，四人為幫，五人為伍，十人為隊，我們才達到伙的程度。因為能嚇唬一下共產黨，叫做隊也無妨。

現在我們已經進行到美國最南部的德克薩斯州了。但是冬季來臨的寒流，比我們去得還快。現在全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寒冷。你看自行車比賽都穿小短褲，但我們不是比賽，一天要騎十幾個小時，因此負荷也在增加，背包也在增加。

另一個問題是冬季風大，如果說「逆水行舟」表示困難很恰當，那麼「逆風行車」則是更恰當的用語。沒幹過的無法體會，真累。我們計劃不周出發得晚了些，不過更增添了車隊悲壯的色彩。

行前我的壓力很大。因為冬天來了，而且騎了一千八百哩後，隊員的體力有些不支。郭城留下，我是隊長，就有點壓力。

郭城留下的主要原因是腿傷。他的醫生說，他再不注意的話，今後有可能坐輪椅。不過郭城離隊我們又高興，又悲傷。悲傷的是他不能跟我們一道長征了。高興的是我們這下子可以輕鬆多了。因為郭城是個苦行僧，讓我們洗冷水澡、剃光頭。還要露天宿營。

不是說我們怕吃苦。有些事情要量力而行，比如郭城開始就說，沒有醫療保險也要出發，我就堅決反對。還有郭城要嚴格規定，車輪要碾過每一塊土地，即使不能騎車的地方，也要推過去，這種做法太形式主義，我們大家都

不能接受。

現在我們完成的哩數精確地用表量過是一千八百哩，計劃在下雪之前完成三千哩。因為把時間拖久，大家拖病了，反而完成不了預定的哩數。因此，在這方面，隊員同郭城經常發生一些衝突，但基本上都圓滿解決了。

現在剩下的三個隊員，都不是專業搞體育的。我本人受過一點訓練，張以林送過外賣。王子健則是半路被逼出家，本來是我們的後勤部長。我本人幾次要打退堂鼓，在張以林和王子健的勸說下，才留下來。因為王子健有胃潰瘍都留下來了。

我們現在面臨的困難比以前預想的要大許



紐約前市長郭德華接見車隊全體隊員。

多倍，下一段是美國的「西藏」新墨西哥、阿利桑那，然後是加州。這段路百里無人烟，每個城市間的距離很長，天又冷了，真正的考驗開始了。

王子健：同自己的聰明作鬭爭

我們都不是英雄好漢，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郭城離隊我有一點看法，他的腿傷是一個次要的原因，他本來就知道自己有病。他的離隊，是因為車隊出發後有很大的改變，與他原來的想法不一致，所以他離隊了。

據我瞭解，郭城原來想把車隊建立成一種車隊的形式和作風。要求十分嚴格，一路上只住帳篷，完全以苦行僧的精神來做。去喚醒民衆，但一路上困難重重，他的原計劃完全變了樣，於是他放棄了繼續努力的願望，脫了隊。當然，他還是四處為車隊遊說、找錢。

我們現在一路走着，以前只唱悲壯的隊歌，現在什麼都唱，如「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等。我本人是贊同郭城那種方式，現在看來不可行了。

這種改變是由於現實造成的。因為我們是一個集體，不是獨行俠，每人有個人的困難和看法。一路上，風寒路遙，最難熬的是孤獨感。我們不得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來保持隊員們心理上的平衡。

比如，郭城只讓隊員一人領兩件隊服，但一個多月以來，我們只有機會洗三次衣服。我們走了十六個州加華盛頓特區，只洗了三次衣服，可想而知，兩套隊服是不行的。

再者，我們都是學生，還要讀書，現在有獎學金的都失去了。我們今後都要再讀書，要自己打工籌學費。所以大家都想快點結束全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幾輛車齊頭並進，而是一輛車，大家採取接力的方式往前蹬，我們在外面，沒有一個記者受得了這種苦，跟着我們監督，所以我們開車還是騎，誰也不知道。誰在困難面前都有取巧的自發傾向，所以我們不但要和自然做鬭爭還要同我們自己的聰明做鬭爭。

我還想談談車隊的聯絡工作。我們現在最寶貴的是時間，聯絡工作有兩方面的麻煩，一是對方太熱情我們會受不了；二是對方太冷淡，我們也受不了。比如，對方太熱情，非讓車隊在那裡停留一天，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耽擱我們的行程。但對方對我們太冷淡，不讓我們當回事，我們也受不了，會挫傷積極性。

過去我就有這麼一個體會，冷熱的平衡很難把握，大家總是不滿意。因此，我現在都是大家分頭聯絡，這樣誰都知道聯絡工作是怎麼回事，也就不再抱怨了。

在聯絡過程中，我發現奧斯汀的情況最好。以前車隊每到一地，總是一個學生會出面接待。如大陸的、台灣的、香港的或美國的。但奧斯汀那裡只有一個同學會，全部港、台、大陸、美國大聯合。我們用兩個小時用英語討論，十分熱烈。

編者後記：六四環球自行車隊的目述，真實感人，值得一閱。他們那種知難而上的精神，正是中國民主運動所需具備的一種氣質。如果這支車隊沒有被困難所摧毀，請候閱本刊的



讓我們用筆來自衛

記「六四」藝術大展

訪 組織者張宏圖
美術史學者張保羅
本刊記者

問：這次畫展是怎麼搞起來的？

張宏圖 畫展說來籌備時間很長，六四以後的六月九日，紐約的一些藝術家便準備搞一個中國政治主題的畫展，大家反響很強烈。

在籌備會上，我提出了一個相反的意思，認為不能立刻就搞，因為北京剛剛殺人，誰還有心思坐下來畫畫，我就坐不下來。

但計劃對外公佈後，且一呼百應，很多很多美國畫家同我們聯絡，甚至包括拉丁美洲和歐洲畫家，還有東德、匈牙利的畫家。

問：整個畫展的主要組織者是什麼團體？

張：我們把整個籌備工作委託給此間的「亞美藝術中心」辦理。他們組成了一個委員會，負責張羅籌備。我要說「亞美藝術中心」是個第一流的團體，他們向全世界各國的藝術家發了五千多封信。所以此次畫展中，很多有名的重要畫家都參加了。共有二百位藝術家參與。中國畫家有二十位。

問：你在這裡有作品嗎？

張：我畫了三幅作品參加展覽：一是「門」；二是「最後的晚餐」；三是「毛澤東組畫」。

問：你可否談談對這次畫展的感覺？

張：這次畫展對我的感覺是很直接的。共產黨在北京殺了那麼多人，我做為藝術家也怒髮衝冠。我又沒參加什麼民運組織，只是一個「民運單干戶」。我能做什麼？只有用畫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問：這不是藝術家最惡劣的政治混同藝術嗎？

張：我並不過份追求政治性效果，但由於我自己在中國大陸的人生經驗，我知道藝術家是難以擺脫政治的。那是藝術生存問題。我的幾幅作品，就是我的個人經歷同我出國以後的藝術認識，以及對毛澤東本人的藝術再認識。

中國畫家之所以厭惡政治，是因為在國內時強迫藝術要為政治服務，所以去到另一個極端，認為政治是醜惡的。但是我個人認為，當政治干預到我的時候，我不能裝傻、裝啞。這是躲不開的，在中國連思維都沒有自由時，怎麼可以畫畫？怎麼會有藝術？

問：這與藝術的純粹性有衝突嗎？

張：別人問我這個問題時，我常常舉這麼一個例子：廚房有一把菜刀是用來切菜的，但當一個強盜闖進來要傷害你，那這把菜刀就要變成自衛的武器。

現在中國藝術家面臨的就是這麼一種情況。中共在北京殺人，那是我的同胞、鄰居、同學，甚至兄弟姐妹，就跟殺我一樣，我這時什麼都可以用做武器。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很直接的反應，本能的反應，所以我現在畫政治。

出賣毛澤東的猶大就是毛澤東

問：那麼你會因此而用藝術來搞政治嗎？

張：如果中國的情況逼着我這麼做下去，



張宏圖（左二）和他的「最後的晚餐」（右上第三幅）

我只好這麼做下去，但我仍然希望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我可以回到畫齋裡去，從事我真正願意做的事情。

問：你那幅最後的晚餐很受矚目，它是怎麼構思出來的？

張：你也很清楚，毛澤東在中國人一生中，是難以抹去的。他搞階級鬥爭，在人民中間搞，在人民中間打來打去。

但真實的情況是，四九年後中國根本沒有什麼階級鬥爭，有的只是共產黨自己的權力鬥爭。在我看來，中國只有兩種人：一是人民；一是統治者。結果統治者自己鬥爭，同時利用、愚弄了人民。

毛澤東之所以搞權力鬥爭，是因為他總害怕周圍的同志出賣他，就像當年耶穌知道自己

的使徒出賣了他一樣。但誰出賣了毛澤東呢？其實是他自己。因此，我把「最後的晚餐」主題中的十二個使徒都畫成了毛澤東自己，猶大就是毛澤東。

其實毛澤東也不是他自己。通過毛澤東的形象，我要象徵中國的統治者，他們成天懷疑階級鬥爭，其實敵人、叛徒都是他們自己。

再者，「最後的晚餐」中，猶大手里拿着錢袋子，但在這幅畫中，每個毛澤東手裡都拿着紅寶書。而全畫的背景，也是用毛澤東第五卷的拆開來製成的。毛澤東製造了一套「思想」，用自己的思想把自己封閉起來，把中國封閉起來。我用這種藝術手法將這段歷史再現。

問：「六四」慘案是鄧小平、李鵬等人搞的，你為什麼還念念不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呢？

張：這是根本問題。因為不批判毛澤東，中國的根本問題就得不到解決。中國就沒有希望，只能一天天地走下坡路。毛澤東雖然歸西已久。但他的政治陰影仍然籠罩着中國。例如「四個堅持」，就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翻版。最近大陸文藝界又要重新學習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問：在你畫的某一個毛澤東裡，為什麼有半邊臉變成了吾爾開希呢？

張：既然中國仍籠罩在毛的陰影下，中國民主運動也是一樣的。我把吾爾開希當作學生運動的象徵，去表達這樣的意思。

問：看來你是一個很有「政治覺悟」的藝術家囉！

張：只能說我是一個很有良心的藝術家，而良心裡面包含了政治。我是一個中國人，來美國已經七年了。這七年裡，我一直有意識地接受美國的東西，試圖擺脫中國在我身上的烙

印。但從五月份開始，我強烈地感到，我還是一個中國人，我同那裡根本分不開，我每天如飢似渴地看報。我覺得這根本不是一種政治反應，而是一種中國人的本能的反應。

讓毛澤東吃點人間烟火

問：老張，請你評論一下參展的作品。

張保羅：想就幾幅以毛澤東為主題的作品作一點評論。

在民運期間，湘江的幾個工人在毛澤東畫像上灑了點墨汁，就惹來殺身大禍。更可笑的是，是學生們自己把他們押送到公安局。可以說，毛澤東仍然作為共產黨統治的神，被放在一個不可侵犯的位置上。

盡管學生把灑墨汁的人押送公安局，是爲了保護自己，但也是一種心態的反應。

張宏圖創作這幾幅毛澤東，我很理解。文革後這些年來，中共不許人民對毛澤東作一點一滴的批評。現在就是要讓毛澤東吃點人間烟火味，作爲中國當代的神，現在把毛澤東重新變成凡人，這就是一種藝術的突破。

問：鄧小平不是也說毛澤東晚年犯過錯誤嗎？

答：這完全不同。鄧小平一方面貶毛抬高自己，另一方面抬毛保護自己。最近大陸重新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要這個講話存在一天，中國的文藝就沒有希望。這本「聖經」不倒，中國文藝就不會有成就。

問：對此次畫展你總的評價如何？

答：我對此的評價是，藝術家的良心是最袒誠的。有這麼多美國及世界各地藝術家參展，最令人感動。

我在此要說，中國藝術家參加的太少了，包括香港台灣的藝術家在內，只有二十個。而且有些人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下掛上名字。張宏圖在畫展之前同好多中國藝術家打電話，沒有得到相應的反響。

問：原因是什麼？厭惡政治呢？還是怕？

答：這裡原因很複雜。

中國需要畢加索與「哥爾尼卡」

問：這次畫展的政治性很強，這對藝術家來說，是正常的嗎？

答：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了畢加索。當年法西斯德國派飛機轟炸他西班牙的家鄉哥爾尼卡，他正在法國，非常憤怒。結果他用了半年的經歷，畫了著名的作品「哥爾尼卡」，表示了他對法西斯的痛恨和揭露。

現在我們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國藝術家都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畫比畢加索「哥爾尼卡」更深刻的作品來，揭露中共的法西斯行爲。

我對張宏圖很敬佩。他那幾幅毛澤東，將會招來中共的深惡痛絕，在大陸他夠格被槍斃了。

問：這次參展作品的藝術性如何？

答：所有在短期內因某種事件而舉辦的畫展，都是比較粗糙的。但是我百分之百的強調，今天的中國畫家，要政治掛帥。任何高級藝術品都是時代的產物，我們中國正在這麼一個政治時代，它應該產生相應的偉大作品。



東德為首形成抵制改革陣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東西方兩極陣營的政治格局，在八十年代的國際緩和氣氛中，正在共產黨國家的改革潮中衝擊下，出現新的局面。在東方陣營中，一個新的對峙正在形成，一方是蘇聯—波蘭—匈牙利的改革陣綫；另一方是東德—捷克—保加利亞的保守陣綫。那裡幾乎每天都報出突如其來的演變，別開生面，令人振奮而又緊張。

兩個月前，波蘭的政局吸引了人們最興致的矚目。波蘭團結工會今年四月甫獲得合法地位，不到半年時間，即已破竹之勢，連番奪得議會的多數黨席位，拿下政府總理和多個部長，組成了第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非共政府。

不旋踵，保守陣營的中堅—東德，戲劇性地突破了一潭死水的狀態。從今年七月開始，成千上萬的東德民眾湧往匈牙利，搭乘「自由火車」逃往西半部德國，這是沒有戰爭、飢荒的和平狀態下，罕見的「歷史大逃亡」。

大逃亡使堅冰瓦解

匈牙利的「自由火車」在一個月裡，便搭載了上萬東德難民進入西德，迫使東德政府一方面發表氣急敗壞的聲明，一方面關閉所有可以前往匈牙利的交通方式。然而緊接着，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數以千計的東德「遊客」包圍了那裡的西德大使館，在布拉格掀起了一場「翻牆大戰」。捷克的警察部隊在不開槍的條件下，顯然無力抵抗「東德遊客」們為自由而發起的衝鋒。

從各國新聞社發出的衛星傳真照片，人們

看到一幕幕令人心碎的鏡頭：敏捷的少女爬過了鐵柵，媽媽却被隔在外面，母女決別時隔着鐵柵抱頭而泣；一名東德男子爬牆爬到一半，捷克警察把他向下拖，裡面的同胞却紛紛伸出援手，抓住逾牆者的身體……

迄今十月中旬，已經有六萬多東德民眾，通過所能想像到的方式，奔往自由。與此同時，成千上萬個家庭破碎了，情侶天各一方，即使這樣，留在東德的人民仍然為逃出去的親人感到幸運，並為他們祝福。

東歐最強的堡壘

東德人民的大逃亡，反映了這個共產黨國家的深刻危機。被舉世公認最卓越的德意志民族，在戰後分裂成東西兩部份以來，成為人類兩種基本社會制度標準的實驗場。西德的西方民主制度獲得了無以倫比的成功，而東德在正統的斯大林主義模式下，遠遠落在了後面，東西兩部份的社會生活質量有天壤之別。

匈牙利東德大使館鐵柵隔開的母女決別



自東方陣營盟主蘇聯的改革家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一股強大的改革潮衝擊着東歐各衛星國，波蘭在變，匈牙利在變。可是，一個值得研討的現象出現了：

當盟主蘇聯奉行冷戰政策和保守主義路線的時候，沒有一個東歐國家敢於或能夠抗拒；當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通力改革，求新求變的時候，却遭到以東德為首，包括捷克和保加利亞等數個衛星國統治者的頑強抵抗，至使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分裂成改革與保守的對峙局面。

東德共產黨由於過去處於東方陣營的最前綫，形成了僵硬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傳統，在近年共產黨國家的改革潮中，一直形同一塊「中流的頑礁」不可動搖。七十七歲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是一個頑冥不靈的以僵硬和正統著稱的黨領袖。

在東德統治者頑強拒斥改革的情況下，東德人民開始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反抗。數月來東德人民的大逃亡，終於將國內的堅冰敲裂，整個東德被震撼了。



上：德共前總書記昂納克
下：新任德共領袖克倫茲



示威像傳染病一樣蔓延

十月間，在逃亡潮中渡過了四十年建國國的東德，終於爆發了民衆公開的抗議運動。十月七、八兩日，東柏林上千民衆首先展開示威行動，遭到德共出動警察加以驅散，但並未發生流血事件。十月十六日晚，十萬東德民衆在第二大城市萊比錫發動了「燈光大示威」。這是繼一九五三年爆發抗俄暴動以來，在東德第一次爆發的和平示威運動。示威民衆的口號是：「我們要年輕領導人」、「我們要新政權」、「戈比，戈比（戈爾巴喬夫的呢稱）」。人們的主要訴求是要把昂納克從權力巔峰上拉下來，以便讓年輕的領導人上台從事改革。整個示威過程中警方沒有干涉。

換湯不換藥的領袖更迭

東德共產黨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和國內人民的雙重壓力下，於十月十六日召開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會議，於十八日宣佈更換最高領導人，由五十二歲的克倫茲接替七十七歲的昂納克出任黨的領袖。東德的共產黨統治者終於開始傾聽人民的聲音。

東德共產黨在換馬後向人民做了如下的「承諾」：「給我們時間」、「我們不得不理清問題」、「形勢的發展太突然了」、「本黨將準備一些新的構想，以便在明年的黨代會上進行討論」等等。新黨魁克倫茲據報導是一個患有糖尿病和肝病的病夫。更重要的是，他絕不是一個類似於蘇聯戈爾巴喬夫和中國趙紫陽那樣的改革家形象。人們認為，推出克倫茲不過是德共的一個權宜之計。

於是，兩天後的十月二十日，東德德累斯頓再度爆發五萬人的「燭光示威」。在人民的壓力下，東德官方又作出了一系列姿態性行動：如將夏季以來逃往西德而被稱作「叛徒」的六萬民衆平反，歡迎他們回國。克倫茲還保證將整頓問題重重的中央計劃經濟，增加消費品部類的生產。

天安門事件嚇壞了德共

宣佈將於明年五月同共產黨競選的東德最大的民主團體「新論壇」領袖波雷稱：「克倫茲並未獲得人民的任何信任」。這是因為克倫茲曾在十月七日調動警方攻擊在柏林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在前不久訪問北京時，克倫茲還曾表示支持中共對示威學生所採取的鎮壓行動。他曾對中共副總理姚依林稱：「北京的反革命暴亂使我們學到了基本的教訓」。他的這番表

態，可以說是「惺惺惜惺惺」，使世人看到東德與中共在當今世界上的孤立的苦惱。

東德共產黨十月會議期間，據說曾認真地研究了「天安門事件」的經驗教訓。德共政治局意識到，像流感病毒一樣從一個城市蔓延到另一個城市的示威運動，很有可能在東德重演。於是遂作出軟化政情的決定，改由克倫茲取代昂納克。那是在危機的強迫下做出的選擇。

反對派的靈魂「新論壇」

東德反對運動的心臟「新論壇」，是萊比錫、德勒斯登示威的策動者。「新論壇」由一批溫和的牧師、藝術家和作家組成。一個多月前，「新論壇」提出「民主對話」的政治主張。雖然目前「新論壇」技術上仍處於「非法狀態」但已經不折不扣地以反對黨的姿態上了政治舞台。

在九月初的一次活動中，「新論壇」一次便徵集到兩萬多人的社會簽名，它的支持面也十分廣泛，除了中堅的牧師、作家、藝術家等社會賢達外，還有教師、火車駕駛員、電工及市民大眾。與波蘭的情況不同的是，波蘭團結工會可以十分有效地組織工人，掀起全國性的行動，甚至一聲令下掀起一場暴動。「新論壇」在東德的作法是相對溫和的，社會層面高而廣泛。它的弱點在於缺少瓦文薩那樣極富大眾魅力的領袖以及組織性宣傳攻勢。

東德民運的幾個特色

東德反對運動的另一特色便是以新教會為堡壘。東德一千六百萬人口中，百分之四十信奉新教。從七十年代以來，教堂一直

是人們爭取人權和平抗議的聚集場所和講壇。十月裡在東柏林、萊比錫和德昂斯堡爆發的示威，教堂却是人們防範警察攻擊的聖地。

與波蘭、匈牙利、蘇聯波羅地海地方和中國相比，東德反對勢力和改革者的政治運作似乎更溫和一些。尚未合法的「新論壇」正在努力合法化，並不斷要求與當局溝通，並為社會爭取基本民權。

此外，東德的民主運動訴求的內容亦相當廣泛，諸如生態、環保問題、工業和科學發展問題，頗接近西方社會運動的內容，而非純政治化的運動。



新論壇領導人巴貝爾·巴雷

在意識形態上，「新論壇」的活動份子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到西方模式的民主人士皆有。他們的共同綱領是「自由化的東德」而非「資本主義的東德」。這與西歐的多元思想狀態亦頗類似。「新論壇」人士，生物學家雷奇的表白十分清楚：「我們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敵人或要威脅什麼人的統治，我們只是要把國家從危機中拯救出來。」

其他一些社團甚至更形溫和。在「新論壇」大傘的保護下，有六七個較小的團體的生存更有保障，如「民主覺醒社」、「民運社」等。其中如叫做「聯合左派」的團體，已經提出

要終止執政黨「斯大林主義」的統治方式，並組成獨立的工會組織。這些情況導致了「新論壇」無法進行言論和思想的統一。

「新論壇」的創始人巴貝爾·巴雷認為，「我們要保存多元化色彩。因為我們遭受的，正是一個頭腦一律的制度的折磨」。「新論壇」在共產黨內亦不乏同情者。萊比錫燈光示威中，就有三名德共的地方書記發表聲明，要求執政黨促進公開對話。

局勢充滿難解的危機

十一月四日近百萬民眾在東柏林舉行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據稱是「希特勒時代以後未曾有過的示威場面」，所有「能上街的人都上街了」。人們的口號是，「我們不要憲法，只要行動」。

新上台不到二十天德共領袖克倫茲，三日已宣佈五名強硬派政治領袖將在一個內辭職，日前還宣佈解除對人民自由通道（即經第三國前往西德）的限制。然而，局勢表明，德共任何讓步都無法平息民眾的示威行動，東德的政局已經到達一個轉折的關口：共產黨或者改革或者鎮壓，否則只有等待垮台之日的來臨。東德的形勢的確是嚴峻的，那裡的變化可能牽動整個世界的居勢。十月底，由美國總統布什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同時宣佈，將在明年二月舉行高峰會議，討論東歐的動蕩局勢。

截止今年十月止，已有十七萬東德民眾逃往西方，而且逃亡潮仍以每小時三百人的速度進行着。東德已經陷入一場強權解體和社會反彈的危機中，讓我們觀察其變。這個馬克思的故鄉，會第一個成為共產主義制度的墳場嗎？

天塌地陷時代的鬪爭

陳雪

——明朝泰州學派和東林書院的啓蒙活動

這是一個天崩地塌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新希望的曙光已經照臨大地，新經濟和新社會的萌芽已經破土而出，而舊的統治勢力則日益衰朽，衰朽到它對於新勢力的鎮壓已顯得回天無術，欲振乏力；而長時期以來統治人們頭腦的聖經賢傳、綱常名教、皇權崇拜等等的觀念形態都受到了懷疑和挑戰，以致不得不從高踞於人們頭頂之上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寶座上跌落下來。整個社會都在尋找出路，都在思考着明天：統治者在即將面臨的死亡面前惴惴不安，人民大眾尤其是他們中的先進份子則在興奮和焦急中憧憬着未來——這就是明代（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中晚期，即明世宗朱厚聰嘉靖（公元一五二二年）前後中國社會的概況。

社會生產力促進了社會分工、商品貨幣和生產關係的發展。許多手工業者從農業的副屬地位中分離出來了；許多經濟作物地區從農業地區中分離出來變成了手工業原料產地，從而出現了蘇州地區數千人的織工和染工，景德鎮的數萬名佣工，每爐五百至七百人的煉鐵工，每槽一、二千人的造紙工，在這樣較大規模的

手工業生產的情況下，生產品已不可能只供應皇室和侯族的需求，或局限在作坊周圍流通，而要衝破地域的藩籬到全國以至海外尋求銷路。這樣，就出現了大量的，以商品流通為職業的商賈，和集散這些商品的工商業城鎮，出現了金銀貨幣的流通，出現了經營工商業的作坊主，和出賣技術維生的雇傭工人。

新社會的母體在因子的孕育中發生着陣痛，她呼喚着她的產婆為她助產。於是，思想啓蒙者就應運而生了。

泰州學派是出現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中國天空的一座燦爛的啓明星。這個以他的創始人王艮的誕生地江蘇省泰州市命名的學派，曾經在整整的一個十六世紀裡，活動在北至京師，南至湖廣的廣大土地上，出現了王艮、何心隱、李贄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和活動家。他的啓蒙思想和活動有以上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啓蒙的群眾性

王艮的父親是泰州安豐場一個鹽場上煮鹽的灶丁，他本人早年也做過亭子（灶丁的另一名稱）。他三十歲開始識字，三十七歲開始講

學，四十歲周遊天下。他的學生也都是下層勞動者。其中著名的如：田夫賈延美、顏山農、陶匠韓樂樂吾、樵夫樂齋、朱恕。其他講學對象也都是隸僕、農夫、商賈。當然，也包括一些士大夫、詩書士。他把周遊天下時所坐的蒲輪車名之曰招搖車，並在上面寫道：「入山林求會聽逸，過市井啓發愚蒙」，他提出「老幼賢愚貴賤」一願學者，即傳之。這就正式揭發了他的講學對象是面向社會基層群眾的。而在講學過程中，他又使用駭、信、化，即「始而駭，漸而信，允而浸與俱化鳥」。「一村既畢，又之一村」的方法，團結群眾。在講學形式上，他戴紙帽，穿深衣，持笏板，行方圓，坐焚香，奏鳴琴，談機鋒。很有宗教色彩，易於吸引群眾，折服人心。而在講學內容上，也是以「百姓日用」「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為主。反對搬弄經書陳言，因此易為群眾接受。王艮之後的何心隱、顏山農等人，也都繼承了這一群眾性、廣泛性的優良傳統。

第二，思想的叛逆性

泰州學派思想的最大特點是離經叛道，非

聖非孔。王良用「百姓日用即道」，否定了被奉為神明的聖經賢傳；因而，在他晉謁孔廟的時候，曾經發出了「此亦人耶，胡萬世師之稱聖乎？」的喟嘆。他用「天地一體」「萬物一體」「體用一原」的一元論思想，推行出了人

孔子廟大成殿一角



性平等，欲其所欲的結論，從而鼓動人們堅信：江、淮、河、漢皆是水，萬紫千紅都是春，人的本性應當像鳥飛魚躍一樣盡其天然，應當平等地欲其所欲，為其所為；如果要受到人為的干涉，那就要「掀翻天地」，為自己的利欲而鬪爭。

這種人性平等，掀翻不平等的天地的思想，到了王良的繼承者何心隱那裡，就發展為「借講學而為豪俠之具」，像「黃巾五斗」那樣的造反行動，發展為建立一個人群平等的合理組織的要求——用「均」和「群」這兩大原則建立起來的「會」。這些思想，到了泰州學派的第三位啓蒙大師李贄那裡，則進一步發展為「泛愛容衆，真平等也」的極為明確的平等觀，發展為「人人生知」，「人人是佛」，「人即佛，佛即人」，「聖人亦人」「人必有私，若無私則無心矣」，這樣赤裸裸的人性論。

第三，生命的戰鬥性

泰州學派，無論是創始人或是繼承者，無論是講學者或是門徒弟子，他們都不是坐而論道的清談者，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都不是競尚空談的空頭理論家，而是戰鬥不息，以身相殉的戰鬥者。王良在表面上雖然師事學大師王陽明，但他多次與王陽明論難，並在詩文中明顯表露他與王陽明的分歧，表現了他不妥協的原則精神。顏山農因講學而遭到統治者的囚禁、拷打。

羅汝芳任寧國縣太守時，把公堂作為講學的試驗室，並發出了「東合省同志」的邀請函，開展組織活動。何心隱與當朝的宰相張居正相會，開展過面對面的講學與反講學的鬪爭，又曾定計除去了貪贓枉法的奸相嚴嵩。以後輾轉各地講學，終被張居正殺害於武昌。李贄在任知府時仍講學不輟，以後更憤世疾俗，剃髮為僧，但仍留鬚，成爲一個非儒非佛，似儒似佛的人物。由於他的講學、著述、言行一貫觸犯統治者的大忌，於是他終被捕，自刎死於獄中。

第四，承傳的嚴密性

如前所述，王良在傳道講學中儼然以教主的身分出現，何心隱也有了「純陽道法」這種民間秘密組織的做法。他們在衣鉢傳授方面，也以二千年的絕學自許，必得天下古今有志之士才肯傳；在傳的時候，也是口授心傳，不假筆墨。尤其是王良傳徐樾，更是經過十一年的觀察，在確認他寧肯解官，也要篤信王良的學說之後，才正式決定將衣鉢傳授給他。因此，泰州學派從王良傳徐樾之後，一直薪火相傳七、八代而不衰。

在泰州學派活動的後期，中國社會又興起了另一個以中上層正直清廉的知識份子爲主的政治集團，這就是東林書院，亦稱東林黨人。顧名思義，東林書院是一個座落在無錫城東郊樹林中的書院；它以公元一五九四年（萬曆二十二年）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等在這裡講學，「議論朝政，裁量人物」而團結了一批地主階級反對派而著名。他們的活動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要求講學和結社的自由。

當時，在明朝嘉靖，隆慶年間，即公元十六世紀中葉起，中國文化鬪爭的主要形式就是講學和反講學的鬪爭。因爲，在此之前，中國各省都已建立起了不少書院，如：建於公元一三六八年的山東洙泗、尼山兩書院，重建於公元一四六六年的江西象山書院，建於一四八八年的江蘇學道書院，建於公元一五〇六年的湖南濂溪書院。但由於有的大臣向嘉靖皇帝朱厚聰上疏，列舉了書院的罪狀是：「倡其私學，廣收無賴」，於是，嘉靖就連續兩年下令毀掉書院，從此書院就成爲非法。但書院仍是難禁而不能止。江浙一帶又建起了許多書院。不

寧唯是，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等人，更利用書院這個組織形式做爲議論朝政、團結士人的場所。於是，他們就受到了權相張居正的反對。張居正加給書院講學者的罪名是「異端邪說，炫奇立異」「糾衆扛幫，罵辱長官」「別標門戶，聚衆空談」，但東林黨人却把士人講學當作是像農夫耕田一樣的天經地義。顧憲成曾經理直氣壯地說：「群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於天下矣！」這種對「精神」的強調，也即是對結社的謳歌，對集會自由提供的理論依據。因此，東林黨人堅持講學自由，正是顯示了他們具有啓蒙者的特點，即爭取教育、自治和自由的權利。

第二，實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

明朝中晚期的社會現實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宦官橫行，濫收捐稅；一是田賦累加，災患頻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市民運動，此起彼落。其中較著名的事件，如：一五九九年荊州武昌等地市民反對宦官陳奉的鬪爭，將其黨羽十六人投入長江；一五九六年錦州戍民反對宦官高淮的鬪爭，使之逃回京城；萬曆時，天津市民反對宦官馬堂的鬪爭，萬人出動，罷市燒署，殺其黨羽三十七人；以及一五九九年陝北人民反對宦官梁永的鬪爭等等。

隨着運動的發展，東林黨人也由言論上的批判變爲行動上的參與。例如，公元一六一三年（萬曆四十一年），東林黨人周順昌任福州權官時，曾直接與稅監高家發生過衝突，並逮捕了爲人民所痛恨的高的爪牙馬仕麒；而另一東林黨人周起元也曾向皇帝上疏，彈劾高家的罪行。同時，還上疏揭發太監李實在江南借督造船服三萬餘副之機，四出勒索織造商人的罪行

。他們的所有這些正義的作爲，都受到市民的支持，也引起閹黨的忌恨。於是，在一六二六年（天啓六年），閹黨魏忠賢大肆搜捕東林黨人之際，就爆發了蘇州常州市民數萬人抗議和毆打並殺死閹黨所派出的緹騎的事件。與此同時，東林黨人還參加了江南人民反貪官污吏的鬪爭，反對侵佔民間的鬪爭。

第三，參政議政，企圖改良政治

明朝中晚期政治日益腐敗，曾經出現過奸相嚴嵩及其子嚴世蕃把持朝政，貪贓枉法的事件，繼而又有宦官魏忠賢，勾結浙、崑、齊、楚、宣各黨中的一部份人組成所謂的「閹黨」，排斥異己，專權擅政，荼毒人民，無惡不作。當時，魏的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遍佈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和巡撫。東林黨人與閹黨的鬪爭，除了以上所述的反橫征暴斂，及侵佔田地的鬪爭以外，其主要內容，是圍繞着立太子的問題，以及由此一問題而引發的「梟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件，以及「國本」之爭、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等等。東林黨和它的反對派浙、齊、楚、崑、宣黨之黨，就「立太子」問題前後開展了二十多年的爭論，直到明王朝衰亡，南明小朝廷時期還未結束。其間，雖有東林黨人及其同情者葉向高、韓爌加入內閣，張向達、趙南星作了吏部尚書，鄭元標當了大理寺卿，但他們要推李三才做宰相的願望却一直未能實現；而且，緊接着發生了楊漣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衛逮捕的事件，發生了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被捕，慘死獄中的事件；發生了顧佩章、周文元、楊念如、沈揚、馬傑五人壯烈犧牲，即張溥所寫著名的散文：「五人墓碑記」所記述的事件。這一系列的事件，一方面表現了東林黨人爲正義而鬪爭的

英勇精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改良政治終於無法克服守舊勢力，這一悲劇性的歷史規律在中國歷史上的頑固性。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歷史就是這樣的善於調侃：她往往誕育出一對對學生兄弟來扮演貌似相同其實相異的角色，使得這個歷史舞台充滿了戲劇的趣味性。先後活動於明代中晚期中國朝野的泰州學派和東林黨人的情況正是如此。

首先，就其相似之處來說，他們都是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初現端倪時候的產物；他們都企圖用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他們都認識到了爭取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的重要性，而且也各自爲這兩個自由進行了英勇的鬪爭；與此同時，他們也都對當時的弊政——宦官弄權、捐稅苛重，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抨擊；末了，最重要的一個相似之處是，他們都未能逃脫被殺、被捕、被禁、被鎮壓的命運。

然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我們更應該從比較中找出他們的相異之處，從中得出應有的教訓：

第一，組成人員不同：泰州學派的組成人員多數是生活在社會基層的勞動者，如灶丁、陶匠、樵夫、農人，以及與這些人結合在一起的中、下層知識份子；而東林黨人則是由工商業主、中上層官吏和亟力想進入最高統治集團去當政的士大夫組成。

第二，活動對象、方式、內容不同：泰州學派活動對象是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的農村和城鎮的農民和市民，活動的方式是集會講解和討論，其內容以「百姓日用」及社會存在的問題爲主。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則提出了矚目的「均貧富」的主張。東林黨人則多是，在朝廷和

地方官員以及應試的讀書人中活動，而活動的場所則多限於幾所有名的書院。其講學的內容也多屬綱常名教、法統道統之類。至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則是主張走入朝執政或上疏直諫的政治改良道路。

第三，理論體系不同：泰州學派雖然在形式上也襲用過宋、明道學的語言外殼，甚至在論證形式上也時時顯露出陸、山心學「六經皆吾注腳」之類的師承痕跡，但是，就它的理論實質來說，則是注入了更多的天人一理，萬物一體，人欲天然合理，利欲是人的權利以及權利自然應當平等，為利欲則要「掀翻天地」等一系列富於人民性的思想，到了李贄，則更大膽地提出了卓文君男女私奔的合理性，提出一系列非孔非孟的問題，鬪爭矛頭直指封建的綱常名教；又提出了「一犬吠影，衆犬吠聲」的盲目崇拜問題。因此，泰州學派是個從哲學理論、歷史問題到社會現實問題都有自己一整套理論體系的學派，而東林則除了正統之爭、綱常名教之爭、朝廷是非非之爭而外，頂多有一點個性解放的思想。因此，它缺乏自己的理論體系，更談不到對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的政治見解。

第四，對封建統治者的態度不同：泰州學派雖然不乏讀書明理之人，但他們大多數都放棄了功名仕進之途，甚至許多人棄官不做，如何心隱從青年時期就拒絕封建科舉，徐樾自動解官；李贄不僅棄官不做，長期遊蕩，甚至剃髮而留鬚，出家而喝酒，狂放不羈，表現出他非儒非佛非道的叛逆性格。因而，他們為統治者所不容。被捕、被殺，但絕不屈服。何心隱死時，遺言要與同派程學顏合葬一墓；李贄被驅逐回籍時，還向友人強調自己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最後在獄中取剃刀自刎而死，

用生命表現了與統治者徹底決裂的不屈的戰鬥品格。而東林黨人，在與閹宦鬪爭中雖也有冒死犯難的表現，但他們思想上仍然跳不出君臣倫常的圈子。例如，周順昌、李應升被捕時，還寫道：「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高攀龍在被捕前自殺，死時還留下了「君恩未報，願結來生」的遺表，楊漣死前的遺書中還念念不忘「見二祖十宗於地下」。而他們的理想也不過是入朝秉政，「致君堯舜」；至於被革職回籍，則講學書院，指陳時弊。如此而已。



李贄

第五，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
如上所述，中國南方，自春秋戰國時吳、

越、楚國改革刀耕火種以來，生產已漸發展，經兩漢至南朝，以迄於唐代，長江流域的賦稅已超過全國收入的一半。再經南宋偏安一百五十餘年，資本主義萌芽已經開始。只是在落後的蒙古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之後，這初生的幼芽遂受到了摧殘和窒息；到明朝以後，才又逐漸復甦。因此，泰州學派，自覺或不自覺地作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初步發展後在思想政治領域裡的第一道折光，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進步發展而鳴鑼開道的第一批啓蒙者應當是比較切合歷史實際的。因為，資本主義啓蒙者的特點就是對封建農奴制及其經濟、政治等一切產物的

強烈不滿；就是熱烈擁護教育、自治和自由；就是堅持人民群眾主要是堅持農民的利益。而在明、清之際所產生的三大啓蒙主義大師：王夫之、顧炎武、黃梨洲以及在這方面有卓越貢獻的唐甄、顏元等，他們的言論中往往可以見到王良、何心隱、李贄思想的痕跡。至於在清朝中晚期活動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民間秘密組織——三合會、哥老會等。其組織和活動形式，何嘗沒有泰州學派當初活動的蛛絲馬跡。

至於東林黨人在啓蒙活動方面的表現，除了要求自由結社講學和主張個性解放以外，其他方面則多是屬於政治改良的封建王朝內部的正邪之爭，是非之爭，不應屬於為新社會制度的誕生和人民群眾的覺醒而進行的啓蒙運動。誠然，作為知識份子，生長在極其殘酷地迫害文人的有明一代，生長在政治極其腐敗從成化（公元一四六五年）至天啓（一六二七年）這一百六十二年，七個皇帝都很少甚至二、三十年不見大臣的明代中晚期，能夠勇敢地擔當起天下國家的大任，（有東林書院門口的對聯為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情），這種道德勇氣也是值得中國讀書人引為楷模。

不容諱言，對於泰州學派的學說內涵、思想實質、師承關係、歷史地位等等，從來就有不同的理解和評論。譬如，有的學者認為王良是主觀決定論者，是教人明哲保身，安心安身安命，去做忠臣孝子，做封建奴才。然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意見的爭論，從來就是科學發展的重要方法。筆者願以以上粗疏的見解就教於明者。何況，筆者，在這大時代的變動中，也按捺不住砰然心動，也想呼喚往日的亡魂，一起來演出今日更為生動，更為雄偉壯觀的戲劇呢！

讀

作

編



佳節不忘獄中的英雄

編輯先生大鑒：

在歲尾之際，吾做爲「中國民聯」之一員，在此提出一個建議，還望「中國之春」雜誌予以發表和鼓倡。

八九年是吾國殤年，發生了「六四」大慘案。近聞中共要給事件中枉死者平反和發撫恤金。吾人認爲，除了那些爲民主而捐軀之烈士，還有許多身陷囹圄的英雄，需要我們給予人道及物質的支持，以示民主之誼和人間正氣。不管我們的情誼能否透過鐵幕，轉達到他們的手中，此舉誠有其必要——鼓舞民主陣營之士氣。

本人建議「中國民聯」首先給予吾盟最優秀之盟員楊巍以精神和物質上的慰問。再者是本盟最忠實的朋友劉曉波，他今春在紐約，我會與他一晤，他曾對「中國之春」雜誌率言敬意，令人難以忘懷。

「中國之春」如願或倡此一建議，可與楊巍和劉曉波父母或妻子聯絡，代收慰問金。

順頌編安！

中國民聯成員張明則於新澤西州

聯絡辦法

編者按：讀者如願響應張明則先生提議，可以通過所能想到的任何方式，在新年之際，直接向劉曉波和楊巍示以慰問。有捐助者，可同楊巍在美國的妻子車少莉聯絡。

支票抬頭：CHE SHAOLI

地址：DEPT OF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1 BAYLOR PLAZA

HOUSTON TX 77030

A

給劉曉波的捐助，可通過本刊代轉劉曉波之妻陶力。

抬頭：CHINA SPRING

地址：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中國之春」編輯部

致未名先生

未名君：

先後讀罷您的三篇連續報導——中海海秘聞，令人拍案，一則爲中共王朝之腐敗而憤，一則爲您能深入紫禁城勇揭秘聞而敬。好像武俠小說裡的大俠一般智勇雙全。

只可惜，您的作品在國家安全局的魔掌下



「不幸犧牲」，見「中國之春」總七十八期廿四頁。我代表我的全家和愛護您的報導的朋友，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又，我希望中國之春設立一項新聞特別獎，給予像「未名」這樣的無名英雄。鼓勵勇者，報導大陸內部鮮爲外界所知的事情。總有一天，當我們的國家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時，我們還要建議那時的民主政府，爲這些勇敢的記者頒以「民主勇士」勳章。

致民主的敬禮

讀者陳華偉於紐約

八九年十月

陳偉華先生：

由於勇敢和機智，未名先生剛剛深入虎穴，安全從大陸返美。下一期「中春」雜誌將有精彩的內幕報導。恭請候閱
此致敬禮！

中國之春編輯部

民運需要地方帥才



中春編輯：好！

我是「民主中國陣綫」一員，看了貴刊七十八期吳方城文章「我們是怎樣發展民聯基層組織的」一文後，受益匪淺。

吳方城不愧爲「中國民聯」一員邊關大將，獨撐一面，使組織在肯塔基蓬勃發展。據我個人觀察，無論「民聯」「民陣」還是基地民主團體，出風頭的多，幹實事的少。例如我國兩年期都看「中國之春」，到現在才知道民聯裡面有這樣的帥才。他似乎不是「民聯

「中央級人物，但我想他對貴組織的貢獻，不亞於胡平等。」

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最終要回到國內去與執政黨競選。以台灣經驗為例，競選時不但需要有力量的黨魁，還要有一些在基層實幹的人才，如國民黨的關中、民進黨的林正杰。中國民陣在這方面有許多經驗與人才，值得「民陣」學習。

致戰友的敬意！

波士頓 王小華上

答王小華先生



王先生：

謝謝您對「中國民陣」的鼓勵。吳方城是「中國民陣」聯委會委員，相當於「中央級」幹部。如果您願意向他取經，可直接與吳方城聯絡。電話（六〇六）二六三—五九五四。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中春應用臘光紙



編輯先生：

我是「中國之春」的長期讀者，深深喜愛這份民運刊物，剛剛參加過你們刊刊七周年晚會，現有一建議望貴刊考慮。

中國之春除創刊號使用的是臘光紙外，後來一直使用廉價的報紙紙張，大概是財力方面的緣故。但是貴刊時常需要登一些很珍貴的圖片，印報的印報紙張會影響其效果，希望貴刊

在有條件時換好紙張，提高雜誌質量。

在晚會上遇見「中國民陣」的一些幹委委員，知道你們會很多（三個月）一次，而且在報紙上時常看到你們又開會了，如今年有三方聯席會議，「四大」等。我認為，如果不是特別需要，應該簡政，不要像共產黨一樣開那麼多會，省下錢來，好好辦些實事。

中國之春雜誌創辦七年了，如果管理得當，現在應該有自己的辦公大樓了。我們反對共產黨，但又不自覺地從那個制度中，承襲了許多東西，這是我們應時時警醒的。

祝 成功！

讀者 王力健於紐約



發行工作要抓好

「中春」發行部：

我是貴刊舊金山讀者，近來發現中國之春的銷量在增長，這裡的書店「中春」雜誌一到，很快就賣光了，幾個月來都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解放」、台灣「新新聞」也賣得很好，但不會出現一本沒有的情況，原因是這些刊物發行作得好，不斷調整各地零售量，望中國之春向其他刊物學習，取長補短。

陳雪於舊金山

陳雪先生：

您是本刊最忠實的讀者，謝謝您及時反映銷售情況，本刊將會努力作好發行工作。也希望

望其他讀者及時向我們反應情況

中國之春編輯部

新聞要有兩面

編輯先生如面：

中國之春長期以來是民運的勇者，持不同政見者的園地。但在最近一期專題「中國之春現象討論」中，所看到的文章全是為中國之春辯護的，沒有登載反面意見。這樣不像是民主園地。

「中國之春恐懼症」以貴刊創刊即有，由來已久，這個現象值得討論，否則，今後還會有一「學自聯恐懼症」「民陣恐懼症」接踵而生。海外民主運動，應在「中國之春」階段，便把這種恐懼症一舉掃除，才會有新的起色。

但是「中國之春」的專題討論似乎給讀者一個印象，人們並不恐懼了，因為一篇恐懼的文章都沒有。希望貴刊在今後搞專題時兩方面的意見都登，這是新聞的原則。

讀者卞光於加州

後記

在讀者的要求下，本刊自本期已恢復讀作專欄。

讀作編，是一個屬於讀者的專欄，我們歡迎讀者向我們提出改進意見猶歡迎逆耳忠言。您可就任何文章、作者、雜誌工作提出您的寶貴意見，也可就某一專題發表您的心得，要知道，許多大文豪是從給報章寫「讀者投書」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的。

中國之春編輯部



海內外民主運動大事記

薛偉整理

十月六日

十八位流亡世界各地的大陸作家，宣佈成立「中國流亡作家聯盟」，並計劃出版「流亡」雜誌，成員有貝嶺、菲野、北島、老木、蘇煒、張郎郎、嚴力、江河、石濤、裘小龍、馬德升、多多、張棗、馬建、李笠、張真、越南、顧曉陽等人。

七日

匈牙利共產黨特別大會通過解散其組織，另外成立保證信守西方式民主的匈牙利社會黨，本月將立法開放黨禁，明年舉行自由選舉。

中共決定開除「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的黨籍，蘇目前與另一撰稿人遠志明已逃到法國。

前中共經濟體改所長陳一諮在華府呼籲海外民主力量大聯合，建議組成新的愛國救亡大聯盟。

八日

各族裔的自由民主人士齊集在紐約港口自由島的自由女神像前，舉行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大會，譴責中共以血腥屠殺壓制中國大陸的和平民主運動。

紐約新聞日報發表社論，譴責中共駐美人員騷擾其留學生行動，並且提醒中共當權派不要踰越法界，以免招致本地法律制裁。

九日

萊比錫市七萬多名市民舉行要求民主改革示威遊行，警方表現節制，沒有發生暴力衝突。該市共黨官員宣佈，他們將促成反對派與強硬派政府之間的對話。

十日

大陸海洋四號地質調查船電子儀器工程師高杰文，在夏威夷跳船投奔自由，目前暫由中國民聯接待和安置。中共通知利比里亞駐北京大使，由於利比里亞九日正式與台北復交，決定中斷與該國的外交關係。

李登輝在雙十節祝詞中強調台灣前途不能獨立於統一的中國之外，堅拒台獨思想與主張。

十一日

人民日報刊登袁木所寫的一篇評論說：「在平息反革命叛亂以後，中共中央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議，並且確定由江澤民作為第三梯隊集體領導的中心。」

十二日

民進黨在雙十節中在台北和土城發起兩項群眾集會，引發警民流血衝突，六十多人受傷，警方偵辦十六人。東德共產黨政治局發表特別聲明，坦承東德需要改革，希望共同討論社會中所有的基本問題。蘇共領袖戈巴契夫宣稱：尊重波蘭人民的政治抉擇

十三日

據「爭鳴」雜誌報導，在「六四」以後三個多月中，北京地區共發生攻擊戒嚴部隊的事件一百七十多次，士兵有二十一人被殺，破壞車輛近三十輛。

國府與加勒比海國家百里斯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該國採取「兩個中國」政策，國府發言人表示將堅守一個中國政策。

中共五中全會將把「江澤民接中央軍委主席案」列入議程，鄧小平退休後將以顧問形式保留發言權。

從美國輾轉偷渡回台灣被捕的許信良，由台灣高檢處偵察終結提起公訴，罪名是陰謀預備叛亂，移送高院審訊後收押。

中共原定在本月中旬結束黨內大清洗，但由於各地均出現極大阻力，迫使中共高層延長整頓清洗時間，以掃除黨內自由化的影響。

十五日

中共人大常委會提案緊縮基本法九七年後嚴禁港人進行「反政府」活動，重申有權在港駐軍，宣佈緊急狀態，禁止新聞界干涉大陸政治。

據共同社報導，毛妻江青最近因病出獄接受治療。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江青並非獲釋出獄，她仍在服刑中。

十六日

十二萬東德人走上街頭，在萊比錫舉行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和平示威，要求民主改革，促老人領導階層退位，傳何內克政權岌岌可危。

南北韓會談獲重大突破，平壤同意民眾互訪及藝人交流。雙方並考慮組

十七日

織聯合代表隊參加明年北京亞運事宜。
舊金山大地震，強度達六·九級，最低估計兩百多人喪生，四百多人受傷，道路崩坍，海灣大橋上層斷裂，八八〇公路災情最重。

李政道在華府告訴希總統，北京領導人已同意提出「六四」遇害學生及知識份子名單。中共拒絕了美國提議讓方勵之轉往第三國的要求，也拒絕取消對他們的通緝令和起訴。

在日益高漲的改革呼聲中，東德共產黨強硬派領袖何內克引退下台，柯倫茲被任命為共產黨第一書記，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

匈牙利國會正式通過若干重要的憲法修正案，使匈牙利重新成為西方式議會民主國家，並且正式停止一黨制度。下月將直接選舉總統。國名改為「匈牙利共和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說，美國挑選方勵之為八九年肯尼迪人道獎得主，是對中國人民的一種挑釁，形同干涉中國內政。

法國外長警告在巴黎的中國大陸民運人士，抑制在法進行反中共活動，但庇護流亡者之初衷未變。

大陸河北陽原與山西大同之間，發生三次五點六級至六點一級的地震，已知死二十九人，萬餘間房屋倒塌。

二十日
滯留港澳地區申請赴台灣居留的大陸民運人士九十八人中，已核准十人入境，其中田欣、荆晶、白雪等三人首批到達台北。

廿一日
鄧小平警告香港，勿成反北京基地。藉包玉剛傳話表示堅決接掌防務外交，中共認為港「情勢變化」時將「干涉」。

逃抵香港的廣州主教鄧以明透露，自「六四」中共大屠殺後，華北十餘名教士被捕。

烏茲別克醞釀自主，國會決議修改憲法撤換總理，訂烏茲別克語言為官方語言。

上海文匯報撰文，強烈批評王若望，指污染青年思想應受懲罰，王已被軟禁，可能被中共審判。

廿二日
蘇聯外長謝瓦茲在國會承認入侵阿富汗一事違反了國家法律，悖逆國際規範，並指出建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雷達站自毀反彈道條約。

據明報報導，中共公安部在本月初發出的最新通緝令上，柴玲、封從德分列首、次位，另外還有前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王軍濤、北師大學生梁肇敏以及另外一男一女兩名北京的大學生。柴玲至今有可能尚未落入中共手中。

廿三日
匈牙利正式宣佈結束四十年的共產主義統治，改制為共和國，為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鋪路。

東德三十多萬人在萊比錫市參加遊行，反對共黨新領袖柯倫茲，要求實行民主改革。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即將進行訪問中國大陸之行，臨行前頻頻與白宮接觸，索拉茲抨擊布希等於派遣高級特使。

廿四日
中共宣佈中止與貝里斯的外交關係，這是八月以來，與中共斷交的第三個國家。

中共總理李鵬說，中共對東歐情勢深表關切，又說每個國家應該決定自己要走的社會主義路線。

美聯社報導，學運領袖王丹由獄中寄出明信片給友人，敦促他繼續努力。另北大有學生引用監獄人員的話說，王丹與其他至少二十人關在一間牢房，一天吃兩頓飯，罪名是反革命活動，有判處死刑可能。

廿五日
蘇聯最高蘇維埃表決取消在選舉中為共黨保留的特別國會席次，並准加盟共和國自行決定選舉當地國會。

廿六日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中共對蘇聯及東歐一些共產國家的改革，不便說三道四。但中共不會實行「政治多元化」也不實行多黨制，而是繼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胡喬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承認年輕人對社會主義很迷惑，聲稱阻止學運除軍隊外別無他法，透露趙紫陽犯錯是黨內的事，不會被審判。

布希政府允許中共軍方人員重返美國，繼續為美國軍售五億元的計劃工作，他們在今年六月天安門事件後被禁止參與工作。

廿七日
由波蘭團結工聯新政府首腦主持的首次華沙公約外長會議，肯定了「每一國家不受外力干預之下，獨立決定其社會、政治及經濟發展的權利」。國府大陸工作會報決定，今後共產

廿八日

黨員赴台參加國際會議，專案許可者免申報身份，免予追訴處罰權。

被深圳市公安局列為頭號通緝人物，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何頻，三個月前逃往澳門後，幾經曲折於四天前成功抵達加拿大，成為首批獲加國庇護的民運人士；另一民運份子深圳蛇口通訊報編輯陳安琪，也於日前獲法國政府庇護前往巴黎。

要求「自由及結束共黨統治」捷克首都布拉格上萬人大示威，警察與便衣用棍棒逮捕及毆打示威者。

民陣領導人吾爾開希與萬潤南等在紐約列席中國民聯聯盟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雙方真誠友好進行了晤談，決定了民陣民聯加強合作，互邀領導人擔任顧問，至於是否有可能合併，將來自會水到渠成。

廿九日

趙紫陽智囊，原中共體改所聯絡室副主任張剛和他的秘書周強、王龍濠偷渡抵達台灣，已口頭向警方表示要求政治庇護。

中共發表對出國留學人員的新規定生效，要求自費生必須向駐外使領館登記，已自費出國留學的人員，必須在六個月內補辦登記手續。

蘇聯政治局委員普里馬柯夫在CBS電視節目公開表示：每一個國家有權接受它要授的政治路線，蘇聯允許華沙公約國退盟。

三十日

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對李鵬表明，他支持今年六月四日遭中共以武力鎮壓的民主運動，尼克松向李鵬強調政見雖難溝通，但必須合作。

香港報紙報導，鄧小平指示停止批趙，因為過度製造批趙宣傳，到頭來反會傷害鄧的聲望。

約一千五百名蘇聯民衆在莫斯科包圍KGB總部，悼念在斯大林時代屈死在路必安卡監獄的鬼魂，群眾高呼：「打倒KGB！」有四十人被捕。尼克松會見鄧小平，鄧指控美國在次「動亂」中，介入太深，尼克松認為美中關係面臨七二年以來最嚴重的情勢。

卅一日

中共人大通過了「遊行示威法」，必須預先申請許可，違例者強行驅散或拘留，禁止國家幹部參加集會遊行。

全美學自聯將針對中共「新華社」污蔑其為反動組織的行徑採取法律行動，近日內向華府聯邦法院提出控告。

十一月一日

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會見「民陣」秘書長萬潤南。萬潤南宣佈了四項「民陣」即將展開的工作，包括建立「中國之船」，向大陸廣播；召開討論民運的布達佩斯會議等等。中共外交部再次向法國提出抗議，要求禁止民陣活動。

美國白宮副發言人帕皮迪克否認美國涉入大陸民運，他說大陸民運是人民自動自發要求改革和民主所造成，美國目前並無主動改善雙方關係的計劃。

二日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開始在美國南部巡迴演講，他將去奧斯汀、休士頓、紐奧爾良、邁阿密等城市與廣大華僑

和留學生討論今後大陸民運的走向、遠程目標和當前的任務。

東德領袖柯倫茲訪問華沙，與團結工聯領導的政府領袖們會晤，並宣稱他可以向波蘭的劇烈改革學習，同日，東德四名高官因群眾抗議而被迫辭職。

大陸留美學生目前普遍支持「學自聯」，原中共官辦的「全美聯誼會」受到各校留學生的強烈抵制，兩任主席皆被拉下馬，目前已面臨潰散。美國中情局認為中共因民運殺戮數千人，指出北京正進行搶奪軍權激烈鬭爭。

三日

匈共要求七十二萬黨員重新登記，一個月來僅不足三萬人辦理手續。東德上百萬民衆在東柏林空前大示威，當局在宣佈五名強硬派政治局委員辭職之後，又宣佈無限期解除門禁，准予人民經捷克赴西德。

四日

中共舉行了六天的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就當前政治經濟的若干問題發生激烈爭執。東德發生逃亡潮，每小時三百人奔向西德，美國擬訂協助防止混亂計劃。

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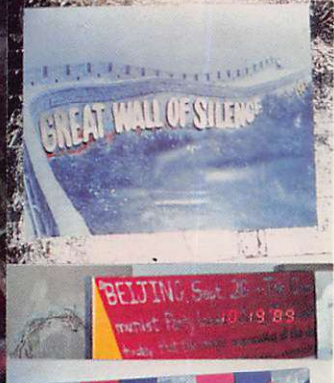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報導，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將於七日舉行，這次會議將通過一項三年計劃，恢復中央對經濟的控制。

明尼蘇達大學留學生將成立民陣明州支部，金山灣區及洛杉磯支部日內也將成立。



我們用畫筆自衛

「六四」畫展：1989—紐約



- 發行：中國之春雜誌社
 - 美國：P.O. 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 香港：香港九龍廣東道501號2樓4室
3-782-6772
 -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3) 849-6348
 - 澳洲：GOP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 歐洲：PARISER STR. 52
5300 BONN 1 W.GERMANY
(0228) 679-902
-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2.00 港幣

T.P.Lee #8097. 70-81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中國之春七周年晚會



1. 李祥向民運老前輩致敬！
2. 中春創始人之一宦國蒼：我是來吃飯的！
3. 4. 中春最早的支持者夏志清教授和董魁女士。
5. 謝文對中春最近的進步表示欣慰。
11. 馮潤南向大家道歉：我來遲了。
12. 晚會節目之一，歌曲：「來自北方的狼」，表演者吾爾開布（來自西北）、楊漫克（來自東北）。
13. 大會會場前排從左至右：徐邦泰、伍凡、王炳章、汪岷、黃奔、吾爾開布、李祥。
14. 回溯春天的腳步：七十八期中國之春集錦。
15. 七歲的小胡吽（胡平之子）為中國之春切生日蛋糕。
6. 7. 中春的老朋友徐松林、李勇、范揚威（從左至右）。
8. 剛到紐約的著名記者曾慧燕也前來恭賀。
9. 晚會也有不同的聲音：張保羅嚴厲批評民陣來客。
10. 民聯的元老之一楊懷安獲演說風度獎。

